

唐振权回忆录

开头的话

我即将八十岁了，静思时我就总想，我这一生是怎样度过的，我都做了些什么，年轻时的理想和抱负都实现了吗？我仔细地琢磨着，确实需要盘点和疏理一下，于是我萌发了想写点什么的愿望。然后我就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回忆和撷取，揉和思考和议论，还有一些反思。叙中夹议，议中反思，这样写出一段一段的，再把它珠串起来成一条链。称其不上是回忆录，而只是我人生足迹的一个拾取。也可以看作是我记忆碎片的整理。过去的岁月有一些是记忆深刻的，有一些是模糊不清了，确实需要仔细地回想和整理，而且现在的回忆已经在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和起点上，许多需要重新审视和反思。这种回忆的整理，不能是简简单单过程的叙述和事情的回忆，伴随着思考和审视，评述和议论，必然是费时而缓慢的。我决定了这样做，就认认真真把它当做了一个大事来做好。

为什么这么做？说不上，不是想要出版给别人看，也不是想发泄和宣扬什么，我是不想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告别人世。一方面对自己的人生究竟是否留有遗憾，或者还感到满意，回味回味；另一方面也想在这个世上留下点什么，让我的孩子、亲人和后人们，知道一点我的过去，知道我现在的一些想法。也送给我的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们，使他们更多的了解一些我。我也有些冒昧和斗胆，或多或少想表达一点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把它说出来。因为我们都处在同一个环境里，尽管遭遇不同，但都有着类似的经历，我的一些感受可能也是

不少人共同的感受，说一点别人也想说的。

这里，我想先大致概括一下我的人生，我是思考了很久很久。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我将我定位在什么标准上来评价自己，按“革命”时代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来问，我是革命的？不革命的？还是一个中间派？还有，我是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的？还是无所作为的？在過去的风雨岁月中我是一个什么角色？这些问题过去不难回答，但是现在我做不出肯定的回答，“是”，还是，“不”。因为现在对许多“是非”“好坏”的评价标准变了，过去认为“对”的东西，不见得“对”，“错”的不见得“错”。我想整体粗线条地，大致地描绘一下自己，更细致一些的，只能在我后面的记忆碎片的整理中，一一道来了。我不会去说套话，也不讲气话，平心静气地看待过去的一切，不推卸客观，不怨天尤人；不夸大也不贬低和丑化自己，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而已。只能是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普通的有着社会属性的“人”来评价自己。不是革命的先行者，不是什么“家”，不是模范和先进人物，也没有“千夫指”和恶迹。但是我也不能算作芸芸众生的草民，我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个有文化的高于大多数人的知识分子，不能给自己定位太低，那样也太对不起，养育培育我的国家和人民。我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有责任的知识分子，来自我评价吧。

概括我的人生，大致有这么几点：

首先，我定位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看做是上层（知识层）社会群体的一分子更贴切一些，只是群体中的一员。我不出人头地。我没有光环，没有辉煌，但也不是平庸无为，能敬业地完成我承担的任务。

我的一生是平凡和平淡的，在我的岗位上，无愧于社会，无愧于我的职业，无愧于我的学生。我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一定地努力，为培养人才，为我从事的专业发展，做出了点滴的贡献。我在社会群体的活动中，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做得对，在无休止的斗争里，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光，做了许多错事。为此感到遗憾，甚至感到内疚。但我也无能为力拒绝那样做，那时候也认识不到那些是错，更没有胆量顶着，最多是消极一点。

其次，我感到国家和社会没有亏待我，和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因为思想和行动跟不上形势，屡屡遭遇到责难，而生活上却没有经受过很大苦难。回顾我在特定大环境下的人生轨迹，应该说我是幸运儿，还曾经有过一个革命的经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特殊照顾。又有幸能够生活在北京，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且一直工作在大学里，获得了理想的职业。总的来说我的人生是阳光的，一帆风顺的，在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没有受到过分的委屈和不公正，不应该还有什么个人的抱怨和不满。我很知足，更是满足，也就缺乏奋斗和抗争的精神。自然滋生着心安理得的心态。

第三，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我比较低调，我不攀比，不争强好胜，随遇而安；此外，我在遇到一些看似吃亏的事情我能泰然处之，我不太计较一些琐碎的得失，为人平和，遇事不燥；对于别人的一些误解甚至冤枉，我也不愿去辩解，对曾经无意伤害过我的人，不存芥蒂，息事宁人；对于前行中的一些沟沟坎坎，我能不犯愁地越过。因此我的人生基本是快乐的，心情是敞亮的，愁眉苦脸的时候不多。既

使是被贬，下放干校劳动，也是愉快地把它当作休养和锻炼。

第四，虽然谨记着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教导，但是思想深处也没有过份把它真当做一回事，没有太感到沉重。只是在大厅广众下的学习会上，例行地“批判”一下自己，但从没有写下什么思想汇报、检查检讨之类的文字。表面上看不强烈要求进步，但又表示愿意彻底的改造；实质上是内心无声的抵触，在夹缝中求得生存。也许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心态，只不过每个人的表现不完全一样。所以我心态坦然，谨小慎微，事实上，没有太刻意“夹着尾巴”做人。

第五，我力争上游吗？当然不敢承当，但是我也不甘居下游；我进步吗？别人说我落后，我当然不会承认，实际上我并不跑在队伍的前列，在“革命”的跑道上，也就是在第二、第三梯队，在大批中间队伍里略靠前一些。没有人把我当做政治上的积极分子看待，也没有被认为是中间派。我是一个夹在革命队伍里的一条游鱼，时而靠前一些，时而又落后到接近中间。这就是我真实的政治状态，不左不右，不好不坏。我估计组织上对我也可能就是这样的评定，发展为党员差一点，做为群众积极分子也还可以。勉强算作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当“枪”使不太可靠。

第六，我这个人惰性比较大，总需要外界施加压力，总需要别人推着走。平时因为惰性表现不出勤奋和自觉，表现不出顽强和刻苦。但是在紧张、激烈的群体活动中，在“会战”和突击的行动里，也能爆发出冲击力，而且是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冲在前列，独当一面。不为帅，不抻头，但能压阵。我和许多同志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协

同配合攻关的作为。这就是我这个人的两面性。

第七，放在这个大环境、大时代里来剖析自己，我们这一代人的
人生道路，是和这个时代和环境紧紧相连的，思想和行为都深深地受
着时代和环境的支配。以我来说，纵使自己不愿说违心的话，不愿做
违心的事，但是从众心理和形势所迫，也是不由自主地说了和做了。
这也反映出我只是一个凡人，没有那样的崇高境界，我有人生中人性
软弱的一面。我自认为我心肠软，心地过于柔弱，缺乏阳刚性。因此
为人处事常是优柔寡断，不明朗表态，不爱憎分明，行为摇摆，无意的
伤害了一些人。

想到对我人生的概括，又总想起伟人有关“烙印”的一句话：“在
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
上阶级的烙印。”我们总想抹去这个“烙印”，但是这个“烙印”的定
论，却是在我们人生的前半部里，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包袱。为了消
除“烙印”，我们总在不停地努力改造，不停地自我反省，像圣徒一
样忏悔、请罪。然而不管我们怎样努力，还是被告知没有脱胎换骨，
永远和“革命”是二心。圣徒把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了罪恶的
苹果当做人类的原罪；我们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则把“烙印”也要
作为原罪，没完没了的改造世界观，没完没了地清理非无产阶级思想。
最终我也没有弄清“烙印”到底是哪些。自私自利？好逸恶劳？后来
看到那些自诩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四人帮”（包括康生）等，他们
岂止是自私自利，他们的嘴脸和剥削阶级有什么两样。

文化大革命中，我深刻的记得康生之流的说过的一句话，没有改

造好的知识分子，既使参加革命入了党，最多也就是一个“革命的同路人”。倒是我获得了一个认同，很甘愿当这个“革命的同路人”。

我带着非无产阶级的“烙印”参加革命，处处注意学习和改造，因为我的出身不好，怎么改造也没有用，我只好借口思想跟不上要求，主动把自己划到了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的范畴里。因此我思想封闭，不向组织汇报思想，不畅开心扉。我避开政治要求（入党），也不想当官。后来康生给我们指出来的，做一个“革命的同路人”，我觉得挺好。工作上我认真负责完成交给我的任务，努力地搞好教学，钻研业务。不求“红”，那就努力地做到“专”一些。我一生中也犯过错误，例如在文化大革命里。但我不认为，那是我主观上要犯那种错，那是时代造成的。一生中我没有辉煌的业绩，没有显赫的成果，但是我是脚踏实地地做了一些事，没有搞花架子，没有弄虚作假，成绩是客观存在的。也许这是阿 Q 心理，但我是心安理得的。

在前行的路上，我尽管也有些跌跌撞撞，但总的是比较一帆风顺，没有遭遇到很大的坎坷，没有受到过像“反右”“清理”那样的沉重打击，应该说是幸运的。特别在老了的时候承认了我的离休资格，得到了比一般人更优越的待遇，我非常知足。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微不足道，我正好在那个政策界限的框框里，我就得到了。我感谢政策的透明，感谢现在对在革命年代任何有过贡献的人的尊重。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二、三十年以来受过各种不公正对待的人（大多是知识分子）平反、甄别，表明彻底地摈弃极“左”的那一套。我深深受到鼓舞，

我们从“干校”回来以及后来的迁校过程中，无事可干，就想办法找项目、抓课题、上科研、办短训班、招研究生，直到最后突破禁令招本科生。我们怕无事做就荒废了，那时就是急于想搞教学，使我们的教育能跟上新技术新工艺，日益发展的要求，使国家尽快地追上先进的步伐。我们真是心急火燎地想向前冲。这里就表现出“衷心为国，鞠躬尽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主动地为国分忧，为社会尽力。

在这短短的后来十几年里，我感到我是积极主动地，不受任何人指使，做着一切。我带了十几名硕士研究生，因人而异给他们选择了前沿的课题，使他们在毕业后都拓展了方向，找到很好的人生定位。新的时代，新的机遇，也使我们焕发了新春。但是毕竟岁月不饶人，我们必须退下来，让更多的年青人上去。这就是我的人生经历的简要概括。

我的人生态度，一定程度上也是我的处世原则：

我追求平凡，但我不愿意平庸，平庸就是碌碌无为，无所事事，俗话说，窝囊一辈子；年轻时我积极上进，但我不激进热昏，不冲在前，激进的人大多是跟风派，“左”先锋；我宽厚待人，但我不宽宥丑恶，宽宥恶人、恶行最终是害人害己，对这种人尽力远离、避让；我为人随和，但不随便，我不会八面玲珑，曲意迎合；我心态豁达，但不豁嘴，不该说的不说，不信口开河，不胡说八道，严把住自己的嘴。我圆通，明知是不对我也不死扛硬顶，不逞英雄；但我不圆滑，不着边际，油嘴滑舌。

即：平凡不平庸；积极不激进；宽厚不宽宥；随和不随便；豁达

不豁嘴；圆通不圆滑。

写下我的经历和感受，同时评说和反思，叙中夹议畅述心怀，把这些变成文字。在电脑打字输入书稿时，就是回忆和思考的过程，就是整理我的记忆碎片，达到陈述化、可读化、逻辑化的过程。电脑的符号变成了系统的文字，交到能够帮助出版的文苑社里，最后成册印出来，不印出来不能称其为书。如果能顺利完成这一切的话，就了结了我这最后的心愿。

万事开头难。在开这个头的时候，先是思考了很久怎样动笔，试着写了几个片断，反复地修改，使它能恰当地表现出我想要说的话，这中间停停写写，反复斟酌，觉得不好，推倒重。摸索出一个自我感觉上比较好的思路，就这养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写了下来。把记忆的碎片整理、捋顺、反思、议论，积少成多，珠串起来，成为了文稿。

感谢在我人生的最后阶段，赶上了开放的年代，带来了宽松的环境，我们能够把一些心里的话说出来。这真是，千辛万苦受历练，桑榆阡陌迎来春。

目录

童年——深刻的抗日战争的印记

“你咋成了革命离休老干部”

我的一九四九

大学，造就我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为建设中国的克里沃罗格而奋斗”

繁忙的教学让我躲过了一劫，侥幸没有成了右派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三面红旗引导我们走向……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的“教育”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老九，都要上“五七干校”

为什么大学都要迁出北京

教育革命 革得了没有高等教育

政治至上及突出政治等等

难忘的住在窑洞里的一年

我的科研，总是围着试验台转

我和我的学生

钻探总工短训班

无意地涉足了经济领域

校友 公仆 负轭 “拍砖”

后记

童年——深刻的抗日战争的印记

我是 1933 年出生的，自打我四岁记事起直到我十二岁成为一个少年，这八年正好是抗日战争的八年，而且我整个童年的生活又是和抗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是时代的相连，更因为我的父亲还是一个原政府军人，我们的家庭紧随着他，东奔西跑生活在抗日的环境里，我小小的脑海里深深地刻印着抗日的记忆，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抗日的情结。

我出生在一个当时国民政府军人的家庭，那时我的父亲还是一个低级的文职参谋军官。父母亲结婚有了我之后，外婆就跟在了一起，不久又有了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们基本上随军住在南方的小城镇里，父亲不常在家，住在营房里。抗日战争爆发前，大概是 1936 年，我们随父亲驻防，住家在浙江嘉兴，房子紧靠着河，厨房后门直通河边可以淘米洗菜，我被一再警告决不能从后门出去。当时战争的气氛已经笼罩下来，记得一次晚上突然响起了警报，要熄灭灯火，不要吵闹，大人们说这是防空演习，当然我也不懂得是甚么意思。这就是我四岁左右时留下的一些模糊的记忆。

我脑子里印象最深刻地就是，有一天我被告知必须和小一岁多的妹妹分开，她由外婆带到福建外婆家，我则跟随母亲带着不到一岁的弟弟，回到父亲老家安徽合肥。因为是要打仗了，父亲的军队要开赴前线。分别前在照相馆全家一起合影，这是我小时候总喜欢拿出来看的一张照片。与外婆和妹妹分别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郁闷了很多

天。我完全不记得我和母亲是怎样回到的合肥老家。这应该是 1937 年春夏的时候，我的记忆也就是从这时候，随抗日战争的开始而开始。我很久很久地思念我的妹妹，痛恨为什么要打仗？那时候还不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我和妹妹一直到解放以后 1950 年，我母亲把她从福建接来北京，才得以重逢。

我们回到合肥老家，在合肥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那时候母亲总是郁郁寡欢，不思饭食，甚至以泪洗面，后来我长大后母亲告诉我，这才知道，那时父亲所在部队正在吴淞口抗击日寇。那时候我太小不知道什么吴淞，只是太多地听到一个叫刘阳的地名，父亲正是在那地方抗击敌人。战斗异常艰苦激烈，几乎每天一封绝笔书通过军邮寄到家里，表明要与阵地共存亡。那就是伟大的“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抗日战争开始，最惨烈的一次战斗。日本人用军舰、大炮猛攻中国阵地，中国军队死伤惨重。这是不久前看到一篇记述“八一三”淞沪保卫战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的。过去我们只知道八路军新四军抗日，不知道战争一开始中国军民抗战斗争的艰苦和惨烈。“八一三”中国军队坚持了八十余天，上海民众全力支援。面对着装备精良，海空军配合作战，中国军队死伤过半，日本海军用舰上大炮和飞机轰炸，就把中国的阵地全部摧垮。日军陆军强行登陆，中国军队不撤退就会全军覆灭。在这篇文章里我知道了刘阳门这个地方，也就是小时候从母亲的口里，常听到的刘阳门这个名字。刘阳门的战斗是非常壮烈的，中国军队和登陆的日军肉搏拼刺刀，打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我的父亲就是在刘阳抵抗日军，从死人堆里活着回来，那真是万幸的。

中国军队不得已撤退，日军攻克上海（上海的外国租界日本人没有进入），后又占领南京，安徽也要面临沦陷，我们不得被迫离开老家，由母亲带着我、奶奶和叔爷的家眷，向后方逃亡。我的姑姑正上中学，跟随着临时组建的流亡中学——国立八中迁往湖南。我只模糊地记得，我们挤在一条大木船里，大概是经由长江到了汉口。装满了逃难的人的木船，经过了一个大湖，正赶上风浪，母亲紧抱着我们两个孩子，不许我们哭闹，好像大人们都在祈祷上苍。真是惊心动魄，幼小的心灵也受到惊吓，因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后来我问过母亲那个湖，说是洞庭湖，那就是说我们逃难是从安徽先江西再到了湖南，从湖南经水路到的汉口。我想，这一定是南京失守长江被日寇封锁，只能绕道走。母亲是很艰辛地带着一家人逃出来，才到达汉口的。由历史知道，好像上海南京的大批撤退，也都是首先撤到了湖南。

到了汉口，军队的留守处接到了我们。此时汉口已是紧张万分，我只是记得晚上灯火管制，道路漆黑。我母亲下船时坐的黄包车，没有跟上前面的车，车夫也没有记得要到达的旅馆的地址，我母亲还是很机智地先找到一个旅馆住下，她知道留守处的人会挨家旅馆寻找到她的。那一夜我哭着闹着要我的妈妈，我被哄着睡着了。第二天他们也找到了我母亲。在汉口可能是住了短暂的一、两天，由军队留守处安排上了火车，转到郑州。父亲的军队正在陇海、平汉线上一带抗击日寇，郑州非常吃紧，我们所有撤退的家属装入到货运闷罐车一直送到宝鸡。也不记得经过几天几夜，记得深刻的就是缺吃少喝，全靠跟随护送我们的当兵的在停车时，从车站上搞到一点水和食物。车厢里

小孩哭大人叫，幸亏是冬天，闷罐车还能忍受，要是夏天那就不堪想象了。当时逃难的难民绝不可能有这样的幸运，只能是拖家带口地靠着腿逃跑，哪有车可坐。民族的灾难就这样深深地刻在幼小的心灵里。

在宝鸡正好是隆冬，一直是住在南方的我们，哪里经受过西北高原的寒冷，我的小弟弟冻病了，现在看可能是肺炎，送进宝鸡简陋的医院没有能够救活过来。跟我们一起逃难过来的，比我还小一点我称之为小叔的也病了，也没有逃脱死神，他们都丢在了宝鸡。我大了奶奶告诉我，那时我穿着前面、袖子油亮的脏棉袍子，拖着两条长鼻涕，活像个小叫花子。幸亏是皮实，挺过了宝鸡的严冬。长大了后来才知道，宝鸡是极干旱缺水的地方，风沙又很大，哪里有水总是清洗，讲卫生，初来的南方的儿童，很容易病倒、病死。宝鸡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非常寒冷可怕的印象，别的什么也不记得了，那时我大概是四岁多一点。

过了一冬天，像是春夏的时候，父亲的部队调动到湖北，家属追随着部队，再经西安，又坐车又坐船的到了湖北老河口，我们住到了谷城。听着大人讲，军队在大洪山和日本人打仗，我跟着住在一起大一些的孩子，张口闭口就是“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时候……”“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听着日本侵略中国的事情和日本鬼子的残暴，心里自然种下了对日本鬼子的仇恨。

在谷城待了很长一段时候，1940年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弟弟，奶奶还跟我们在一起，叔爷的家眷离开了我们。这以后我从五岁到六岁多，渐渐地懂得的更多了。父亲的讲述，以及从别的大人听到的，知

道了“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不做亡国奴、打倒日本鬼子等等，后来又知道了淞沪保卫战、台儿庄大捷、汉口保卫战、张自忠将军英勇牺牲的故事。生活在这样的抗日战争的环境里，怎能不把“抗日”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牢牢地植根在脑海里。

后来我们住在了老河口郊外，老河口当时是抗日的中心之一，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抗日战争使这个隶属光化县的一个小镇，一下繁荣了起来。父亲带我到街里看过京戏《梁红玉击鼓抗金兵》、话剧《雷雨》和《天字第一号》，《雷雨》我看不懂，只记得闭幕时一声枪响，从幕后传出“天塌了！”，《天字第一号》讲的是女间谍清除汉奸头子的故事，这个倒能看懂，话剧是重庆来的话剧团演的。

依我的年龄推算起来，这应该是1940年，大概是夏秋之际，日军大举进犯中原地区，后来从历史上知道，日本要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进攻南亚，竭力要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于是有了打长沙、衡阳，平汉线南段（豫南、鄂北）的举动，我父亲所在部队有了频繁地转移。现在我想起也许是为了守住进川的入口，军队奉命转移到鄂西，家属也跟着转移。我们经过襄樊、当阳、荆州到达宜昌，所以记得那样清楚，因为这是一条（三国的）老路，途经当阳时，运输的民工还指点了三国的古迹。从襄樊向南行的路上，一开始遇到很多军队撤退中掉队的伤兵和病员，景象看着非常凄惨，一个个破衣烂衫，腿瘸拄棍，骨瘦如柴。蹒跚慢行追赶队伍，随从护卫我们的当兵的说，前方会有收容掉队的兵站，有的走不动的，倒卧在路边不知是死活。把我吓着了直躲在大人的身后的一次惊恐，那是一个象骷髅一样的瘦的皮包骨

的人，突然从地下站了起来，伸手拿着破碗向我们要吃的，我不敢看，就是那一瞬间看到的，给我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映像。

在宜昌匆忙过江，印象深刻的是坐着轮船过的江，记事之后还没有坐过这样机器开动的船，觉着新奇。过江之后，就立即走在人迹稀少的山路上。印象中好像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我们拼命的逃跑。听他们说，轮渡马上就要停运了，宜昌即将失守。至今难忘的是，我虽然很小才七岁但也要自己走，实在走不动了，大人再背一段，大人们也是身上要负担着东西。印象极深的是，翻过一座大山，整一天的路程，上三十里、下三十里，最顶上称谓野三关，山上山下两个季节。记得那是夏天，到了山上冷极了，稍稍喘口气，冷得不行就赶紧向山下走，到山下我累瘫了，野三关的名字至今我还牢记着，永生不会忘记。然后继续行进到巴东，好像再坐船下行，到秭归。在秭归待多少日子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住在江边上，吃水是要从江里打上，沿着石壁上的台阶路跳上来，水倒在大缸里，要用明矾澄清。那时我也弄不明白，艰难险阻地走了那么多路，到了秭归，在秭归没有住多少日子，不知道为什么绕了这一个大圈子，从秭归又回到了出发地鄂北，驻在了光化县。这在行军打仗可能是很经常的，但是拖带着有老有小的家眷这么跑，这就是有点奇怪了。

从秭归是直接相北走的，没有再绕圈子了。也是翻山越岭到达了鄂西北的郢阳，坐着小木船顺汉江而下，木船在湍急河里漂流，时而向两岸的岩壁上撞去，全靠着船工篙撑把舵稳住船顺流而下，我们在船上惊心动魄，摒气静声，我趴着动都不敢动，现在每当看电影电视，

遇到放排这样的画面，就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一难忘的经历。坐船一直到老河口，下船后住到了光化县，部队的驻防也就在这里。

在光化县住在一个叫竹林桥的地方，相对的好象稳定了一个时期，我已经是七岁多了。师部里头头们一些七八岁的孩子们凑在了一起，请了一个先生，给孩子们进行一点启蒙的识字和计算的教育，识字和算术家里也教了一些了。但这像是上学了。特别是有师政治部的干事来教唱歌和讲抗日的故事，是最高兴的了。我们学了《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松花江上》、《保卫黄河》等等不少的抗日歌曲，还听到一些打日本的故事，特别是游击队的抗日故事。几个月或许是半年的时间，是我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的经历。

我八岁到九岁，大概是 1941 年至 1942 年的时候，军队进入大别山参与围堵新四军的行动。军队家属留在了豫南鄂北一带，也是时常转移，每到一地就在当地小学就读，也不记得转换了几个学校，每个学校也就几个月最多半年，有些学校都还正规地上了体育、音乐、美术课。断断续续上了三年级和四年级，学校条件都很差，但我总算是受到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抗战时期里爱国主义教育又都是最基本的，学会了唱更多的抗日歌曲。这个时候也开始作文，主题也多是围绕抗日的。

八、九岁时，最喜欢想听的是岳飞抗击金兵和文天祥正气浩然的事迹，和游击队打日本的故事；最喜欢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太行山上》《游击队员之歌》；最喜欢看的是一本申报六十年的《中国分省地图集》，看我走过的地方和路线，日本人占领了我们多少土地；最

喜欢在纸上涂鸦，高射炮打日本飞机冒着烟倒栽葱掉下来，刺刀刺向日本鬼子。孩子的脑子里就是“打到日本鬼子”“打到汉奸卖国贼”“抗战一定胜利”。

1942年在河南的时候，正是大旱，我们在河南的转移中看到，豫中地区成群结队的灾民涌入到南部，景象凄惨之极，逃荒的难民沿途乞讨，据说河南大地饿殍遍野。民间流传“蝗旱日汤”四害，旱灾滋生蝗虫，没有旱死的庄稼也被蝗虫吃光；日寇烧杀抢掠；汤恩伯的军队纪律极坏，抢民扰民，使老百姓深受其害。这时候看到的和听说的，深深地触动着我的心。后来我还知道了1937年为了抵御日军的进攻，花园口掘堤，黄河泛滥，再加上后来的灾难，河南人民在战争中死有数百万人之多。自古以来中原大地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乱频繁。抗日战争更是灾难达到了顶点。我看到和听到的都刺激着心灵，把日寇，也把汤恩伯的军队恨到了顶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次我去参观中国美术馆的馆藏，看到了占了一面墙的国画大师蒋兆和的大型国画《流民图》，是那么形象地描绘了，抗日战争时，中国人民颠沛流离逃亡的情景。我不由得想起我脑海里留下的三幅图画：第一幅1937年在陇海线上看到的携家带口，肩挑推车，拥挤在逃亡路上的难民；第二幅1940年在经当阳的路上看到的掉队的当兵的伤员病员，饥寒交迫行走在路上的情景；第三幅1943年在河南转移的路上，看到受“旱蝗日汤”四害的逼迫下，灾民们逃荒、逃亡的情景。这些我幼年在抗日战争里，留下的深深印象，多么像《流民图》所画的。同样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河南作家李

准编剧拍摄的电影《大河奔流》也表现了河南黄河两岸人民，历次流离逃难、逃亡、逃荒的流动画面，我看过电影，也觉得是那样似曾相识，但是我在看到《流民图》那个定格画面，与我脑海里记忆的形象吻合，更感到心灵的震撼。人物细微的面部表现，刻画了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正是我童年时印象的再现。尤其是1943年我已经比较大了，在河南留下的印象，要比前两次的印象更加深刻，正是《流民图》里所表现得那样。

1943年在河南内乡县，我进入了一个镇的中心小学，学校规模比较大，也较正规，大约是我十岁到十一岁。在那里上了四年级末尾和一个整个五年级。学校刚进了一批从信阳撤退下来的信阳师范的年轻教师和毕业生，这些年轻的老师，使学校充满了活力。他们不像以前老教师只是教学生死读书，而是启发式的教学生，更多是宣传抗日思想，给学生讲时事。讲太平洋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海上战争，我知道关岛、中途岛之战，美国打沉了日本所有的航空母舰；讲中国很多青年（包括许多大学生）参加远征军奔赴印度、缅甸前线，中国军队和日军进行的滇缅之战；也讲了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的胜利。所有这些都鼓舞着学生们抗日必胜的信念。这一年多在内乡县三官殿镇中心小学的学习，使我成长了很多，老师的教育也懂得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到了1944年的将要放暑假的时候，局势又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人想要挽救败局，疯狂的向南进攻，我父亲的军队又奉命向南调动，军队家属也跟随着向南转移。我们乘民船由河南进入湖北，经过老河口的时候，正赶上日本飞机轰炸。是傍晚时候，小船停泊在汉江离城

市稍远一点的江对岸。飞机轰炸的火光，防空高射炮炮火，探照灯光柱，还有漫天四射的红、绿、黄各样颜色的信号弹，映照着整个老河口城市上空。这样的景象我永远难忘，后来在看苏联影片描述德军轰炸苏联城市所呈现的，我觉得是那么似曾相识，正是我当年在老河口所看到的那样。这一次又是走过了鄂西大巴山东侧，来到了湖北秭归的三斗坪。这曾经是在四年以前从秭归到鄂北走过的，这次走的都很顺利，我没有留下什么深的印象。

我们来到了长江边上的三斗坪（就是现在三峡大坝的地方），住在离江边还有一段距离的山坳里（可能现在已是三峡库区湖底）。这里有一条通向湖南的官道山路，路上络绎不绝的民工，往返用背篓背着成袋的咸盐向南翻山，一站一站地转运到湖南。日本人封锁沿海不许食盐运往内地，想用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来扼杀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只有从这条路上把四川井盐，在三斗坪码头卸船，靠人力再运到被敌人封锁的广大华南地区，解救人民的生活必需。在这个偏远的山区上空，也可以不时看到飞机飞过，已经不是日军向重庆轰炸的飞机，而是美国和中国的飞机由四川飞出飞进，战争局势出现明显的变化。

我父亲的军队到了湖南，似乎是处于休整状态，大概国民党中央已经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需要精简军队，减少军费开支。我父亲军队里许多多余的军官，被调到顾问的编制，等候战争结束，另行安排。父亲则从师参谋长调任担任团长。同是上校，师参谋长不是直接带兵的军事指挥官，要晋升副师长、师长，要先有任职团长的

经历。父亲一直是从参谋、参谋科长、参谋处长、直到师参谋长，始终没有做过指挥官。调任团长显然是要为提拔副师长和师长做准备。

这时候我进入了一个称谓秭归县二圣乡小学的学校。在这里到1945年我上完了六年级，小学毕业，完成了小学学业。这里我从来没有再听到过老师讲解局势，局势急剧变化一点也不知道，只听说德国打败了，感到日本人也长久不了了，糊里糊涂地在学校里学着课本知识。那个学校很小，在一个厅堂很大的祠堂里，不分班级，不分教室。总共才二、三十个学生。教书的是两个老古董和两个年轻的，国语只会照着发下的教材宣读，算术就是要你按死公式计算“父子年龄”“鸡兔同笼”“里程问题”“工程问题”……等等。学校没有其他任何副课，倒是教写字时很认真的。旁边还有一些私塾学生，咿咿呀呀背诵四书五经，真是很独特的，这是一个典型的在闭塞山村的农村学校，公办学校和私塾混杂。学校所在的祠堂里，有民国总统黎元洪题字的匾额，这个村子是黎姓，像似与黎元洪有渊源关系。学校里也有一个在外边上过学的教师，那是老学究先生的儿子，偶尔也介绍了一点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尽管学校很差，我也算是学完了小学的基本课程。小学毕业，我十二岁了，童年结束了，“八一五”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也结束了。

进入了1945年，在这个学校里太沉闷了，学校里的教师很少讲抗日，学生也不知道抗日的情况，比起在中原的学校里，抗日的气氛差的太多了。那是一个抗日前沿的地区，师生们有着强烈的抗日意识，而这里封闭的山区不接触外面，尤其是在我父亲部队转移离开那个地

方之后，我更是没有了一点消息的来源。听到了德国投降，日本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失利，渴望想知道详细，但是没有人能告诉我，没有报纸，没有广播，也没有口头消息的传递。1945 年的多半年的时间里，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孩，都感到憋闷死了。周围的大人，我母亲、祖母，还有在我们家里的那几个勤务兵们，也不会关心我的心事，这一段时期我是糊里糊涂的，但是不甘心，过去很长一段抗日意识的培养，抗日环境的熏陶，自然形成了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抗日形势的发展，关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然而，在这里都给我封闭起来，我能够不焦急吗？“八一五”一声巨响了，炸开了所有乌云，我所有的心结释然了，等到了振奋的好消息。

1945 年初，我父亲的大部队就是沿着我们门前的官道，向着湖南方向开拔了。看到父亲随队伍的远去，这成了他和我们亲人的永别。到了湖南不久部队整编，父亲所在的师完全保留合并到国民党嫡系侯镜如的军里，父亲所在的原来的军和其它两个师完全撤消了。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参加了湖南石门芷江，日本在中国远东军的受降仪式，然后急促到了汉口，坐着美国提供的飞机，进入了北平。1946 年刚过元旦，他就战死在密云古北口。他是国共内战爆发前（解放战争开始前），国民党军人死去的较高官员。他是太大意，在前沿阵地视察时，中对方迫击炮弹身亡，仅他一人，身旁的卫兵都没有任何受伤。我常想，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都幸运躲过，如果那时死去起码是一个抗日英雄，而在这并没有开战，毫无危险的前沿阵地视察中身亡，落得个被解放军击毙，使我们子女，永远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袱。但是

回过头来想，他一次也没有赶上参加对抗解放的战斗，就死了，他可以说是清白的，所谓手上没有沾过“人民的鲜血”。这一点又使我们有了一点宽慰。

1945年9月多我们随着大批留守在三斗坪的军队眷属，坐船到了武汉，父亲的部队已经飞抵北平。我们在武汉住了几个月，又坐船到了上海，这时候已经到了1946年的春节，北平军部催促我母亲带着我，六岁的弟弟，才出生不久的妹妹赶紧北上，这时父亲已死亡，我们还全然不知。等到我们赶到北平，看到了是停在殡仪馆里的棺材，母亲当时就昏厥了，此时我刚过十二岁，童年就这样悲痛地结束了。

每当我脑海里闪起童年的片断，我就不太愿意想下去。那是因为我的出身觉得有些羞涩。我们那个时代的读得起书上了大学的，有几个不是富裕人家和阶级成份高的出身？有几个有着光荣革命的家庭背景？有几个是像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有着苦难的童年？童年是“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的符号。过去我们填写过各种各样的表，诸如党、团员志愿书和登记表、干部履历表、入学学籍表等等，都有“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两栏，开始还不以为然，后来，面对填写这两栏，特别是家庭出身填写着“反动军官”，就感到沉重和自惭。虽然说“出身不能选择，革命不革命可以自己决定”，但是我总不愿意触及“出身”这样的敏感问题。我不要求入党，不愿当官，不想获得“恩准”提拔，只求做一个普通的人。我从不向别人提起我的过去，甚至也不向我的孩子们，讲述我的家史和童年。这样的心理我想不止是我一个人，多数出身“不好”的人都是这样，也许这就是

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清高，不谈身世。其实就是在潜意识上自己把自己放在另类的位置上，逃避现实。过去我父亲对于自己出身，相对行伍军人，自豪称作是“书香门第”出身，我的祖辈清朝时确实是“书香门第”。而现在我就是要竭力回避，出身是“读书人家”的称谓，不觉得有什么光采。这就是时代赋予我的精神枷锁。

“你咋成了革命离休老干部”

1993年初我即将满六十岁，面临退休，系主任找我谈话，对我说人事处通知，根据我的档案所记我应该是离休。还提到，头年（1992年）提的几名教授是超名额的，这年都要不等到生日满整六十岁，就需办理离休退休手续。我当即答应，“可以，没有问题。”我心想，我研究生可以照带，科研照样进行，有什么不可以。更何况我的工资不变，因为离休，退休金比原在职时工资还要高一些，这不是挺好的吗？周围有些挺熟的同事，不大了解我的过去，感到很惊讶：“咦！你怎么成了离休老干部？”我也开玩笑地回答：“蒙来的呗”。的确，一、我不是当过兵打过仗，一直在上学念书；二、我也不是红小鬼、工农子弟，自幼参加革命；三、我连党员都不是，有什么资格是离休？这怎么不让人感到诧异。然而，这离休确实实是组织上按文件规定，经过审查确定的，不是我去要来的。在这之前已经有人告诉过我，中组部发过一个文件，像我这个情况，将来到退休时，应该是离休。我也没有去理会这个，到时候该是就是，不该是争也白搭。

这还要从1946年说起，那时我在北京崇德中学上初中二年级，中午上学的时候，我看到一群大学生有北大的、师大的，打着“反内战 反饥饿 要民主 要和平”的横幅标语，高呼口号，从西单沿着长安街游行，这时候一队警察涌过来，手持警棍、棍棒向游行学生打去，他们撕标语扯旗帜，驱散游行队伍，学生被打得四散。这一天是5月20日，警察的暴行被称为“五·二〇”事件。我的学校就在旁边（西

长安街六部口)，看到这一切，引起我强烈共鸣，我从内心要求“反内战、要和平”，我的父亲就是内战而死去的。又见到社会混乱，物价飞涨，人民生活疾苦，灾难深重；再加上官员腐败，政府无能，看不到光明，我很自然地接受激进的思想，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进步思想。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沈崇事件，美国兵在东单广场强奸了北大女学生沈崇，引起学生们抗议，要求惩办美国兵，可是当局把他交给美国军方被送回国了，又一次掀起学生风潮。这也是给我很大刺激，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胜利的中国仍然没有主权。

后来我更是受到我姑姑的影响极大。1946年夏天姑姑大学毕业从重庆来到北平，她有不少同学和朋友在北大、师大、北方交大，他经常带着我到这些大学里玩儿，认识了她的那些同学和朋友，他们对时局的言谈和评论，以及宿舍里随处可见的油印宣传品，都深深影响我。我跟随姑姑参加了北大民主广场的篝火晚会，第一次学会唱“团结就是力量”，看到学生们“要和平 要民主”的高昂呼声，鼓舞着我，激荡着我。北大民主广场上的墙壁张满了壁报、墙报，有时候我白天就骑车过去看那些墙报。墙报的内容充满了大学生对时局的看法和对内战的强烈不满，表达了学生们对民主的渴求。墙报上有诗歌，有散文，有杂文，讴歌光明，讴歌民主。

有一次姑姑还带我去国会街北大五院的礼堂里，观看了学生们的演出，第一次看到歌剧《白毛女》的片段《北风吹》。看到封建地主对贫苦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使人们感受到这个黑暗的社会，不摧毁不行。在大学的宿舍里，我还跟着他们学唱《马凡陀山歌》的

《茶馆小调》《你，你，你这个还东西》，还听到了和学唱歌颂解放区的歌曲《山那边有个好地方》《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等等。1947年的一年是我思想从年幼无知，转变到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政治走向青年开始成熟的一年。这就是人们常的说思想有了转变，开始走向了进步。

1947年以后，大学生的激进活动当局严格禁止了。但是我更多地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进步书籍来看，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八月的乡村》、《小二黑结婚》等等文艺书籍，还有《大众哲学》、《革命的人生观》《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政治书籍，这样渐渐地了解了共产党，了解了解放区，了解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我还没有走向革命，思想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所谓思想有了觉悟。我这样一个思想的转变，成为我后来参加共产党地下外围组织的思想基础。1949年我申请入党时，撰写的自传中1947—1948年思想转变的叙述，对政治审查，更是至关重要的。后来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交代历史、在思想改造时的学习总结、或是受到审查，都要写出和叙述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当然都是啰啰嗦嗦，还要加上很多的自我批判。就是说不论你有什么样的革命光环，只要是非无产阶级出身，永远是要检查你的阶级思想根源。

这个时候我还并没有直接接触，崇德中学党的地下组织。实际上，崇德中学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是很活跃的，但是我并没有与之联系，我是国民党军官的子弟，平时在学校也没有什么言论，表现平平，不会引起组织的注意，后来，在两件事情上引起注意了。第一件事，1947

年春，华北学联（受中共华北局领导的），发起和组织为贫困学生募捐助学，并没有任何人指派我，我看到几个低年级同学背着募捐箱在街头向行人募捐，像乞讨似的受到厌恶，也募不到多少钱。我就帮着他们到餐馆、咖啡厅、百货商场里，向看着比较有钱的人募捐。募捐小组佩戴着发的募捐标记和学校的校徽，捐钱后还回赠一个纪念章，因为有目标地去募捐，一般都不会碰钉子，还能得到比较多的捐助。其实我并未参加募捐小组，只不过帮着小同学们一点忙。小同学在上交募捐款时，自然会说到我，组织募捐当然都是地下组织的人，会把我记下的。第二件是这样，1947年寒假，华北学联组织了进步的大学生，在各大学里，办起为中学生各科补习班，我积极报名参加了，还拉了别的同学一起去。中学里具体的组织这是学生自治会，学生自治会，自然是控制在进步同学手里。补习班除了讲各科的知识，其实更多的是游戏、讲故事，在补习班里并不直接宣传什么，就是让大学生与中学生交朋友，去影响中学生。这个我又一次被地下组织的同学注意到了。

经过上面所说的两件事情，我被注意到了以后，先是高班的同学，像是无意的和我闲聊天，问到我的家庭，我说到我的父亲是军人，抗日战争中没有为打日本人牺牲，而是战争刚胜利，却为打内战卖了命，我痛恨内战。后来，本班的地下组织的同学主动地接近我，和我谈心、聊家常，我说了受姑姑的影响的思想转变，接触了一些大学里的进步学生，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对解放战争有一些初步认识。和班里的这个同学在比较多地接触里，他也就对我有了更深地了解。

他有时到我的家里来找我，对我的家庭也有了更多的了解。按地下组织的规定，开始他和我只能是单线联系。我的这个同学名叫谭恩晋，当时他是班长，学习成绩非常好，连教英文的英籍教师都非常喜欢他，在班上的年岁较大，他的威信很高，同学们都叫他老谭，解放后还选做了学生会主席。我们高二那年老谭就参军了，文革后是国防大学教授、政治系主任，后又任教育长、党委常委，也是将军。

老谭和我联系了一段时间之后，向我公开了他的身份，他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这个我早已知道，在大学里叫做“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我姑姑的同学和朋友就是“民青”，那么，“民联”就是中学里的组织了，以示区别。我心里明白，地下组织在接近我，当然是要好好考察我的，说不定还要经受考验，这是我瞎想的，后来也没有什么考验。其实，此时老谭已经是地下党员了，而且是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1948年初，我姑姑在她教书的中学里，过于锋芒外露，说话不注意，被盯住了，列入了黑名单。组织上通知她赶快离开，于是她就由组织安排，去了解放区。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老谭，似乎我又受到了更大的信任。我姑姑的朋友们也鼓励我，要主动地去接近组织，加入到革命队伍里去，像姑姑那样投身革命。

1948年的4、5月，谭恩晋对我说，你愿意加入“民联”吗？你怕不怕危险？我说，我知道这就是参加革命了，革命没有不危险，既然要革命就不怕危险。其实就是因为岁数小，没有那么多的前思后虑，也觉得是挺好玩的。我就是这样参加革命了，成了地下共产党外围组

织的一名成员。地下工作的规定即使是入党，也没有登记、填表的手续，只要记住你的介绍人，他就是你加入组织的证明人，地下斗争的需要必须是这样的。

1948年的暑假之后，见到了谭恩晋，剃了一个寸头，人晒得黧黑，我惊讶怎么变成这样，他说回乡下老家了，我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后来悄悄地告诉我他去解放区学习了，他说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组织城内地下的同志，到解放区去学习，培养干部，提高思想，布置任务，准备迎接城市的解放。将来党的工作的重点要逐渐从农村转向城市，共产党要逐步去解放接收大城市。后来知道这是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全党组织学习，为迎接全国解放做好思想准备。北平秘密去到解放区学习的人，是集中在冀中某个农村地方，开大会和听报告的时候，或是外出活动，每个人都带着只留出两个眼睛的头套，不是一个小组的人，不互相来往，保证回城以后的安全。

1948年解放战争地快速发展，革命形势变化，地下组织的任务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秘密宣传、秘密联络、秘密发展组织成员，转变为加速团结进步力量，扩大统一战线，发展革命队伍，宣传革命形势，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我也发展了两名和我接近要好的同学，1948年底我们班上一共有七、八个人了，也不再单线联系，而是组成了小组，大家互相公开，共同学习文件，组织讨论。1948年上半年，我主要是和谭恩晋单线联系，单独完成交给我的一些任务。例如取送传单、文件之类的事情。那时我也不问班上其他人谁是“民联”。

1948 年下半年开学后，我进入了高一，我们班上的组织活动转变了方式，不再那么绝对秘密，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集体地过了的第一次的组织生活。我们被通知，到就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同学的家里聚会，这才知道了其他的“民联”成员。这是谭恩晋去解放区学习回来后，“民联”活动的一个重大变化。我们第一次的开会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个人虽然大家没有相互公开，但是也都心里知道不说。这一次的活动首先是谭恩晋讲了组织的纪律，诸如，不能向组织以外的人透露自己的身份，包括家人；要保守组织秘密，不乱说、乱讲；要忠诚组织，面对敌人逮捕、审问，坚决不承认，装作不懂事、幼稚，利用家里的一切关系营救；要做一个好学生，要保持好的学习成绩，不引起敌人怀疑，通过学习也能团结更多的同学，等等。我们两三个星期就会碰到一起，有时候是学习文件，有《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

有几次领到一些任务，例如散发传单、宣传品，偷偷摸摸在夜间张贴“中共中央对解放战争形势的阐述”，“中共中央对城市工商业者和城市民众的政策”条文。我们小组活动，人数不断增加，到 1948 年 11 月多北平城被解放军包围，学校停了课，我们小组的活动更加活跃。北平临解放时“民联”小组有八、九人之多，队伍真是在逐步壮大。这个时候主要任务是迎接解放，我们建立了同学间的联系网，高年级的学生成立了护校队，我们把学校里军训用的训练枪支集中了起来。真是解放军攻入城里，出现骚乱，我们的假枪、棍棒也可以用来对付抢劫的暴徒。

我们经常活动的那个同学的家里，被警察搜查，他的父亲也是一个民主人士，警察是冲着他的父亲去的。正好我到他们家去送材料碰上了，把门的警察拦住我，问我，干什么？我说我来找同学，我装作好奇往门里看，警察赶我，“快走！快走！不能在这儿待着！”后来我们的活动就换到另一个同学的家里。

我完成过的任务，第一次是谭恩晋带着我到北大红楼地下室取书，书的封面是周作人的《秉烛夜谈》，而内里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的学习材料；后来我单独的去过北大五院的印刷厂，找一个师傅，取传单等宣传品，然后又把部分的宣传品送到师大女附中，交到一個指定的同学手中；还去到北大工学院拿过宣传材料。还常带着宣传品和进步书籍，到同学家传递、交换，反正我看起来就是一个未成年的中学生，背个书包骑着车，没有人会注意。有一次在大街上正好碰上，许多警察拦住行人搜查，似乎是查武器，因为还搜身。我到了跟前，把书包打开让他们看，书包里还真有违禁的书和别的什么，他们看也不看，挥挥手让我过去了。我真的觉得很好玩儿。这还是孩子的心理，其实对敌斗争是很严酷的。

在北平围城时，我们干过在清晨人门还没有起床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布告》《北平市军管会告北平市人民书》等宣传共产党政策的传单，偷偷塞进住家户里的报箱里，晚上又偷偷张贴在小街和胡同上的电杆上和墙上。警察把它撕掉或涂抹掉，我就把它贴在警备司令部的布告上，他们撕不掉，还遮挡了他们的布告，真是一举两得。

1948 年底，北平城被紧紧围住了，城门关闭，城外几百米的地方就是解放军。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都已经解放，国民党的军队全都龟缩到城里，解放军兵临城下并不攻城，只是逼迫着傅作义接受和平起义的谈判。解放以后，谭恩晋还告诉我，围城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扮装成一个拉粪的工人，跟着粪车出城，向城外的解放军送递情报，这是北平地下共产党城工部，从敌人内部获得一份紧急情报，必需尽快送出。那时北平没有现代的污水排除系统，城市里每天的粪便都需要及时拉到城外的晒粪场，城内没有积存粪便的地方。老谭告诉我他也不知道情报的内容。拉粪车是组织上找关系带他出城的。北平城里没有大工厂，估计也没有很多产业工人党员，地下组织的工作也只有依靠学生知识分子。

围城起初，上级组织传达布置下来，要准备着进行艰苦的斗争，迎接解放。地下组织要求组织好工人、学生们做好护厂、护校的准备，成立纠察队，保护好国家财产。我们学校地下党的负责人（也是学生），找到校长公开亮明身份，要求校长忠于职守，保护好学校财产，保证北平解放后，学校能够正常开学上课。

实际上，傅作义在城里有几十万军队，还有在岗位的警察，完全控制着局面，他很明白不能做千古罪人，要保住千年古都的古迹建筑。和平解放的谈判进展很顺利，人们翘首以待，奔走传递消息。地下组织也完全放松紧张，停止了活动静等着好消息。

1949 年元旦过后，我们很快地知道了新华社的元旦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通过组织得到了这个社论铅印的传单，看到了很鼓舞

人心，还偷偷地把它散发出去。后来《毛选》刊登了这篇文章，说明这是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

一月中某一日我得知，傅作义和解放军的谈判取得了成功，傅接受了和平起义的条件，我这是从国民党傅作义总部一个军官那里听到的，真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当天晚上我骑车奔走相告另一个同学，我们“民联”同志。由于急促，我骑车差一点撞上一辆国民党军车，吓得我不轻。当时喜悦还是使我忘记了害怕，只是过后回想，如果糊里糊涂被撞死，那真是冤枉透顶。大黑天里撞死，无人知无人晓，说不定当兵的把我尸体扔到什么鬼地方，成了我失踪的一个永远的迷。

1949年1月31日，北平终于和平解放了，北平市民一颗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人们兴高采烈地迎了解放。学校如期在3月1日开学。不久，学校的布告栏里公布了学校里中国共产党党员的名单，同时也公布了中国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的名单。至此，地下组织完全公开了，画上了“地下”圆满的句号。以此为线，这以后入党入团的都不能算离休。自1949年4月16日，所有“民青”“民联”的成员，都自动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正式填写了入团志愿书。

这就是我“离休”的来历。

我的一九四九

1949 年是新中国新纪元的元年，对于我来说也是我人生进入新阶段的开始。那一年 10 月前还称作是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我还不足十六岁，刚刚步入高中在北平崇德中学（现北京 31 中前身）读书，正是人生成长青春年华的开始。更因为我觉得还是一个参加了革命，取得胜利的革命者，青春的萌动，胜利的喜悦，对未来的憧憬，美好的幻想，相伴着崭新时代的到来，内心感到无比地欢欣喜悦。这一年充满着热情、激动、奋进，积极地投身到一切社会活动里，留下了是永不磨灭的记忆。我也从这个时候，像是逐渐走向成熟，自我认为在走向革命。1949 年是中国改变了历史的一年，也是我人生道路上转折的一年。

1948 年底，北平城被解放军紧紧包围了起来，城里可以听到城郊激战的枪炮声，预告着北平即将解放。我和另一个同志受地下组织的指派，在北大红楼地下室取回大量秘密的印刷品，再分到地下各小组同学们的手里，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告》《北平军管会告北平人民书》，以及一些共产党的政策宣传材料。这些宣传材料是我们在夜里或清晨把它塞入到住户的信报箱里，有一些则是夜深人静时，张贴在街巷墙上或电杆上，甚至盖贴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布告上。我们也在同时准备着护校的组织工作。1949 年 1 月之后逐渐听到了国民党军傅作义总司令派人与解放军和平谈判的消息，不久地下组织即正式传达了，傅作义接受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协定，率全部国民党军队举行起义。我们要做好迎接解放，迎接解

放军进城的准备。

1949年1月31日北平正式宣布和平解放，前一两天城门就打开了，人们可以自由出入。30号那天，阴历正月初三，我姑姑在师大的两个同学，带着我骑车出西直门去海淀。他们得到消息，说我姑姑在北平军管会文教组，现驻扎在海淀，邀我一起去找我的姑姑。大约是在上午9、10点的时候，正赶上解放军列队替换把守城门的国民党军，这真是一个永远难忘的场景。一队解放军排队走到，站立在城门口的国民党军前面立定，互致军礼，交换位置，解放军站立在城门口，国民党军排队向城外撤去。我们从西直门汽车到了海淀镇，沿路的两侧是纵横的作战壕沟，北平城外是一片战场的景象，幸亏攻城作战没有打起来，真的打了起来，不知道又有多少生命涂炭。

我们到了海淀打听到，军管会的文教组是在颐和园后面的青龙桥，到了青龙桥还是没有找到我姑姑，我们只好去到清华大学。在学生食堂里吃了晚饭，住在了清华。在清华看到大学生们正在排练准备进城宣传的节目。晚上又去到燕京大学礼堂，看了两校学生的文艺演出。节目也是为进城做宣传准备的。这一趟的出城，深刻地感到一个崭新的新时代即将开始了，日萦梦寐的美好社会将要到来了。

2月3日举行解放军入城式，我们被安排在前门大街上欢迎解放军。当时尚未开学，动员了部分进步同学通知到所有同学，在校集合，到指定地点，等候解放军的到来。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列队的大量多兵种解放军，带着各种缴获的美式装备，鱼贯行进。指挥车打着头阵，美式十轮卡车载着，头戴钢盔枪上刺刀的机械化部队士兵，威武雄纠

行进在前列；步兵打着背包挎着步枪、冲锋枪、机关枪各式武器，汗流浹背地快步前进着；轻型的坦克、装甲车、汽车拖着的各式火炮缓慢地开动着；骑兵显得很威武，手持马刀挎着骑枪，昂首挺胸地骑在马上。入城式从永定门进入，向北从北面的城门出城。入城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我们激动、兴奋，喊哑了嗓子。

这个入城式两个多月后，我们又重演了一次，这次是应帮助苏联电影拍摄小组拍摄彩色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再现解放军入城的情景而组织的。这次我们不是在前门，而是安排在东交民巷，美国领事馆的门前，我们打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横幅标语，每个人都手拿着欢迎的小红旗，配备着锣鼓，还有穿着彩服的腰鼓队、秧歌队，表现热烈欢迎的场景。真实的那次欢迎，是北平刚解放的第三天，根本来不及做任何准备，连人群都是临时召集起来的。稀稀拉拉拿着数量不多的欢迎小旗。这一次可是场面浩大，不少学校的学生，还有市民，把东交民巷美国领事馆门前的不长一段街区挤得满满的。拍摄开始了，解放军进入镜头，还跟着坦克来了，人们高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打到美帝国主义！”，可能没有几个镜头，还重复地拍了几次。拍摄活动的组织者、苏联摄制小组、欢迎群众、解放军队伍都忙得不亦乐乎。后来看到了放出的电影，还真是气势宏伟，场面热烈。这一次的拍摄活动，我是带队人之一，是做为政治任务完成的。

几个月之后，大约是 1949 年 5、6 月份，我又一次来到美国领事馆，还进到了里面。这个时候美国人已经全部撤走，新成立的团中央

临时在里面办公，团中央宣传部准备出版青年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为了征求广大青年意见，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我接到邀请通知，来到一个小楼的会议室里，长形会议桌和座椅都是后来在电影里常看到的高档西式家具，我只记得主持人是韦君宜，作家，后来还是作协的副主席。参加座谈会的人并不多，每个人都轮到了发言，我讲了什么记不得了，可能讲的很稚嫩，引起了笑声。原美国大使馆（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时期）的院子，全是两层的小楼，绿草如茵，花团锦簇，我是第一次临近这样的洋房园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49年3月学校正式开学上课了，因为我们是英国基督教会办的私立学校，校长和学校机构没有变化，上级派来了政治老师。没有想象地由政府接管。只是成立了党支部，政治老师是党支部书记。随后公布了学校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成员的名单。学校里的政治思想教育，一方面是通过政治课讲解基本的政治理论，例如社会发展史、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另一方面是一周一次全校性的政治报告。这些报告都是由区里统一安排的，报告人是派的专门的政治工作者，轮流到各个中学里去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有：革命形势报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革命觉悟和道德品质教育等。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决定：成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把全国各地区各地方由各地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统一起来，成立全国统一的，由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青年团，建立团的中央委员会。团的纲领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团的性质是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

织。团的名称简称为青年团（不称做“新青团”）。1949年的4月16日在北平召开了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冯文彬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团代会的会场在西长安街的新新大戏院（即，后来的首都电影院），正好在我们学校旁边。开幕式的那天是星期天，我们学校的民联成员和许多进步同学都安排在代表席外的座位上，填满会场里的空座。冯文彬代表党中央青年工作部做了报告，讲了团的纲领，团的性质、团的任务，团的章程。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初期，效法苏联成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共青团是被称作是共产党后备军，共青团员年龄达到成年，并经受考验，可以直接转为共产党员。那时在地下斗争的条件下，入团与入党一样审查很严格，只是因为年龄不够，才是团员。现在明确了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只要有进步要求就可以申请入团。团代会闭幕之后，学校里所有了民联成员全部转成团员。为了庆祝团的成立和民联成员转团，全市的中学生民联成员，总共有400多人，在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河柏树林里，举行了联欢会，大家唱歌，学跳集体舞，欢闹了一个上午。

这之后我们学校发展了大批进步青年入团，团的队伍迅速扩大。以班为单位成立了团支部，我被选为班上团支部委员。学校里建立了团总支，我又担任了团总支宣传委员。4月16日是团的成立日，“民联”成员的入团志愿书上填写的入团日期一律是4月16日。这是一个界限，4月16日以后入团的，都不是地下“民联”成员转的。后来有些人想证明自己是1949年10.1前参加革命。说自己是49年10.1前入团，好弄个离休。为此曾有两个人，通过组织向我调查。我答复

凡 1949 年 4 月 16 日以后入团的，都不是解放前加入“民联”的。北平一解放，“民联”就停止了发展。入团不能算参加了革命，解放前参加“民联”的才算。

北平刚刚解放，各个学校都组织秧歌队、腰鼓队，因为我负责宣传，由我带队到王府井北平美专（现在中央美术学院）去学习扭秧歌。教秧歌的是部队文工团的。我们挑选了一些初中学生，学好回来后，普及更多的人扭秧歌。因为我们是男校，没有组织腰鼓队，只学扭秧歌，还有几个人学习敲锣打鼓。去了两三次也就全都学会了，这以后凡是集会游行，我们的队伍前面总有一个几十人的秧歌队，但是也不穿着花枝招展的衣服。

以后我们联系附近的女中，女一中、笃志女中，共同普及和学习集体舞，参加的大多数是初中学生，高中生比较少。由于男女分校，高中生男女有别的观念很强，尤其是男生。

北平解放，我母亲惦念着抗战前，外婆带回福建老家我的妹妹。她借着帮助起义的南方籍国民党军人及其家属遣返，从塘沽乘船到了上海，再转船到福州。此时正是解放大军渡江，她赶紧到了闽北乡下，接了妹妹到福州，住在福州亲戚家。福州解放，直等到第二年津浦路修复通车，再到上海乘火车回到北平。母亲这一趟的南行，几乎花费了我们家积蓄的大半。十几年的战乱，骨肉分离，终于全家得到团圆。母亲、奶奶、姑姑和我们兄弟姐妹四人悲喜交加。在战争中我们全家颠沛流离。除了过世的父亲，我们还是不幸中的万幸者，

4 月底全国解放形势迅猛发展，4 月 20 日解放军分三路越过长江，

21 日解放南京。我们忙于出板报，做宣传，庆贺解放军的节节胜利。接着，5 月 25 日解放了上海，那是在解放了苏州、杭州等许多城市，又返过头攻打上海得解放的。上海城防司令汤恩伯扬言，上海是固若金汤，然而是不堪一击，他早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湖南、云南、绥远（现在内蒙西部）、新疆的国民党军队，相继宣布起义，只是四川、广东尚被国民党盘踞，广西还有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全国解放已是指日可待，新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将会很快地诞生了。我们搞宣传，每天都组织板报组的同学，用黑板报即时报道解放军胜利的消息。

记得那年，5 月 1 日还没有开始在天安门集会游行，我们是用劳动来纪念劳动节，开展了列宁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关、学校、街道，轮流到天安门通向正阳门的皇城红墙甬道内，清除和铲运堆集多年的垃圾和渣土。这是最初的对天安门前地段的修整，后来的两年中又拆除了天安门正面和甬道两旁的红墙，再就是拆除了大片的民房，天安门前两边的东西三座门也拆掉了。建成了现在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在建成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北平的许多市民（包括我们中学生）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出了力。我们学校离天安门很近，5、6 月份我们不止一次地参加了天安门的义务劳动。

7 月 1 日北平市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大会，大会是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唯一一次最近距离地（因为先农坛体育场不大）看见了毛主席。出席大会的还有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陈云、任弼时等，除了共产党领导人，还有很多民主人士。大会由彭真主持，郭沫若在大会上朗诵了歌颂共产党的长诗。

因为是平生第一次参加如此隆重的集会，我是怎么也忘记不掉的。当然在会场上我们也是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注意到了刚解放的时候，各种会议的会场上主席台上都是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并排画像，好像从这个时候起，会议主席台上挂着的就是单一的毛泽东的肖像了。

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12周年纪念日。北平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被启用做为纪念大会的主席台，天安门前的宽阔马路做为主会场。毛泽东主席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也是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和群众一起举行大会，会后进行了群众游行退出广场。毛泽东在城楼楼上与群众招手，群众高呼着“毛主席万岁！”，这也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群众第一次，上下呼应地交流着，第二次就是两个多月后，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7月7日那天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五、六级的大风，我们在东单广场上等候开会。东单广场曾是外国使馆的练兵场，北平临解放时又扩大做了飞机场，准备送傅作义南逃。广场上被大风刮得飞沙走石，我们在广场上，睁不开眼睛，一个个都灰头土脸的。我们只得蹲在地上躲避着风沙，大会上说些什么，怎么进行的，都一概知道了。等到我们从东单广场行经天门的时候已是傍晚，天安门城楼上已没有了，党的领导人的身影。

暑假开始了，我参加了“北平大中学生暑期学习团”，为期一个月。学习是听报告、讨论、讲体会。听报告是在沙滩北大的民主广场上，广场搭着苇席大棚遮阳，有时候也在晚上听报告。学员们住在北大和附近一些中学的教室里，学员像是有一两千人，听报告坐满了广

场（坐在马扎上）。作报告的都是一些有关领导、长期经历斗争的革命家、马列主义理论的学者专家。我记得作报告的有彭真、陆定一、周扬、蒋南翔、冯文彬、许立群、荣高棠、薛暮桥、胡绳、艾思奇等。他们分别讲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和阶级斗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等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这一些基本知识对我理解以后的许多政治问题和政治斗争，起到了不少点拨的作用。

这之后，我又参加了一个大约十天的团干部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都是各校的团总支干部，我们学校去了两个人。只记得团市委书记讲了一些团干部的工作方法问题，和联系群众的问题，更多的是一些学校的团干部介绍工作经验。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女一中的一个干部特别能说，讲她们怎样开展和团外青年交朋友的工作，再有就是两个天主教的中学的同学，讲了天主教的思想禁锢，一个是王府井的崇慈女中，另一个是西什库的耕莘中学，它们都是被封闭在教堂的大院里面，完全是没有被解放的感觉，团的工作开展起来困难极了。学校里少数的几个团员，像是在做地下工作，偷偷摸摸的发展团员。

9月份，新的学年开始了，我进入高中二年级，许多课程有了新的改革，国文改名为语文，废除了以古文为主的教学，介绍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英语选了不少苏联中学英语教材的内容，历史用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做为主要的参考书。

开学后的有一天，一节空堂课，校长凌贤扬来到了我们教室。他

对我们说，他要离开学校，去到教会担任专职的教区的主教工作。这是一个在英国留学，培养出来的专业神职人员，有着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在崇德中学担任校长已经多年。他还讲到世界将来会慢慢走到一致，实现基督精神，世界大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没有阶级。他说，这也和共产主义是相同的。他还说，现在英国已经是工党执政，工党领袖艾德礼做了首相，也是工人阶级掌权，许多工矿、铁路交通实行了国有化。有的同学问他，那英国还会是大英王国吗？他回答不出来。下课后我们议论，他这是反动宣传。我们通过党组织向上作了汇报，没有下文。其实这位凌主教是一个开明的宗教人士，首先还是拥护共产党，后来还做了中国基督教三自委员会主席。他的言论只是代表了他的认识。（“三自”是指：中国境内的天主教、基督教不接受罗马教廷和西方国家教会组织的领导和资助，脱离一切关系。自主传教和进行宗教活动，自筹活动和生活经费，自选和委派宗教各级神职领导人和工作人员。）

1949年9月，人们都密切关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主席政协开幕会的经典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震撼了中国，震撼了世界。政协会议开幕，不知触动了胡风的那根神经，使他兴奋不已，在《人民日报》整版的发表了他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欢乐颂》，也许是受郭沫若“七一”时朗诵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长诗的影响，更加起劲的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尽管他竭尽全力地歌功颂德，但是还没有逃脱毛泽东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命运，并且牵扯到许多党内外革命者，掀起了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逼死

的逼死，坐牢的坐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大冤案。1984年平反，“反革命”的定论完全是无中生有，空穴来风。只是毛泽东的一句话，胡风反革命集团，就拍板定案了。

政协会议闭幕，通过了《共同纲领》。决定了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国旗、国徽、国歌；决定首都定于北京，北平更名为北京；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年号以国际通用的公元表示。开国大典定于10月1日。学生们沸腾、欢悦，出版大字报，张贴标语，学生会和一些老师们按公布的规范，制作了参加庆祝游行的国旗，同时还写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横幅。学生们还自发地要制作，像过去庆祝民国国庆双十节提灯游行的灯笼，后来传达下来，不进行夜晚游行，制止了制作灯笼，只是制作了拿在手上的小旗。

10月1日，师生们在校集合起来，到达东长安街的指定地点，等候着开国大典的开始。下午两点的时候，我们听到礼炮的轰鸣，开国大典开始了。那时候东长安街上还没有很多高音喇叭，我们听不到广场上的声音。由于东西长安街还没有加宽扩展，天安门前的东西三座门的阻挡，检阅和游行的队伍不能列成方队，游行队伍排面小，拉得长，行进的速度慢。我们一直等到下午5、6点多，才到达天安门，我们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看到我们的校旗，呼应着：“崇德中学的同学们，你们幸甚啦！”一直拖到了晚上游行才结束。看来因为是第一次组织这样的游行，没有经验，场地条件也受到限制，集会

游行才拖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来展宽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马路，改进了游行队伍的组织编队，第一次那种上下呼应的场景，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后来，军队检阅和群众游行，一共也就两个多小时结束了。

9月之后，党团组织都大力进行组织建设工作，我成为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每个星期日都要去听党课，或学习讨论。快到年底，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报了上去，批准我为两年候补期的（因为离十八岁还差两年）候补党员，直到1951年我即将毕业，组织要求我留校，我没有同意。我考上了大学，没有转预备（那时已不再称呼候补）党员的关系。后来中学的党支部通知我，到大学你再重新申请入党吧，于是就取消了我的预备党员资格。我的出身不好，再加上我被取消预备党员的伤痛，从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入党。

1949年年底，我们班级排演了话剧和别的一些节目，准备元旦联欢的演出，以团员为中心全班同学同心合力，在元旦的联欢会上获得圆满成功，还被选上参加校外的汇演。元旦联欢演出之后，我们参加演出的这些同学，成立了一个社团，起名叫“五〇社”。大家特别高兴，庆贺演出成功和社团的成立，我们在学校里自己动手用从家里带来的家什，包起了饺子，是在教师食堂的炉灶上煮的。我们这些刚刚开始成长的孩子们，满怀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激情地迎接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到来。但是当时的孩子，未曾想到这以后的几十年里，风云的变换，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无穷斗争，把我们许多人推向了苦难的边缘。

最近这二十多年，国家终于摆脱了无休止的斗争，走向健康发展

的道路，无数人为之流血牺牲、拼搏奋斗的理想，初步地实现了。如今国家强大，屹立东方，人民生活富裕提高，社会安定和谐。这一切无疑是因为国家走上了一条正确之路，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六十多年来，特别是前三十年，我们虽然困难重重，但也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得到过各种表彰和应得的待遇。个人在极左年代受到的一些委屈和不公的对待，只有宽胸释怀，当做过往烟云。

对于我们这一代曾参加了新中国建国，后来又参与了新中国建设的人，毕生都是在这个时段里，从 1949 年开头的这一年，应该是我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因为我们是目击者也是亲历者。对于我来说，更是这样。1949 年的经历丰富多彩，那是我人生成长的起步，也是人生转折的拐点。所幸我没有拐到深渊和沟壑里，只是一些波折，所留下的大多数还是比较美好的回忆，特别是 1949 年。

大学，造就我成了一个知识分子

1951年我高中毕业上了大学，正好年满十八岁，人生开始登上了一个新台阶，我当然是非常高兴的，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大学称之为高等学校，因为它是培养社会各行各业（文、法、政、经、理、工、农、医等）的高等专门人才，在五十多年前这些高等人才，绝对地称之为知识分子。那么大学就是造就知识分子的工厂，进入了大学就是跨入了成为知识分子的门槛。

知识分子这个名称，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界定出来的，革命年代和抗日战争时期，一些有点知识的青年人，投身到革命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中，相对于众多的工农群众和工农干部，这些知识青年被称做是知识分子。随着共产党革命胜利了若干年后，知识分子的界定也跟之变化。因为达到中学一般知识的人太多，也就不称其是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的界定在，只有是经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伟人说过，知识分子是阶层，不是阶级。知识分子必须依附于某一个阶级，是毛和皮的关系。革命时代一些知识分子投入革命，依附于无产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原来为倒台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众多知识分子必需改换门庭，“皮之不存，毛焉附耶？”那么知识分子们必需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为取得政权的统治阶级（无产阶级）服务，否则仍然是反革命营垒里的敌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过大学教育的是知识分子，没有上过大学的只称谓知识青年，若干年后知识青年分别称谓有文化的工人、农民、干部……等等，少数的成为各级党政官员，被称呼着各种官称。

都不列入到知识分子的范畴。未来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社会的发展，当社会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大的时候，知识分子的概念会逐渐模糊，知识分子的阶层最终会不存在了。

五、六十年前，虽然已经是解放后，但大学仍被看做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最后堡垒，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一定是严重经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污染的，因此要不断经过学习和改造，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知识分子才能彻底地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要使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工具”，能不经常需要学习和改造吗？

我上了大学，按照理念，当然应该是为服务国家和为社会学习本领和知识，同时也注定了要不断“学习—改造—学习”的命运。这是那个时代任何一个知识分子也逃脱不掉的扣结，即使是加入了共产党，成了一名党员，也一样需要学习和改造，走革命化的道路。

我四年大学却经过了三个学校，三个学校有明显的不同，特别是前两个学校。三个学校是北京工业学院（华大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

1951年我考上了华北大学工学院采矿系，这是从老解放区迁过来的一个革命型学校，利用了原中法大学的校址，归属当时的重工业部领导。为适应建设需要，改变原来革命型的速成学校，成为培养高级人才的正规大学。实际上这个学校应该算作是一个新建的高等学校，只不过沿用了老区华北大学的名字。教学建设上完全是重新开始的。原中法大学理科的底子很不足，更没有工科。而新的华大工学院则有

着全部工科院系的架构，有：机械、电机、土建、汽车、化工、冶金、采矿、航空等等。从四处搜罗了一些教授，搭起了一个新的大学，表面上有革命学校的包装，内里则是老大学的体系。我选择了这个学校，因为这个学校全公费，管吃管穿，享受供给制待遇，每月还发给零用生活费。选择采矿专业是考虑这个专业能容易录取，也加上受我姑姑一个朋友的影响，他是学采矿毕业的。

华大工学院还保留了很多革命学校的传统，早上六点起床，上操跑步，然后洗漱、吃早饭，上早自习，八点正式上课，上午四节，下午两节及自由活动。晚上两小时自习。十点准时统一熄灯。作息很规律、刻板。各个班都有固定的教室，从起床离开宿舍后，除操场外就全天在教室里活动。课后的很多时间用来政治学习讨论，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我们又是安排在西郊车道沟正在建设的校址，那时还完全是一个工地，教室和宿舍都是零时的平房，睡的是大通铺。学校四周都是农村，离市区很远，那时也无公交车，哪里也去不了，完全过的是兵营式的生活，确实像一个革命大学。

1952年我们大一下学期，因为需要开化学课，化学实验室在城里校部东皇城根原中法大学内，大一上学期一结束，我们班就搬回城里，住在钱粮胡同的宿舍。这时候应该是放寒假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假，部分同学做为工作队队员投入社会上“三反”“五反”的运动中。我和几个班干部抽调出参加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让我们听教师们自我剖析和自我批判。重点是批判教师们受英美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彻底清除植根于头脑里的“崇美”“亲美”思想，认清美国

式的“假民主、假自由”的本质。也真是难为老教师，特别是从国外回来的教授副教授，他们一遍一遍地检查、批判，在青年教师和同学代表的帮助下才得以过关。当时我还觉得挺自豪，受到了党的信任，的确是认真地帮助老师们。我们自以为是新社会的人，老师们是旧社会出来的知识分子。何曾想到几年以后，我也成为一个老师，当了几年老师以后，我们的学生留校当了老师，在政治学习时新老师们，严词厉语地批判我们这些老的老师，“思想跟不上（大跃进）发展形势”、“对新生事物（大炼钢铁）评头评足”、“只看前进中的缺点，不计其余”等等。哦！我这才逐渐体会到，在各个时期尤其在政治运动时，都是要用一些新人去整那些老人儿，这几乎是规律。所以那时我们参加老师的思想改造学习，帮助过关，似乎我们是进步的，是革命的，其实是当作整人的“工具”。

在我的印象里，1952年的那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知识分子的整治，总的说还是比较和风细雨的，也没有什么意外的事件发生。过后知识分子们还受到打一下，揉三揉式的安抚，之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上。而这以后的运动可就不是这样的了，愈来愈是疾风暴雨式的，还夹杂着人身攻击。1952年寒假结束，参加“三反”、“五反”的同学也都回到了学校，我们按时开学上课。无论是到社会参加“三反”“五反”，或帮助教师思想改造，我们都是做为组织上派出的的身份，代表着组织参与工作。尤其我们参加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真是很幼稚，不知深浅，夸夸其谈批判老师。那时当然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还自以为是比老师们进步。

寒假过后，正常地开学上课。学习的安排还像上学期一样类似中学，以小班讲课，上辅导课，做实验。我们的教学正处于要从英美教育体系向苏联教育体系转变，没有教材，教师自编讲义。北京工业学院基础课教师较为薄弱，是从各处搜罗来的，多数质量不高，例如，数学课用了数月时间讲了理科才要求的数论，致使实用的微积分的讲授没有时间；又如制图课照搬苏联教学大纲讲了很长时间的投影几何，而机械制图反而讲得很粗，尤其是图画的不够；物理课讲得太浅，跟高中物理差不多，并且超前于数学课的教学，致使不能用微积分准确表达物理概念；化学老师则是上课神侃，正经的化学各论倒讲得不多了。我们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知识，相对打得不如后来二年级，从天津大学合并过来的同学们好。

中法大学地方很小连正规操场都没有，早上起来跑步，围着西四大街、交道口、安定门大街跑一圈，洗漱后再到皇城根校食堂吃早饭，上早自习，然后上课到吃午饭，中午就在教室里休息一下。

上课后过了很长时间，上面宣布要选派一批去苏联留学的学生，我们心里很清楚，不可能谁想去都可报名，也不会凭学习好坏。果然经过严格地政审，四名都是家庭出身好的和较好的被遴选上，其中一个跟我比较要好的同学赵鄂官，学习还可以，一个还很差，全班最末，就因为他是唯一的贫农出身。其他两人学习成绩很一般，只是政审条件符合。从五零年到五八年按政治标准，选派了上千个去苏联和东欧国家留学生，除了少数政治背景好的官员子女，回国不久就当官。其中大多数工作平平，他们在国外开始语言能力差，加上原本先天不

足，学习基础打的不好，学习跟不上。回国后工作能力的表现，不及国内毕业的一般大学生，更不要说跟那些优秀生比。现在“海归”派群体，在世界前沿学科，在尖端高科技事业，在创新产业的建设，在国家宏观和微观的经济管理领域里，都做出惊人的成绩，这些人都是通过竞争机制、拼搏奋斗出来的人才。那个时候同时由国内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们，也多是竞争出来的，在各个岗位上能做出优异的业绩，担当起主力和骨干，他们比起留苏学生更强一些。我所看到的大多数留苏学生在工作的前几年里，适应不了国内的工作环境，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而在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更是无从事是。而后又是动荡的“文革”年代，到能够有所作为个时候，已经年龄不行了。我觉得那一时期的大批留苏学生，对国家来说，是资金的浪费，实际上也耽误了他们自己。

学期即将结束，上面传达下来，高等学校要进行重大的院系调整，推行苏联的教育模式，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清华大学成为综合性工科大学，把北大、清华、天大（北洋）、南开和外地其他大学一些相同院系，分离合并，独立成为新院校，有农业大学、医学院、体育学院、航空学院、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林学院、农业机械化学学院等等。在清华的东边，划出一大片土地成立一个学院区，集中了八个学院，分别是：北医、北航、钢铁、地质、石油、矿业、林院、农机，统称八大学院。再远一些还有师大、邮电、政法，财金、轻工等。这学院都集中在海淀区。分别在1952—1954年成立，搬到新建校址。

我们北京工业学院采矿、冶金系与天津（北洋）大学采矿、冶金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1952 年年暂时寄居在清华大学，教学安排、课程开设、生活后勤都统一由清华管理。称谓清华大学钢铁学院。1953 年才独立，迁出了清华大学。

1952 年下学期，学期刚一结束，我们立即从京工搬入到清华，天大的同学也从天津搬过来了。天大和京工采矿系合并起来总共大约七十人，混合打乱分成两个小班，班长分别是京工的胡耿寰和王首魁，他们都是学习很好的。两个班在后来的三年里，人员总是来回变换，实习时混合编队，到最后谁也弄不清，自己究竟是一班还是二班，但是班长却始终还是胡、王他们二人。

到了清华，我们也正式算作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在清华就觉得和在京工上大学大不一样，体验到真正的大学气派，和做一个大学生的悠然怡得。清华处处透着老大学浓郁的学府气息，在这里的确不仅是教给知识，而且在潜移默化地，熏陶培植知识分子的气质。大学的良好环境，那种知识海洋的气氛，人们彬彬有礼的教养，学子间气度的相互影响，自然形成了大学里所特有的文化层次。其他老大学也大多如此，难怪在后来的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发难，首先就砍向所谓的资产阶级最后阵地——高等学校。

清华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是高的，我们在那里仍然是上基础课和技术基础课，教学内容和课时安排能符合专业要求，课堂教学很清晰，紧凑完整，上讲台的教师都是讲课很好的，教学质量高的。很多基础课程是同样要求的不同专业不同系，在阶级教室合班上课，助教

小班上习题课、辅导课。我们有延续一年级学习的课，把原先学的不足地方还给弥补上来了。上课的时间学生们匆忙穿梭在各个教学楼、实验楼之间，没有安排课的时候，学生们则各自在图书馆、空闲教室、宿舍，或是校园某个角落里做作业看书、复习，没有班级专用的教室，当然也不会有集体上自习的安排。

下午操场上、体育馆里各自自由活动，校园里、林荫路上、小湖畔，也都有三三两两的男女学生的身影，阅读、谈心、绘画写生。学生们是充分自由的、开放的，充分地享受着惬意和甜美。图书馆里开架地陈放各种参考书、杂志和文艺作品，任你自由地选读。在音乐馆里，还可以安排练琴、唱歌。刚进入清华时，各楼层的工友还管打扫宿舍、送开水、传电话。上大学的确是培养高人一等的人，不久这些老大学与新社会不谐之处，也都逐一取消了。

清华校园里也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生活，周末多个饭厅里举办着青年（交谊）舞会，周日晚大礼堂或是大操场放映电影，周日白天在音乐馆播放古典音乐，还有专业音乐老师讲解。清华社团组织也很活跃，管弦乐队是高校中有名的，系（院）学生分会组织有诗歌、歌咏、舞蹈等等社团，年末有班级系间的比赛，有时候还请有作家、文学老师讲解文艺作品。所有这些都给打造一个完整全面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以后我们从清华出来，到了新校钢铁学院，仍然保持了不少这样的大学生的文化活动。

那个时期的所有大学，每周都有一个下午半天的政治学习活动，经常是全校师生共同听报告，有的是校领导做政治报告和传达上级文

件精神，有时请有关领导或是专家作国际形势、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理论等等报告，听报告是政治学习的主要方式。

在清华的学习经历，清华园的生活，总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没有清华这一段暂短的的学习经历，回想起来不会那样深刻地体会，大学对自己人生带来的影响。清华的大学生活特别体现着，大学的精神魅力。这你可以理解了，徐志摩为什么那么深情的怀念着剑桥，那就是因为古老剑桥的魅力。我到了清华园的第二天就去寻找朱自清《荷塘月色》的荷花塘。荷塘、湖心岛、水木清华、大礼堂和图书馆，构成清华的永恒的迷人引力场。这以后荷塘和水木清华的岸边就常是我阅读、休息的地方，伴随我度过一年的美好时光。我在清华令人永远难忘的活动踪影，是沉淀在心中难以释怀的情思。

院系调整给了我一年能有在清华学习和生活的机会，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在清华深刻感到了：一个老大学的学府风范，和活跃自觉的学习风气；一个自由舒畅的学习环境，和知识海洋，宽阔视野的平台；一个丰富多彩文化生活，调剂精神的的场所，和紧张后解压小憩，谈心聊天的园地。所有这在过去我没有遇到过，在以后的大学里也不再有了，这种自由开放式的学习方式，和保存着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外在条件，后来在所有大学里都批判殆尽了，也包括清华，北大我在清华算是赶上了一点末尾。这也正好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最宽松的一段时期。清华的一年，那是真一段最美好的回忆。

从 1952 年秋到 1953 年夏，我们去鞍山教学实习回来之后，立刻就需要搬到钢院的新校址，给清华准备入学的新生腾宿舍。钢院仅仅

是盖好了一些学生宿舍和职工宿舍，可以住人了，宿舍里的内墙还没有干透，但是比起一年级在华大工学院车道沟工地，住着四面透风的平房强得多了。

九月多我们开学上课了，教学楼还没有完工交付使用，是在工棚里上课的，大工棚里可以安排四个班和别的系合班上大课。我们经常是采矿的两个班用一个小的工棚就可以了。大约两多月我们就进入了新交工的教学楼，十二月份了，暖气还不能供应，因为住宿、上课都在楼里，人多也不算很冷，一直坚持到放寒假。

大三的上半年，教学进行地还是很好，技术基础课老师不少是清华过来的，很不错。讲专业课的都是本系的教授和副教授了，不严格地按教学计划和大纲讲课，老大学的先生多是那样，讲到哪儿算哪儿，倒是讲了很多实际的矿山工作经验，至于后面没有讲到的，一句话：“你们看书好了”。根据以前的学长们说，老先生们讲课，从来就没有讲完过的，不论哪个大学都是这样。

在钢院两年的学习里，还是很紧张的，课程的门类多，学时满，但是基本是地质类和专业课程，学起来不是很累。我们系里教学的专业老师（那时习惯上都称呼先生）合并过来的有京工、天大（北洋）、清华（清华采矿系教师有过来的，学生全转入石油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师资力量雄厚，但就是习惯于我前面提到过的，老大学一套的教学方法。老先生们肚里有东西，他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也不去计较，好好听讲别打断他，很有意思的。考试时有足够的复习时间，捋一遍教材记住要点，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这样的教学中，老知识

分子那种洒脱不羁的文人风度和性格，无形地给学生一种拓宽思路和不拘于教条的影响。我在京工大一时教化学的先生，也是这样的。从他们那一代的老先生之后，再很少看到这种老古董了。文科的院系里也可能有，因为在电视《百家讲坛》的讲座上，又看到了似曾相识的讲授。

按照苏联高教模式进行了教学改革的大学生，教学上要严格刻板地按照教学大纲规定，绝不能出格。讲课是条理罗列有序，层次套叠分明。章节里大标题、小标题包含了全部的教学内容，学生们无需思考，一条一条可以容易地的记住要领。老大学的那种教学，老先生们是完全不能适应这样的教学方式。我们还正好赶上了一点尾巴，体验到了老先生们的那种自由开放，广引博证式的教学方式。

所以，我们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带着一点解放前高中生的那种人上人的优越感，再加上上了大学之后，受到老大学遗留气息的一些影响，都或多或少的带着比较浓郁的知识分子书卷气。十几年以后，在社会上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到，五十年代初以前大学毕业的，与后来大学毕业的有着明显的差别。前面的更符合“文革”称为“老九”级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说的：大学，造就了我成了一个知识分子，正是如上所说这样的知识分子。那个时代整个社会上大学毕业的人还为数不多，而这些人又渗透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学究气，这种知识分子确实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虽然是解放后上的大学，还是沾染了不少那种知识分子的古疾。

这样的知识分子到底有什么特征，实际上也说不清，但是会一眼

就让人家看出来。有几点是明显的：一、多数的都有一些迂腐的书生气，说什么喜欢较个真，认死理，不撞南墙不回头；二、喜欢高谈阔论，还爱引经据典，多数的通古晓今，博览群书，于是能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侃侃而谈；三、合的来的人有说有笑，合不来的人不理不睬，让人感到清高，不好接近，好像自命不凡；四、不注重外表，甚至不修边幅，但也不是穷酸，就是一副我行我素的“德性”；五、好朋友肝胆相照，厌恶之人不给好脸，气味相投自成沙龙俱乐部，关起门成一统，别人总看成是“小圈子”；六、少数者，潇洒倜傥，雅儒秀气，多才多艺，吹拉弹唱，越在人多场合，越能表现；七、极少数脑筋伶俐的乐观者，对周围日常见闻，谈论间言词机俏幽默，话语嘲讽调侃，常逗人开怀，在那个年代真不啻是乏味生活的调味品、精神重负的润滑剂。知识分子常常表现出一些共同的弱点，不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拐弯抹角，吞吞吐吐；有时也能委曲求全，忍气吞声，以求平安；看不惯的事，睁一眼闭一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等。

我觉得以上的知识分子“臭德性”，与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多关系，是在历史时期所处的教育环境，特定时代背景的社会影响下，形成的特有性格，说不上有什么阶级性。你无从去批判他，也无法说给与什么改造。我倒认为是一些好的本质和品格，甚至有些是中华民族文人的秉性。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一群人毕竟是少数，那些非知识分子阶层的广大群众看着就别扭，格格不入。特别是那些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想管又管不了。谁都明白，国家的建设和管理离不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能干能听话。但是共产党还是

有办法，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知识分子们被整治的服服贴贴，一个“夹着尾巴做人”的警告，管了知识分子二十多年。

知识分子的极少数也有胆大妄为，不知天高地厚的，真敢知无不言，不识时务。对于自认为不对之事，坦言直谏，抨击批评，直指最上层，焉能不给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甚至招惹杀身之祸，带来悲剧的后果。我也警告自己不能口无遮拦，想说什么说什么，这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是不允许的。

我和我们那些同时经历了大学洗礼的学子们，一方面被认定是新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仍然被列入需要不断改造的行列。大学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即使是无产阶级到了大学里，也要被资产阶级思想染黑了。不管是新老知识分子都需要不断“学习—改造—学习”，彻底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现在回过头来看，大学的教育给了我知识，给了我为国家、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也给了我为人、做人的品格和良好的教养，给了我一个知识人才的应有的素质和某一些气质；大学所提供的条件和大学整体的环境，使我获得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多视点地看问题的方法，接触到多方面的知识；那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多次的实习机会，也培养了我初步的实践能力。所有这些才使我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是难得的机会，难怪说是天之骄子。在那时也确实是“人上人”的地位，全社会能有几个大学生？大学，造就我成了知识分子，我们的成长有着多少劳动人民的辛勤血汗，是国家是人民的培养，我们怎能不感谢国家和人民的养育之恩。极“左”思

潮对知识分子的伤害，比起国家和人民对知识分子教育的投入，那还是小得多。几十年来，我们尽力地对国家对人民，做出各自不同的贡献，我们退休后又得到很好的养老的照顾，比起全社会的大多数还是好得多。从我的角度上看我们应该很知足，内心上也应该得到足够的抚慰。那个很短暂时间的“知识分子臭老九”的瓜落儿，以及那个非常年代所给的各种委屈和不公正，只当做烟云吹散了，不应当再耿耿于怀。

我们大学里的四年，还是有着比较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进度，基本上按着教学计划，完成了各项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所有同学全部按要求完成了毕业设计（后来的五年制都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从1951—1955四年大学期间，前两年是经济恢复期，后两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两年，全国都在发展经济，大力建设，还聘请了很多的苏联专家。那时国家在一心一意搞建设，学校也在全力培养人才，搞好教学，维持着正常的教学秩序，没有太大的外界干扰。虽然是经历了院系调整，教学改革，但是多数的大学里还是尊敬教授，教授们主持和管理着教学，苏联专家也起着重要的咨询作用。在学校里主持工作的校长、院长也多是参加革命前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

我的四年里，第一年，所在学校革命味是浓一些，但很团结和健康，完成了比较好的基础学习；在清华的一年，宽松的学习环境，优越的学习条件，有条不紊地受到良好的技术基础课教学；钢院的两年也不错，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都学的比较扎实，实习和实践进行得很好。只是在钢院开始的头一年，边建设边教学，教学设施还不齐备，

条件受到限制，师生们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了教学和学习任务。我们在校的那全部四年里，整个国家全力地发展经济，投入建设，没有过热，也没有激烈的政治运动。我们可以安静地读书，享受着没有忧虑的生活。同学间没有戒备和隔阂，团结互助，身心健康。这四年的寒窗生活，在我们的一生中不算很长，却是永留怀念的一段时光。

到我们四年级，即将完成毕业设计的时候，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毕业设计也暂停了两周。对我们学习基本上没有造成影响，很快我们完成了毕业设计，进行了答辩。做完个人鉴定，宣布毕业分配去向，就毕业离校了。

四年的大学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一路良好的学习条件，无忧无虑的生活待遇，使我顺利的完成学业。不能不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应该感谢国家和社会，感谢政府。即使是把我们放在一边不用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怀疑读书的不对，从来没有“读书无用论”的思想。我想政府不会白花钱培养我们的。

大学时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虽然经过大学，曾经被戴上要改造的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被指责受资产阶级大染缸浸染过。但是我认为我是有幸的成了一个，受到全面教育的，真正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应该感谢四年大学的教育，没有这一段的教育，我也不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思想境界、文化素养、知识水平和认识高度。我也不可能做到，为国家，为社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才。

“为建设中国的克里沃罗格而奋斗”

克里沃罗格是当时苏联（现在俄罗斯），在乌拉尔地区的一个特大型的铁矿山，由此在这里建成了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和众多的军工和其他基础工业企业。于是在这个远东西伯利亚腹地，形成了一个重工业大城市——斯维尔德洛夫市。这个市的斯维尔德洛夫矿业学院是以地质、采矿、冶金、机械为主的一个工科大学，与我们学校北京钢铁学院完全对口。我们学校与之结成友好关系，两校的采矿系也有了联系，我们班就提出了一个口号：“为建设中国的克里沃罗格而奋斗”。这是在 1954 年春发生的，我们为此还挺自豪，誓要为建设中国的矿山而努力学习。

我考大学选择采矿专业，并不很了解这个专业，只是对旧大学采矿系，有一点粗略的知道，那时的采矿系是要学习找矿勘探、矿山开采、矿山建设、矿山机电、选矿洗煤等等一揽子矿山工程的知识，培养的是矿山工作的通才，到我们上大学时，已经向苏联教育体系靠拢，细化培养专业人才，我们定成是采掘专业，院系调整到北京钢铁学院。条条管理，钢铁学院隶属冶金部，我们这个专业更明确为金属采矿专业，特定是地下开采专门化。仅全国各大学采掘专业就分有采煤、采油、金属采矿、特种矿产开采、露天开采等等。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特点。

为了巩固专业思想，促进对专业的热爱；也为了激励为建设国家的学习热情，我们提出了“为建设中国的克里沃罗格而奋斗”。从一

年级到我们两校合并后的二年级结束，因为闹专业退学而走的，前前后后有十几个。这个口号也是我们表示绝不动摇，坚持学好采矿专业的宣誓。三年级以后我们真的也再没有退学的了。毕业后工作的几十年里，尽管我们有些人并没有直接从事采矿事业的工作，我们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其实大学只是一个学习新阶段，不在于一定严丝合缝地学用一致，进门来打下一个良好的知识基础，开阔视野；学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技能；提升思维方法，和知识的灵活运用；关注相关学科，关注前沿发展。从我们几十年的工作体会，尽管专业规定的很窄，但是给了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能够应付新的行当。过去苏联式的专业设置，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对口培养，包分配、包工作。过窄的专业设置，不能适应现在的要求了。

在清华大二的最后，我们到鞍山进行了教学实习，在地下开采矿山实习大约两周，然后又参观了露天开采矿山，还参观了钢铁冶金生产——选矿、炼铁、炼钢、轧钢的全过程。最后我们还到了本溪，下到煤矿井下参观。这次实习不仅增加了采矿专业的认识，也了解了一个大型矿山的复杂和对技术的很高要求。但也看到了矿山工作的危险性，个别神经脆弱的人，就承受不住，而逃避退学了。

还有一件很刺激的事是，不论在鞍山还是在本溪，老工人悄悄地告诉我们，日本投降，大鼻子来了，把许多好的德国、美国、日本制造的机器设备拆下，运走了。东北解放以后说成是，苏联为了使机器设备不落到国民党的手里，运走保护起来。可后来矿山恢复生产，从苏联运回的，却是苏联制造的傻、笨、黑、粗的旧机器设备，有一些

新机器设备，还要了钱算进口买回来的。工人们说，什么老大哥，就是抢东西。还说起苏联兵的恶行，痛恨地咬牙切齿。

我们在井下和矿工们一起工作时，他们说起旧社会，特别是日本统治时期，矿工的悲惨生活和受压迫的命运，使我们深受教育。本溪煤矿井下瓦斯大爆炸，死有一千多人。发生爆炸后，日本人命令封闭了爆炸地点的巷道，里面的工人都被活活地烧死或闷死。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根本不去组织抢救。过去矿山里流行了这样的话：“下矿的是埋了没死，当兵的是死了没埋。”下井采矿（煤）确实是生活所逼不得已的。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知道了采矿危险的这一切之后，为什么还坚持不渝地不变当初的选择？其一，当时没有想的那麼多，而认为要提高采矿技术的水平，做到机械化、自动化，正需我们来完成，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二，既然已经选择了这个事业，就不要退缩，艰苦危险的工作大家都不去干，谁干？团员不能做逃兵。第三，在中国没有上了大学之后，重新调换系和专业的自由，除非退学再重新考学换专业。因此，我和我的同学们，都必须是安心塌地，认真坚持把学业学好，掌握好从事矿山事业的技能，把它当作党和祖国交给的任务去完成。

后来在钢院的两年学习里，逐渐更多地了解采矿工作，更加认识到采矿工作的复杂性。一个矿山特别是大型矿山，是一个多种技术的综合体，除采掘技术本身外，还有矿山机电、矿山运输、土木建筑、通风、供水、供电等等工程技术的配合，才能形成完整的矿山。对于

一个采矿工程师来说不是要精通这些技术，而是要懂得这一切，如果一个采矿工程师要上到更高一点的位置，比如总工程师，不但要懂得技术，更要懂得管理。这些不能不激励我们努力地学习。

两年的学习时间里，我们又进行了两次矿山实习。一次是生产实习，一次是毕业实习，两次实习时间都比较长。对于采矿事业从最初的认头的心态，逐渐走向了热爱，这是我和我的同学们一个根本的变化。突出点表现就是，四年级上半年全校文艺汇演，我们自编了一个由实习里体验出的舞蹈《矿工舞》，音乐、朗诵的配合也都是自己搞出来的，校内的演出获得了第一，节目还被选送参加全市大学生文艺汇演。我们的舞蹈不仅反映大学生文娱活动的丰富多彩，更是渗透了我们对所学采矿专业的热爱。

在我坚定地树立扎根采矿事业之后，带着年轻人的梦想，一心想到基层的矿山去，到艰苦的条件下磨练自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保尔，给了我深刻的影响，他告诉我们英雄就是那样，在艰苦条件下磨练成长的。我清楚我的出身永远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机遇，成为英雄，而去基层只是我最有可能的，我不幻想留在城市里，留在好的工作单位里。我完全做好了去矿山，去基层，去边远地方的思想准备。总之，做为当时还是一个团员的我，更是要自告奋勇地报填，到生产第一线的志愿。

总体上说，“建设中国的克里沃罗格”只是一个口号，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对它也渐渐淡忘了，也没有人把它挂在口头上。但是我会时还会想起，一是，这个口号记得似乎是我提议的，先在团内蕴酿的；

二是，我的好同学之一田敏霞毕业前，送我了一本临别纪念的日记本，扉页上题写了那个口号，“为建设中国的克里沃罗格而奋斗！”，我要在日记上写点什么，就会看到这个口号。这总还是一种激励，一个朋友的美好祝愿。

1955 年的八月初，宣布了我们毕业分配的名单，没有想到的，我们大多数人分配在高等学校和设计院，也基本上留在了北京。我们总共 58 人，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就有 17 人，几乎占到三分之一。地质学院刚刚建立了全国首个新专业——探矿工程专业，它与采矿工程学科最相近，国家探矿事业急剧发展，急需这方面专业人才，地质学院紧急建立了这个专业。最初的教师是学机械的转过来，但是专业相差太远，苏联专家提议向上级申请，要求分配采矿专业的毕业生。于是就从钢铁学院采矿系，要来 17 个毕业生，我也包括了在内。探矿工程本身又分有两个不同的工程作业手段，一是勘探掘进工程，另一是钻探工程。掘进工程本就是采矿工程的一部分，钻探工程在苏联是独立的专业，而在西方高校里并没有独立的学科，包括在矿山工程总的大范畴里。所以从采矿到探矿基本不是改行。

到了地质学院探工系之后我们又面临了钻探和掘进的选择，钻探和掘进后来分属于，两各个不同的教研室。选择掘进轻车熟路，完全不费力气的去给学生上辅导课，选择钻探则需要从头学习钻探和钻井的知识，而且是边学边给同学上辅导课。按照苏联的教学计划，所有的地质勘探专业，都要学有关勘探工程的课程，地质勘探普查专业、金属与非金属地质勘探专业、煤田地质勘探专业都要学习钻探和掘进

工程，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勘探专业要学习水文钻探、钻井和工程地质钻探课程，石油地质勘探专业要学习石油钻井课程，物理探矿专业也要学习一点浅钻工程的知识。除了岩石、矿物、古生物纯理科专业，探矿工程教学面对了地质学院百分之九十的学生。难怪它一下子要了那么多的采矿专业的毕业生，我和同学胡耿寰，分配在石油组，担任石油钻井课的辅导。

从采矿到探矿仍然是和矿业和矿山打交道，不过已经属于不同行业，采矿属于冶金、煤炭、石油、建材……等等生产行业，而探矿属于地质行业。同样都是“开发矿业”，那么我心中里的“为建设中国×××矿山而奋斗”就变成为，“为建设新中国的探矿事业而奋斗”，我也就立下决心干一行，爱一行。在高等学校这块阵地上，成为探矿工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人才，去努力培养地质探矿的后备力量，我注定还是要为矿业而奋斗终生。

这时候全国地质勘探工作大上特上，地质学院扩大招生，石油地质有九个班，其它煤田地质、金属与非金属地质、地质普查、水文及工程地质，也都至少在三个班以上，我们这些刚来的新助教，都在忙于上课、辅导，编写教材，另一方面自己还要学习补课。这时真正体会到工作的压力，也感受到完成任务后的愉快。

1956年夏，我们在分头带完了学生的教学实习之后，我们这些新教师们就各自奔向钻探、钻井、勘探掘进的生产现场，进行自身的实习了。我和胡耿寰去到玉门油矿，进行石油钻井实习。油矿和我以前所见到的固体矿产矿山完全不一样了。矿区里一座座钻井井架，一

个个抽油机和采油树，把石油从地下采出，汇总到采油中心，再由管道或运油车输送到炼油厂去。

玉门油矿教育科把我们介绍到钻井处，有幸给我们安排在王进喜的 1205 钻井队。1205 当时已是石油部的标杆钻井队，王进喜是全国石油系统的劳动模范，创造了全国月钻井进尺的最高纪录。我们在实习中亲眼看到他拼搏战斗的精神，体验到那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我们在王进喜的井队上，实习了将近两个月，和他建立了很好的感情。1960 年 1205 钻井队转战到大庆油田，创造了更辉煌的战绩，王进喜被称谓铁人，成了全国闻名的劳动英雄。1957 年召开全国英模大会，我特地跑到石油部招待所，把他请到我们学校给石油系学生作报告，介绍了他的苦难童年和非人的悲惨学徒生活，又讲了解放后的翻身和创造标杆记录的先进事迹。1959 年我又一次到玉门带石油系学生实习，再次请他跟学生们座谈。多次地接触和听他讲述，朴实生动的语言，没有套话，没有教训口吻，他也不会照稿宣读。讲的都是大实话，赞美今天的幸福生活，告诫青年人要珍惜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殷切希望青年人要努力学习，准备报效国家。

这种看似短暂的教育，但是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在以后又多次听到王进喜更多的事迹，再回想起他所说的，确是给我树立了做人的榜样。因为我接触的王进喜，就是一个很平实的工人师傅，没有豪言壮语，没有高大形象，没有队长的架子，只是实干，还能巧干。而大肆宣传里，特别是电影《创业》里的形象，倒感到不真实了。我在很多矿山里所遇到的老工人，也有的是矿上的劳模或先进生产者，也多是

这样。向工人学习不用成为口号，会不自觉的以他们为榜样

现在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流行着一个时髦语，一定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就讨论到人生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什么？很多的年轻人很实际，就是指优越的生活条件——美女（有钱丈夫）、房子、汽车。生活待遇低了，不干；艰苦劳累的工作，不干；不是大城市，不干，不是大单位（大公司），不干。而我们那时候哪敢有这些想法，这些是百分之百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自打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就彻底批判“荣光耀祖”、“扬名四海”、“吃喝玩乐”、“好逸恶劳”的剥削阶级思想。

那时候我们所受到的所有教育和影响，都是要无条件的为人民服务，报效国家，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思维定势就是那样。我们是全公费的国家培养，我们自然就要是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不服从分配是绝对不可以的，是容不得半点可以商量的原则问题。那么我们岂不是太老实了？或是现在的年青人太妄为了？都不对，此一时彼一时了，那时是计划经济年代，包学费也包分配，现在进入市场经济时代，要自交学费，自谋职业，没有分配这一说了，学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学生自然可以挑肥拣瘦。然而年青人还要看到他热血的一面，在紧急关头，会表现出青年人最本质的核心价值观，奋不顾身地牺牲自我。不久前发生的长江大学的大学生群体，救起落水少年而牺牲三人的事件。说明对年青人的价值观，不能只看表面的表现。

现在年轻人的价值观，直白露骨的标价，是现在的环境下产物，有本事你就待价而沽，去奋斗，去拼搏。因为现在是市场经济，再也

不可能等着不费力气就到手的馅饼。竞争使人们想方设法创新发展，使人们充分发挥潜能，所带来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这不是很好吗？

我也并不认为，现代青年是只顾个人利益的庸俗市人，他们的远大目标，他们的竞争意识，他们的拼搏精神，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现在深感贯彻科学发展观，开展科学实践活动，是那样的务实。不是摸不着的空口号，也不是花架子。是实实在在促增长、促民生、促稳定的举措。重科学也就是要重教育，重教育也就是重人才。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更直接的说，是发挥知识人才的作用。那个非正常的年代里，为数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还闲置不用，下放劳动、改行转业，国家还怎么搞建设？经济还怎能发展？尤其那个疯狂年代使国民经济，比起我们周围国家和地区，倒退了许多年。知识分子被整治的老实服贴，思想也僵化，知识分子无从去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前途究竟在哪里？

1965—1973 的年代里，我迷茫过，我失去了方向，我们还有用吗？那时也无所谓苦恼，也无从多想，随大流地胡折腾着。1973—1975 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的口号还在照喊，但是我们没有激情，没有热度。学校里的教师们，大家无事可干，做木工、打家具，攒电视机、攒音响，我也参与了这个行列。直到迁校，在武汉招生，又重新回到探矿工程的事业里，这才逐渐找回了自我，找回了自信。重新想起了要“为新中国的探矿事业而奋斗！”

繁忙的教学让我逃过一劫，侥幸没有成了右派

1957年春季开学，我走上了讲台，开始了讲课，正式成了一个讲课教师。第一次讲课，不用说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面对七个班（200多人）的大班上课，心情是极为忐忑不安，一周两次上课，备课、写讲稿，开始时还总要试讲，真是非常紧张。总是担心讲不明白，或者控制不好时间。这都是初上讲台的人普遍的状况，而且我更是面对大班上课，阶级教室里坐着黑压压的一片，无形中的巨大压力，迫使我小心谨慎，认真备课，反复背记讲稿，无暇顾及周围发生的事情，一天到晚就忙于我的教学和备课。

我上课的学生是石油地质专业，所讲的《石油钻井工程》，是专业要求的主课，是考试课程，还有课程设计，学生们学的很认真，答疑常常刨根问底。因为我也不是学石油学科的，就要阅读和了解更多石油学科的有关知识。不能单纯的只局限于钻探和钻井的知识，备课和扩展知识就需要更多的时间。

1957年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决定，要在全党开展整顿党的作风，并希望党外人士广泛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做为团员我也应该是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帮助党整风。我记得当时我想到了两点：一是，头一年周恩来总理在党的“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讲过，要尊重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要保证知识分子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我觉得党委要保证我们的六分之五，因为六分之五常常被破坏。二是，不要把校务委员会，当成了摆设，不要一切都是党委决定，

教学管理和教学建设的总体方针，还是应该通过校务委员会决定。(注：校务委员会是由校长、各系主任也都是教授，及资深教授组成)，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要求“教授治校”。我因为教学太忙，还没有来得及细想，更没有来得及说，形势就发生了逆转的变化。

工人出来讲话了，“这是为什么？”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在帮党整风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超出了底线，触及到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问题。这一下子惹恼了最高领导者，整风运动立即转为反右运动。在全国自上而下的翻底清查，所有讲了不利于党的话，给党的各级提了过激意见的，讲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宣扬教授治校的，给知识分子鸣冤叫屈的……统统都是右派言论。金口玉言者说，右派分子是极少数只占知识分子的1%—3%，于是各个单位和部门就有了指标，照着不超过3%的比例定出右派分子的名单。嘴巴不牢，口无遮拦的，难逃厄运。“反右运动”声势浩大，对右派分子发动了全面的反击，报纸广播所有的内容都是批判右派言论，学校里全面停课，大会小会、大字报批判右派分子，声讨右派言行。反右风暴席卷中华大地。全国揪出大大小小30多万的右派分子。

回想起来我真是万幸，如果把我想帮党整风的那些想法说出来，很难逃脱右派分子的帽子，因为那都是一些根本性质的问题，那都是重点批判的。如果我机敏一些，说的婉转一点，说的含糊模棱，抓不着辫子，或许摊不上头，那只是侥幸。我还是觉得我好玄，因为太忙，没有给我机会。整风提意见我什么也没有来得及说，我也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在以后每当想起这个，总是有点后怕。

这让我回想起两年前的“肃反”运动，当时我就觉得有些弄不明白，从三十年代就追随共产党的左翼文联领军人物胡风（鲁迅的好友），就因为 30 万言的陈述书，成为了反革命分子，牵连了众多相关人物，随之全国开展了肃反，挖出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那一次已经使我我感到震动，令人可怕。而比起这一次的反右运动，那次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这次其规模和声势都是空前的。如果摊上一个右派帽子，那吓也吓死。从表面上看，“肃反”和“反右”两者性质不同，前者称为反革命分子，是敌我矛盾，而后者称为右派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所谓极右分子，处理的也并不轻，不少也送到了北大荒劳动改造（例如丁玲、肖军），还有送到北京南的茶淀农场劳动。相对胡风被关在秦城监狱，（享受着贵宾级待遇，后来的江青、陈伯达、陈希同也都在这里呆过。）丁玲算是受罪大发了。

我细想要是真的当了右派，也不足为奇，我的思想深处有不少右派思想的根蒂，我的人性情结很重，我的感情容易激动，对不正的风气反感。又比如我在文学艺术上一些喜爱的倾向，那足以够得上右派标准的。1956 年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讲：“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成为我们发展科学，繁荣文化艺术的方针。”这一年还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文联代表大会。从 1955 年到 1956 年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短篇小说：王蒙的《组织部里新来的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宗璞的《红豆》。长篇小说：吴强的《红日》，肖军的《五月的矿山》。电影：谢铁骊导演的《早春二月》，谢晋导演的《舞台姐妹》。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都

有很好的艺术性，都有很好的人情味儿。然而这些作品在反右以后都受到了批判，列入了“毒草”，作者和导演也都成了右派。我就不明白口喊着“百花齐放”，而只允许讲阶级斗争，讲革命战争才是唯一的文艺，那文艺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其实我所喜爱的上述作品，现在认定又都是优秀的作品，哪有反动和反党的内容，只不过没有一味的就是阶级斗争，只不过揭示人的本性，人情味儿重了些，也伴有了些风花雪月的描述。这就成了“大毒草”。反右早两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又何尝有多少道理。说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了舞台，可那些高级干部不是看的很来劲么？中南海怀仁堂就没有少让京剧名角去演过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可怜那些授命写批判文章的，他们未必就相信自己所写的那些批判文章。在那个颠倒黑白的年代里，没有理、没有法，上面怎么说你就得跟着指挥棒怎么说。定右派又有什么尺度和标准，总之你说了一些不合适宜的话，表露出一些非正统的思想，右派的帽子就无疑地会给戴上了。当时我也不认识的像现在那么清楚，但是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吗？不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吗？那我所看到的大量的苏联文艺作品，也都是很有人情味儿，他们描写的战争，很残酷，很激烈，而描写人性，同志间的友情，男女爱情，又是很细腻，很柔情，表露出真情。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就是这样的作品吗？后来那些戴着“左派”帽子的批判手们，也指向了苏联的文学作品，而且是检最大个的肖洛霍夫批，批判他的世界名著《静静的顿河》，更是对他晚年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给了激烈地抨击。

其他的一些作品也有捎带的批着。像《茹尔宾一家》、《暴风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对苏联作品的批判，自然不是要批给人家苏联人看，其实是警告受苏联文学作品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

大张旗鼓地掀起反右风暴，学生也全部停了课，我也有了机会投入到运动中。一次在学校楼前广场举行的与一个学生举行的辩论上，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激动跳上台去，和他辩论起来，我驳斥他与解放前的学生运动比，要民主、要自由。因为我是经历过那个时代过来，他自比那个时代的学生真是自不量力。这个学生受北大哲学系学生“百花社”的影响，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要求放弃“一党专政”。当时我没有这种超前意识，只觉得可笑。后来知道“白花社”的学生全部定成是极右分子，命运极惨，全都被关进了监狱，文化大革命时还被整死了。我们学校的那个学生，我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看来也不会有好的结果，我心里总有一点亏欠感。

我的同学同一个教研室的吕梅先，一个很热心肠的女同志，因此还当上了系工会小组长。她也不知怎么昏了头，看到大字报揭发了某些院领导和后勤干部，私分了职工福利费，引起了群情激愤。吕梅先竟然异想天开要组织游行，声讨这些领导和干部，动员了我，我立即打断了她荒谬的主张，破坏了这个动议。结合我前面说过的上台驳斥那个学生，因为这两件事，宣布我成了反右积极分子。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可高兴的，我完全知道我的思想基础，不佩戴上这样的桂冠。

对右派分子讨伐的战果，我们系里也搞出了约有十人，我们来的同学中，就只有吕梅先倒霉摊上了，也因为她的父亲是在押的历史反

革命，再加上她又组织游行的动议，摊上她是跑不掉的。我们系里还有几个新分来的毕业生，不满意分到地质学院，借着整风跑回原校矿业学院人事处和系里去闹。反右时矿业学院把右派帽子送来地质学院，给我们系增加了几个指标。这真是两全其美，矿院少定几个右派，我们系则有外来的右派帽子，也可少伤及几个其他人，凑够了指标。

我的同学吕梅先，这时她已身怀六甲，拖着个大肚子还要接受批判。系里开批判会的那天，我看着她站着实在不方便，搬了一个沙发椅让她坐下，有人要阻止，我没有理他。会议主持人倒也没有管，吕梅先也就坐下来听取批判了。后来不久吕梅先就临产了，坐月子的时候，我送去了两罐铁筒的奶粉，在当时相对说是不便宜的。过了些时候，党总支的人找我谈话，说我对右派分子有温情主义，不应该同情右派，批判吕梅先的时候还给她搬沙发椅，后来又给她送奶粉。我听到了真是心凉，送奶粉的事不知道哪个给我汇报了上去，人们之间都要这样，多么可怕呀。找我谈话似乎是帮助我，让我端正思想，正确对待反右斗争。然而更是让我警惕，在那样的环境里，自己一定要小心谨慎，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会有陷阱在前面等着。

总的说我是受到表扬的反右积极分子，我得到了去北戴河疗养院，休养的特别待遇。休养的十天，让我别扭的心情放松了下来。同去的其它系和科室的人，也不是反右受表扬的，他们有的甚至是抽签而获得的机会。看样子是我的系里特殊的优待我，那么对我的温情主义的批评，也许真是对我这个反右积极分子的爱护。然而我是扶不起墙的，我不会因此加强了斗争性，不会因此更积极靠拢组织，以前什么

样我还是什么样。

1957年我们学院的反右运动，因为暑期的大批实习而后又是暑假，就偃旗息鼓了。直到十月以后学生陆续回校，开学上课，突然党委又公布了院党委副书记陈子谷是右派分子，真是使人感到惊讶。在这之前没有丝毫动静，暑期前既没有宣布过他的“罪状”，也没有听说在任何场合下批判过他。陈子谷是一个有着很大名声的人，家庭是南洋华侨的富豪，1939或40年带着大笔的捐款，支援抗日战争，并且亲身投入到南方新四军的抗日队伍里，1941年“皖南事变”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里表现了英勇不屈，后来在集中营暴动突围中，表现出奋不顾身，顽强战斗。这些都在《上饶集中营》那本书中，指名道姓地详细地描述了。这样坚定的革命者怎能是右派呢？我看就是因他是一个为华侨知识分子，表现的与那些工农和军人出身的干部格格不如，讲话是广东味儿文绉绉，动辄还马列书籍引经据典，喜欢长篇大论的报告，不识时务让人听起来令人发烦。总之是毛病不少。估计党委会上挤兑他，拿他开刀，他一定会不服气的争辩。这个时候地质学院正没有正院长和正书记，他的级别并不低。这明显的让人家看出来，他是地院上层的权力斗争的败阵者。真的，其余的那些副职的院领导，还都是工作水平不高，文化化水平也不高，资格老的三八干部。他们做报告靠秘书给他们写稿子，开会讲的是套话，教育、教学一点不懂，还总摆着领导的架子。他们在高等学校里混，知识分子没有办法看得起他们。他们打击陈子谷才能抬高自己。在这里面，陈斗不过他们，被戴上右派帽子，淘汰出局。后来调进来的正院长兼

书记高元贵，是“一二·九”的运动的学生领袖，那些副院长副书记们是无法与之相比的。地质学院在执行知识分子的政策上，相对说比原来好了不少。

地质学院还有一个很大的教研室普地教研室，在反右斗争中几乎全军覆没，两个教授几个讲师，党员、教研室主任、整个团支部的多数青年教员，都成为右派或者是沾上右派的边，最后实在不能划得右派分子太多，戴上了帽子的也占了 20%以上。其实他们就是喊出了，那些不学无术的院领导们靠边站。这就是要在学校里取消党的领导，是最为严重的右派言论。还有三个普通教员，一个政治教研室的（教政治经济学），一个数学教研室的，一个外语教研室的，他们引用了国外经济学的书籍，把数学引进经济学，编了一本宏观经济控制的书，写出了稿子，征求同事们的意见，遭到批判，三个人都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这应该是典型的“思想犯罪”的例子，既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挑战政治经济学，只是涉及了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就遭到厄运。

还应该提及一个极右分子的可敬可佩的事迹，他是物理教研室的年轻教师。父亲是香港的著名律师，家里是很有钱的，他高中毕业家里要送他去英国上学，他不去，一心爱新中国，回到国内上了中山大学，大学毕业他也不回香港，分配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人年轻、潇洒，手风琴拉得很好，乒乓球是全院的优胜者，交谊舞也跳的很好，锋芒毕露，说话自然很冲，给党提意见说了过头的话，反右时受到批判，不服气，不认错，定成了极右。也许因为家庭的背景，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仍然留在了教室内，不直接教学，做着实验室的工作。

困难时期他的父亲通过外交途径，申请让他去香港探亲，上面通知他可以出境，他拒绝回港，说：“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证明我不反共产党，不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先是工人把他揪出来，而后一年级的大学生把他游街（校园）示众，他不服，不低头，挨打受辱，把厕所大便纸篓扣在头上当高帽戴上。1981年“右派”甄别平凡，他要求上讲台，给大学生讲完一年的最高学时的物理课，评上了副教授，这才离境返回香港。这能不说是硬骨头精神吗？

反右斗争伤害了几十万知识分子，牵连十几万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都有。到头来是冤案、错案。没有给平反的，全国仅几个人，他们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浦熙修几个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尾巴，也许是为了保留一点始倡者的面子。因为他们是全国最大的“右派”，连他们都不是，那么“猖狂的右派”不就完全成了子虚乌有了吗？

1957年的反右风暴过去，留在人们内心的阴影是无法抹去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互有戒心，缺乏真诚，人们处世也都小心谨慎。人们的交往少了，朋友的聚会没有了，真是“老死不相往来”。我时常怀念大学时同学间无所顾及地坦露心扉，那时候人们是不需要互相设防的。偶尔我写信给遥远的，在捷克学习的好友赵鄂官，透露一点苦闷和迷茫。我觉得给他抒发一点郁闷，是绝对安全的，离得太近的即使是好朋友，说什么也得要有保留。

1957年秋季开学之后，又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我照样还是很忙，又是一个大班的讲课，因为石油部门急需人才，又把别的地质专业转

到石油地质好几个班，需要补上钻井课，我们石油钻井教学小组和上半年一样，忙的不可开交。好在没有政治运动的搅和，倒可以集中精力搞好教学，抓紧时间修订教材。1957 年调来的新院长高元贵，毕竟是知识分子出身，直接亲自抓教学质量，全院出现了教学评比和教学方法研究的好局面。教师们又激发起搞好教学的热情，也就是这半年的时间，人们踏踏实实地搞教学，安安静静地抓业务。但是好景不长，转年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学习“总路线”掀起“大跃进”的浪潮，接踵而来了。三面红旗的招扬，在全国又掀起一场新的躁动。

我记得 1949 年我开始学习和了解了政治的时候，就强调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以后又知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并且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永远是要斗争的，用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永远不能停止折腾。“斗争的哲学”的涵义就是：静止是相对的，折腾是绝对的。以后一直到 1979 年，中国都是在遵循着这个行事。而且是以“与人斗”为主。因为最高指示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高举三面红旗，就是一方面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掀起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就是大力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要敢说、感想、敢干，推倒一切阻碍前进的绊脚石。这就是要我们全国人民，永远是斗争！斗争！斗争！

在这样一场新的运动面前，每个人又面临一次考验。不积极主动就会做为反面的典型。我将怎么样？绝不能落后！滚滚的大跃进的车轮，带动着你不得不跟着前进。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跟着跑的。

那些少数摇旗呐喊的领头者，哪里来的劲头，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知道。在火热的洪流里，我表面上一定要力争上游，而在内心里是要保持中游，俗话说就是随大流。无数次的实际经验告诉我，积极过头的，大多数是适得其反，没有好下场。何况我从心里，就不愿意那样穷折腾。事实的结果就是那样，每一次运动，就是一次穷折腾，每一次穷折腾，伤害了国家，伤害了人民。一直到 1979 年，这种折腾何止一次两次啊！

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956—1957 年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里加速推进了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所有私营工商企业都转为了公私合营，没有了私营企业，没有了资本家；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重组合并，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集中连片，一家一户的个人所有，变为集体所有制公有化，所有生产资料也变成集体所有。1957 年末中国正式向世界宣告，我们完全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新民主主义宣告结束。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施行的新民主主义，仅仅经过八年就终止了。社会发展之快令人惊讶，真是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过了许多年之后，从许多方面的幕后信息里才有点儿知道，这个变化，完全是一个人的独断专行，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想急于改变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称谓，一下跳入社会主义，和苏联东欧等国家一致。人家都叫社会主义，唯独中国叫新民主主义，在阵营里有点独特。我觉得他心理不平衡，不愿矮人一头。其实他更想拿中国做一个空前的实验，制造一个有区别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但是他也知道中国的经济还很落后，实现苏联那种社会主义还有一定的困难，于是就设想实现一种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他不顾当时中国的实际条件，不顾社会的经济水平，不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搞起了拔苗助长的社会主义。那时在经济发展的行进中，他嫌负责经济的人，步子太慢了，用太上皇的口吻，先是把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后又

把负责工业的李富春，申斥是小脚女人。名义上是指向李、邓，实际上以批判“反冒进”、批判保守右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迫在党内做检查，社会主义化的推进能不加速进行吗？有谁还能反对加速实现社会主义？

那还时候我年轻，看到社会发展如此迅猛，也是心潮澎湃，万分激动，在想我自己怎样才能赶上这社会主义的前进步伐呢？我们自己能做些什么。从我个人来说，首先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思想上紧跟形势发展，积极地克服保守观望的态度；在行动上要站稳立场，彻底革命，与剥削阶级划清界限，支持房地产公有化。我回到家里动员我的母亲，把家里的房产上交公家。我的母亲也是胆小，在街道里率先把房地契，交给了房管局。原先我们还要依赖一点儿房租收入（其实也只有三、四十元），维持家里的生活，以后就要坚决靠劳动生活。我母亲在街道工厂做缝纫工，我和也已工作的妹妹都尽力分担责任，帮持家里的生活和弟妹们上学。这样我们也就真正的走向革命了。

仔细回想，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其实那时候也不非常明白，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知道，社会主义下生产资料没有了私人占有，社会生产中人们的关系即生产关系，是人人劳动各尽所能，没有剥削，没有不劳而获；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了矛盾，生产力解放，劳动者可以发挥最大的生产效力；劳动成果按劳分配，也就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后来长时间的亲历，逐渐地明白了，苏联和中国等现实的社会主义，概括起来是三条：一、公有制。土地、房

产、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即，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实际上是资源和财富被国家垄断，甚至是被少数特权人物占有，多数人并不分享公有制的利益。二、计划经济。经济运行按计划执行，计划是人制定的，带有主观性盲目性，反映领导人的意愿和长官意志，完全是集权管理，计划制定说起来很死很严，但是最高的领导又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改变计划。三、按需分配实际是按级分配。级越高就意味贡献越大，所得就越多。实际上工资分配是一个很小的数目，更大更多的是物质分配和特权待遇。从大的等级来说，全民所有制的人，生老病死有国家给的基本保障；集体所有制的人，生老病死根据集体单位收入多少，有部分保障；农民不够任何级，则一点保障也没有。从细分级来说，官阶是分级依据，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以及国营企业的高管，构成特殊阶层，享受特殊待遇。普通国家工作人员和各种公职人员，按各种分门别类的等级进行分配。这就是我经过很多年悟出的不论苏联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真实。

我最初是 1949 年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知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解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只是共产主义社会更上一层楼，经济更加发达，可以做到人人按需分配，而社会主义还只能做到按劳分配。我的这种认识从来没有动摇，直到改革开放的时代到来，才有了更深的思考。大多数的人也多这样认为，因为我们都不是先知先觉。我们相信灌输给我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说教。因为我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没有看到过别人，以为我们就是最好的。当改

革开放，窗户一下打开了，这才看到原来外面不是像宣传的那样，资本主义不是那样万恶，人民生活并不苦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比别人差的很多，我们像是一种被骗的感觉。

但是再看我们实行了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我们大家戏称为穷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主义差十万八千里。记得 1949 年参加北京团市委举办的暑期学习团，听了印象很深的薛暮桥讲解《政治经济学》的报告，他说，三亩地一头牛的小农经济搞不成社会主义，农业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建设集体化机械化农场和农庄；国家要达到工业化，要有众多的工矿企业，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业，工业生产产值要远远大于农业生产产值，这才能成为社会主义。薛还讲工业化必须还要有重工业的基础。而这些正是我大三时，学《政治经济学》课程里所讲的。当时苏联刚出版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披露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原则的经典论述，大概是这样：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目标就是要使社会财富极大的丰富，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文化需求。后来毛泽东批判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好像说是“不能‘唯生产力论’，…教科书只讲物质基础，不讲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里存在旧的生产关系，就会有斗争，也是阶级的斗争，就会影响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批评苏联不讲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只讲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讲物质刺激，不讲发动群众和群众运动。在他的脑子里似乎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只是靠经济增长，发展生产力，而是还要靠政治，靠革命精神，靠阶级斗争，到后来他更具体的强调，就是要靠“三面红旗”。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就感到很奇怪，大学里的政治课，理论上讲的是一套，而现实中的做法是另一套。例如把国家计划说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现实中，学校里把国家制定的教育计划、教学计划可以随时改变，因为政治需要就能随便停课，去搞政治运动，去搞“四清”；大炼钢铁原本没有什么计划，一声令下，把所有正常的有计划的工业生产全部打乱了，全民去炼钢；农业生产的计划更是主观臆造，指标达不到就浮夸虚报。

中国从 1958 年进入了社会主义，不是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激烈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所担心的不是国家贫穷落后，人民生活苦难，而是担心社会主义会变颜色，一味地要进行阶级斗争，要“反修”“防修”，直到 1978 年“拨乱反正”才停止了毛的折腾，中国才真正稳步地进行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前苏联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推行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斯大林更是残酷的不知杀了多少人，他搞的已经不是什么阶级斗争，而是杀伐立威，巩固统治。看来毛泽东采取的处理敌我矛盾，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结合的手段进行斗争，比斯大林还是高明一些，但是也是毫不留情的斗争，只是没有那么多的杀人而已，同样也是使几十万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因为毛泽东坚信，敌人不打是不会倒的，也就是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不斗倒，社会主义不能够胜利，革命就要倒退，人民的胜利果实就要付诸东流。结果是斗来斗去，斗得国家愈来愈穷，人民生活愈来愈苦，离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主义，却愈来愈远。

此时中国虽然是国贫民穷，仍然还是要叫社会主义，只不过称做是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还不到完全的社会主义。但是实行着社会主义的计划供给制度，日用生活用品实行着分配制度。尤其是生活必需品严格地实行定期定量的分配供给，分配的质量和数量，又严格地按等级获得。百分八十的农民得不到任何国家提供的食品和副食品的分配供应。虽然说社会主义过渡阶段还保留着商品交易和货币，但是商品匮乏，几乎没有了市场，生活必需品，只有通过分配购买。所谓的社会主义，是除了极少数特权人之外的全民平均主义。现在不难理解，社会经济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强行搞起社会主义，后果也就只能是这样——大家平均，少数人小富。难怪现在有人评论毛泽东搞的社会主义，更像是乌托邦。

解放前我小时候看过几篇描绘乌托邦的小说，有《理想之都》《荒谬的英法海峡》《幸福岛》等等。很小的时候看了那些确实很吸引人。都是描写人们所幻想的理想社会。那里人人平等，人人劳动；各取所需，公平分配；公推领袖，轮流管理。后来长大一些又看了康有为的《大同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设计的理想社会，他们更提出了严格的军事化的管理制度，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引入斯达巴克斯的管理模式，毛的公社制度的设想差不多就是这样。人们所描绘的乌托邦只是一个空想，而毛泽东在中国就偏要试一试。“乌托邦”这一词，原本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根本没有的，不能达到的美好的理想境界。中国一千多年前陶渊明所描绘的《桃花源记》，也是反映了古时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然而这只是农耕社会下人们的一种幻想，它

成不了社会主义，只是比生产水平低下的原始共产主义好了一点，劳动有了分工，收益可以分配。在社会分工更加细化的工业社会条件下，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五十年代末中国开始的低经济水平的社会主义，正是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尝试，注定最后走向失败。

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首先是要搞平均主义，推行平均主义并不容易，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绝对的平均，实行平均主义必须强力和强制，甚至是暴力。农村里的抢粮队到各村各户去抢农民手里的“多余的”粮食，城市里的居民强制地规定口粮标准，不管你吃得饱吃不饱。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的劳动积极性被打击，计划下的生产被管死统死，生产力不可能不受到压制，社会经济增长缓慢。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搞政治运动，搞阶级斗争，搞大炼钢铁，搞大跃进，国家被折腾的经济下滑。更加上自然灾害，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就是中国自打进入了社会主义的真实现状。

乌托邦的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可言，必须高度的集中，必须极权。在中国尤其是公社制度下的农村，是试验性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公社里是绝对的大平均、大锅饭，收获后按人头分了口粮，剩下的所谓的按工分计酬少得可怜。而公社的各类干部可以得到各种补贴的额外报酬，那是绝对的按等级分配。在现代工业化时代，城市里搞不起来乌托邦式的公社制度，而在经济水平低下的中国农村，正适合毛泽东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公社制度的试验。尽管公社制度的管理一再“完善”、“改进”，但是改不了它乌托邦的实质，最终在七十年代末全面推翻。毛泽东的乌托邦试验还被柬埔寨共产党红色高棉的波尔布

特引用（毛泽东曾“亲切的”接见过波尔布特，传说毛当面赞许过波的种种做法），造成了二十世纪在亚洲发生的最大的，被国际法庭审判为“反人类罪行”的案件。波尔布特不仅大搞平均主义，而且真的搞了“分产配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行。他杀了不计其数的人，包括西哈努克众多的子女。红色高棉的倒行逆施，使中国共产党也无法包庇柬共红色高棉的滔天罪行。

上世纪六十年代，非洲不少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再加上一些亚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打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号。这些国家都是经济落后，还有政治腐败，派别斗争激烈。有的国家还有领导者争权夺利，国内战火连年，政变不断。这些国家人民生活都极端贫困，少数执政者豪夺敛财，社会主义空有其名。这就是经济水平低下，政治又不成熟，社会主义反而成了贫穷落后的标记。这也说明社会主义不是随便可以叫的，达不到一定的水平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从南方出差回京，与一个外交部的较高级官员同坐在一包厢里，他不是一个巡回大使，也是一个信使。他告诉我，他走遍了亚非拉国家，凡是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穷的叮铛的。后来 1995 我探亲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女儿那里，遇到一个在那里也是探亲的离休老同志，他是中联部的，曾随着中共代表团出访过一些名为社会主义的小国，这些国家靠着中国的一点援助，勉强的过着日子，其实它们如果切实的搞好经济，不铺张浪费，注重民生，不至于走到穷途末路的地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老大——苏联，发生了

解体，苏联和相连的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以及蒙古，都相继宣布改变了社会制度，所有的执政的共产党都被取消了，成了非法的或下台的组织。社会主义阵营不存在了，世界上只剩下包括中国在内少数几个国家，还保留着社会主义的制度。

中国向何处去，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方向，但是坚决摒弃过去苏联社会主义的模式，也不再继续毛泽东式的不断革命的社会主义路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提出，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如何走法，他说要摸着石头过河。至此，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凤凰涅槃的飞跃。中国共产党汲取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失败的教训，总结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失误。使中国稳步快速地发展了二十年，中国成了举世瞩目的，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大国。不能不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在这二十多年来，不断完善不断改进走出的一条路，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只是从经济层面上所想到的，体会起来有以下几点：

1. 保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核心地位，实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和建言建策作用。特别是倾听民主党派里专家的意见，发挥专家治国理财的专长作用。这在经济领域里呈现了明显的效果。政治上一个时期，一定程度实行者一些专制手段，它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但是长远会出问题，专制一定会产生腐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不能长久的专制。

2. 所有制不再是单一的公有制，只是在重大经济领域内保证公有

制的主导地位。通常情况在一般经济领域内，都允许有多种类型的所有制的存在。可以有全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合作制企业。说是国有资产的企业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同样纳税，所得利润上交国家财政。但是它们处于垄断地位，能得到最大的获利。

3. 国家不再制定严格的指标性的计划，不再规定完成任务的数字指标，不再用行政手段干预经济的运行。国家每五年的计划和年度计划，更多是指导性的规划，对各领域、各区域、各部门，国家通过计划达到协调和均衡。国家首先通过各种经济法律法规，规范经济的运行；运用金融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工商管理政策、价格政策、奖励惩罚政策，指导经济运行。在特殊情况下，国家采取各种宏观调控手段抑制或刺激经济的增长速度，平衡经济过热，但是国家行为的运用不当时，也会违背了经济规律。

4. 用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不是发展自由经济。而是建立受到控制的、有序的、健康的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就是要遵循经济规律，不是人为的强制性的干涉，但是要受到国家各行政执法部门的指导和监管。市场经济是指商品的生产、经营、流通，要符合市场的经济规律，不能盲目，不能放任，国家要给与指导；国家的监督和管理是保证市场的有序。约束经济活动里的不规范、不诚信、不合理现象，取缔各种违法的经济行为，打击经济犯罪。市场的无序就会造成市场的混乱。法律法规、信贷管理、税收杠杆、价格调控、流通控制都是国家监管和指导的重要手段。在特别的情况下，国家可以以

国家的权力对经济实行严格的管理。

5.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重视“三农”问题。中国是一个农村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又是农村耕地少，农业生产水平极不均衡的国家。农业经济问题，农民问题，农村建设问题，解决得好否，关系到全国人民吃饭的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关系到国家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最终实现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所以每年中共中央的第一号文件都是有关“三农”问题的。正是这样，农业生产保持着粮食产量连年递增，基本上能够养活着全国十三亿人口的吃饭，农民的生活不断提高。农村的面貌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6. 经济开放也是表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部分。经济开放最先是引进来，吸收外资办厂办企业，再后来开放经济特区，扩大吸引外资，吸引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人才的力度；继而是走出去，走出去学习、走出去考察、走出去访问，向外投资办企业，合并和收购国外企业，办跨国联合企业。现在是进一步把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走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道路。开放资本市场，经营国际货币，扩大外汇储备。所有这些是以前没有的，也是不敢想象的。但是这些开放的运作，完全是国家主导的行为，即使是民间地组织行动，也是受国家管理的，纳入到国家统一的规划里。

7. 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有能力也有实力控制着经济，能够规避任何经济风险，能够抵御国家发生重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能够预防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任何意外。甚至在国际金融风暴中，中国能保持着经济的稳定和高速增长。使世界都认为是奇迹。

8.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一个明确的近期目标，使中国在不远时间内，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现在已经在逐步接近。我国的贫困人口从前两年的一亿多逐渐减少到三千万，不久就可以完全解决没有联合国规定标准的贫困人口，小康水平可以很快达到。在本世纪中人民生活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面对着自苏联解体，其社会主义终结这二十年来，世界发生巨变，造成对社会主义前景信任的危机。而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给出了提示，不是社会主义不行，而是实行社会主义，方法要符合国情，措施要切合实际，领导者要有果断的判断力的和勇气。

我思考了很久，尽管一些人对现在的社会主义有这样那样的看法，甚至有非议，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从实践的效果来评判，如果实践是成功的，那就不要过分的去吹毛求疵。或许成功的就是合理的。但愿中国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先走向小康，而后走向富强，使中国成为真正的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层面，我说不清楚，可能就是核心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共同协商，互相监督”。也就是不搞轮流执政，不搞在野党，不搞西方的议会制度。

三面红旗引导我们走向……

1957年下半年我们国家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人们都想急切地跟着时代的步伐赶上潮流，愿为新时期的到来做出一点贡献。尤其是我们这些二十多岁的年青人，更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要为社会主义的建设添砖加瓦。教研室里基本都是青年，大家讨论着，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当然是要用我们的专业投入到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洪流里。最初我们还是小打小闹为我们学校外的农业社生产队，打浅层的农业灌溉井；为我们南面北京航空学院盖楼，浅钻取工程地质测试的土样；派人到建设十三陵水库的工地上，进行钻探和掘进的任务；在京北南口山区钻进工程地质井。后来我们扩展到在河北衡水，承担了打农业供水井的生产任务；在河北峰峰煤矿，承担了煤田地质钻探任务。1958年的5月之后，全校组织了规模化的地质勘探队，探工系是主力部队，承担着全部钻探任务，在密云勘探铁矿。我则参加了我们学校物探系组织的物探队，在江汉盆地勘探石油。我是带着学生钻进地震勘探爆炸孔。大部分地质类专业的师生们也都出野外，先是参加了全国的大比例尺的地质图填土工作，而后是投入了全民的找矿运动，几乎遍及了全国各地。

我们真是全校齐动员，师生倾巢而出，轰轰烈烈进入了大跃进的洪流。学校课也不上了，教学计划扔在了一边儿。各种实习和课程设计、毕业设计都用生产实践来代替。报纸大肆宣传清华大学的实践教

学——不搞脱离实际空对空，拿起真刀真枪实战。我们地质行业的战场当然是在野外，在崇山峻岭之中。我们的教学、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都统统变成了实战。学校里不见了学生，不见了老师，即便是与地质专业毫不沾边的基础课老师，也都打发跟随学生们出队，一律都到野外去了。

这时候学校里还有苏联专家，他们简直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还要保证要有一定数量的教师听他们讲课，他们带的研究生也不能动，学校里还有一点少得可怜的师生，否则学校剩下的只是职工了。

1956—1957 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也的确是快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发展指标，到 1957 年底提前两年完成任务。于是想急于更快地发展，1958 年 5 月特别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原先说十五年超过英国，现在要五年赶上英国。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实际上是推翻了中共八次代表大会的一些提法，以更“左”的方针把中国推向了激进的道路。1958 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掀起了声势更强大的大跃进的浪潮，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要把钢产量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57 年全国钢产量是 585 万吨）；农业上全国总产量要达到农业十年发展纲要的要求（黄河以北亩产 300 斤，淮河流域亩产 500 斤，长江以南亩产 800 斤），农业也提出“以粮为纲”。大跃进出现汹涌澎湃的局面，有的地方农村又进一步成立了“人民公社”。把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到

一起，土地连片从新划分，生产资料集中；统一指挥，分工作业，集体劳动，共同生产；还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公办小学划入公社和大队管理。于是全国各地效仿，纷纷成立人民公社。最高指示：这是“一大二公，共产主义的雏形”，还是“人民公社好！”。原来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与公社生产经济组织合并。公社成为集中行政管理、经济管理、组织生产，半军事化的组织。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在全中国范围农村里展开了空前历史性的实验。就这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做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引我们要跨越式的走向“共产主义”。

1958年我们地质学院，为贯彻总路线也投入到火热的大跃进的洪流里，原本的实习由老师们带领着学生，组成了一个一个小分队，奔赴全国各地，协助当地发动群众，全民找矿。我们目睹了在三面红旗的招引下，人们疯狂了起来。我到了河北南部，看到遍地一座座土小高炉，炼着几乎是石头的低品位铁矿石。还有一个个土炼焦炉，冒着浓浓黑烟把优质煤，烧成土高炉配套用的焦炭。人们都顾不上收获地里的粮食，忙碌着“大炼钢铁”。公社的食堂让大家吃饱吃足，我们去参加找矿的师生，也是走到哪里就白吃到那里。真是感觉让人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农业上爆发出“放卫星”的大喜讯、特大喜讯，从亩产万斤、几万斤节节攀升到十几万斤，简直是令人目瞪口呆。农业生产又借东风，快上大干，到处有农民们深翻土地、挖塘积肥、密植插播、挖渠造田火热地鏖战场面。我这时正在河北枣强县一个农场协助打灌溉水井，

也参加了深翻地的战斗。人们挑灯夜战，真是挖地三尺，干活的老农民则叫喊着：“这挖出的生土能种庄稼吗？”一边监督的干部回答说：“这是上面的指示，不能变！”。后来有一次，我对农场的农工说，报纸、广播报道亩产几万斤、十几万粮食。他说，那是吹牛，吹得越大发越能受到表扬，真能出那么多粮食，神了。

1958 年临近冬天，我们师生陆续从全国各地返回学校，在大礼堂召开了庆功大会，还请来了地质部长何长工。一个一个以省为单位的找矿大队的学生们，在庆功大会上报告，找到了几百万吨、千万吨、亿万吨储量的大矿。满以为可以得到部长的表扬，结果部长一盆凉水劈头浇下，部长说，你们放的卫星我一个也不承认，我要把你们找到的矿产储量报上去，明天主席找我要矿产，我拿什么交差？在野外的时候，找矿队里的老师们没有少挨学生的批判，学生们说老师保守，不大胆，死教条。老师纷纷被学生们“拔白旗”，回到学校学生们趾高气扬宣传胜利战果。部长的一句话，把学生们打哑巴了。部长告诫学生们，要认认真真学好地质勘探知识，不能只懂得一点，就自以为是，要好好地听老师的，学好老师教给你们的知识，才是你们以后从事地质工作的本钱。我想，何长工这样的来说学生们，也无疑是在说粮食、钢铁“放卫星”的荒唐，有点借题指桑骂槐罢了。这以后在文化大革命时，也成了批斗何长工的罪状之一，指责他是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三面红旗引导下的疯狂，其恶果到 1958 年底就初见端倪了。首先是农村人民公社的食堂，一个一个没有多少粮食了，大跃进的大吃

把库存吃得见底，食堂先是吃稀饭，后来是瓜菜代。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连锅灶也砸了。农村开始饥饿了，没有了力气干活。大炼钢铁出来的废钢烂铁没有人收购，成了处理不掉的垃圾。砸进去的钱白花，投入的劳力白费。1959年我去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看到厂内的的一个大片荒芜的空地上，布满了土炼铁炉、炼钢炉，炉渣、废钢铁堆满了场地。这是一个正规的国营大厂还如此，广大的靠近矿区的农村，又该是怎样的情景。后来我在湖南江西的相邻的矿区看到的景象惨不忍睹，因为没有煤，大片的森林树木被砍伐用来大炼钢铁，山上的植被被破坏，到处是一个一个土高炉，那里的铁矿石是硫铁矿，炼出来的是毫无用处的棉絮铁，堆砌的满山皆是。北方大片的贫铁矿区，遍地的小高炉，烧出来的只是含铁高一点的石头。

1959年城市里开始出现食品、日用品短缺。只有在战时才实施的配给制度，在中国又实行起来了，先是1957年开始了粮食定量供给，购粮只是记在购粮本上，那时还没有感觉粮食不够吃。1959年又进一步实行粮票制，每人按定量发给供应的粮票，但是餐馆还不收粮票，到了1960年餐馆吃饭，早点小吃，一两二两都需粮票，食堂里更加严格，这时感到粮食紧张了。北京还略微好一些，外地很严重了，很多地方已经少吃少喝，农村更是出现了饥荒。1959年全国逐步地全面实行配给，无论粮、油、肉、蛋、糖、各种副食品，以及其它，还有布、棉、烟、酒和各种工业品，都按证按票定量供应。中国的困难时期拉开了序幕。此后1959年北方部分地区连续三年灾害，粮食减产，这当然就把出现的困难，归结为自然灾害造成的，这个时

期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到底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历史会有公论。

1958 年原本是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我一年的二分之一都在野外。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到了南方，所看到的都是丰收的景象。先是在密云我们准备自组队，勘探铁矿，跟随着地质的老师去踏勘。后来成立了北京地质局，组建了勘探队，局和队都完全是我们学校的干部和教师，搭起的架子。钻机开始勘探，我陪同学校的肖副院长，同时他又是刚成立的地质局局长，深入到钻机机台上劳动。我们住在农村，看到地里庄稼长的很好，从小在农村长大，青年时在冀中农村打游击出身的肖副院长，连声赞叹着今年是一个丰收好年。六月份我又跟随着物探系自组的地震勘探队，到湖北江汉平原进行人工地震方法的石油勘探，帮助学生们，掌握汽车钻机打地震爆炸孔的操作。我们在最富足的鱼米之乡移动作业，稻谷和棉花都长得极为可爱，丰收在望。未曾想到第二年这个地方就出现严重饥荒，相邻的孝感、麻城、黄安，困难时期是湖北饿死人最多的地方。八月份我回到北京，又去了河北枣强，所看到的是疯狂的大炼钢铁和深耕密植。田里的秋粮都顾不及收了，只有一些老人和小孩儿在田里忙活。十月份的时候，枣强农场食堂晚饭的食物就不全是纯粮食的窝头，而是掺有南瓜的玉米粥。粮食的不足在生产粮食的农场都呈现出来了，农村就可能更是境况艰难了。

1959 年年初我跟随着石油地质系，去到玉门油矿进行矿场地质实习，油矿地质的老师带着学生到钻井现场，我就配合着油矿矿场钻

井地质实习，让学生们认识和了解钻井生产的程序过程，和钻井生产工艺。这时候大庆油田的会战还没有展开，玉门油矿正是热火朝天地，向外围深部扩展勘探。1959年在甘肃已经出现困难，因为玉门油矿是全国石油勘探重点开发区，甘肃省全力保障生活的后勤供应。我们在这里共待了三个多月，没有感到生活的困难，食堂里的肉菜和饭食都是不错的。听我们实习队的管生活的老师说，这里的蔬菜副食都是从兰州调运过来，还有直接到新疆采购来的。整个新疆农副产品还比较丰富，大批的陕西、河南的“盲流”涌向新疆。

五月初我们来到从玉门油矿向西南的祁连山里，一个叫鸭儿峡新勘探区，做深钻的钻井地质实习。钻井大队的生活驻地就在峡谷两边的山坡上。一天中午时分天空十分晴朗，我们正在食堂吃饭，忽听到食堂外传来低沉雷鸣的轰隆隆声，我们从食堂里出来，只看见洪流夹着大大小小的卵石，从食堂前的峡谷沟底滚流而下，像是千军万马奔腾，真是惊心动魄。很快也就一、二十分钟洪水泥石就完全顺沟谷滚流到戈壁滩上。我们回到沟谷对面的帐篷里，帐篷的四边都被洪水冲开，帐篷被绷绳紧拉着没事儿，幸亏睡的床铺是由埋在地里的木桩，担上横条铺上木板钉成的，没有冲倒、冲垮，上面的被褥衣物没有任何损失，有个别的帐篷和土房，靠近洪流中心，全部被卷进洪流。我们住的帐篷里面只是地面上，铺上一层厚厚的泥沙石子，地上的脸盆、牙缸被冲到了一边。我们是临时过来实习的，没有带来多余的鞋和物品，如果铺底下有鞋肯定被冲跑了。第二天我们就撤回到矿区玉门市里。很快省里从兰州派来了慰问团，带着慰问金和新衣被来到玉门，

我们个别受严重损失的学生得到了补偿衣被和补偿金。

六月份我们实习结束回到北京，反而觉得北京学校里的食堂没有油矿上的食堂吃的好。油矿正在鼓足干劲勘探和采油，甘肃省给了全力的支持和照顾，那时大庆还没有上马。等到我 1960 年 10 月份再次来到玉门，大批的勘探队伍从玉门油田调集到大庆，玉门街市萧条，成片的工房人去屋空。食堂没有油水全是粗粮，我第一次吃到青稞，和前一年来玉门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从玉门回北京怕在火车上买不到吃的，带了几个粗粮饼子，一路上就着开水吃到了兰州。沿路上看到甘肃的饥民扒着车窗向你要吃的，那简直不是个滋味，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吃的好给人家。1964 年又来酒泉地质部系统地质队上搞“四清”，一个钻机机长告诉我，他们在野外生产作业时，看到骨瘦如柴的饥民，向他们机台走来，眼看着就倒在了路边。他说的这个我在四年前，兰新线上看到的不就是这样的饥民吗？不知道那时的饥民有多少能坚持活下来了。这个人民的苦难，国家的伤痛，是我们这一代人，永远难以忘怀的。

尽管北京以外已是那样，但是“大跃进”的号角，依然还在紧催着我们，要掀起科学技术革命的新高潮。先是一阵风大搞超声波应用的技术革命，团市委号召青年人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群众运动，学生们一窝蜂跑到食堂和大师傅一起，应用超声波炒菜、煮饭、洗菜、洗厨具。我们系的学生，用超声波搅拌泥浆。再高级一点，学生由老师带着，用无线电器材，组装超声波发生器。材料毁坏了不少，弄得乱七八糟，什么都一事无成。

1959年夏季在庐山召开一次的中央工作会议，目的是想要使过热的“左”的倾向冷下来一些，平息农村刮起的共产风，扭转农业生产下滑的局面。但是由于彭德怀写了一个万言书，反映了农村的实际情况，惹恼了毛泽东，把反“左”变成反右。彭德怀、张闻天等，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然后在全党大力展开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人人过关检查右倾思想。把“左”的倾向更向前推进一步。

在大跃进技术革命的总形势下，我们系投入了钻探自动化操作的研制，学校拨出专款，党委成立领导指挥小组，动员机工厂、设备科、财务科、电工室一路开绿灯，保证研制任务的进行。我们日夜制图设计，加班加点制作安装，食堂夜宵供应，学校拿出储存的应急粮票保证参加研制人员吃饱吃好。1960年整个多半年，我都全力投入了这项工作，国庆节前我们终于完成了“钻探操作自动化”技术革新，向国庆献礼的任务。最后向部里探矿司、教育司有关单位和院领导做了全过程的系列表演。当然参观者给了好评和勉励。实际上这纯粹是一个花拳绣腿，毫无实用意义的作秀，我们表演完了，制作的设备也扔在那儿了，最后成了一堆废铜烂铁。应该是严谨的、科学的技术革新研究工作，变成匆匆忙忙，粗糙潦草的突击运动，自我吹嘘胜利的战果，向市委向宣传部门报功。这就是三面红旗的胜利，大跃进的成果。我倒是从中学到了不少机械设计、机电控制的知识和技能，但那是交了沉重的学费的。像这样的搞运动式的技术革命活动，岂止仅仅是我们，各大学、各生产企业、各研究单位都这么干。这不是在给困难的形势更加码加劲吗？学校里群众运动式的一哄而上搞技术革命，搞科

学研究，只能是劳民伤财，一无所成。其遗留下的余毒更是带坏了，我们科研工作的风气，使我们科研总是脱离实际，哗众取宠。

1960年10月又去了玉门油矿，对石油地质专业学生进行钻井课的现场教学，看到了甘肃的饥荒，真是触目惊心。只是从北京出去了一个多月，10月底回到北京，也感到北京生活恐慌，心情压抑的气氛。人们普遍表现出沉闷的脸色，不苟言笑，不多交谈，像是灾难临头的样子。

1959年到1960年9月以前，北京毕竟是首都，比起全国大多数地方还是好得多。各种凭票、凭证的东西还能保证供应，市场还比较丰富，外地到北京出差办事探亲的同志，都是大包小包地往回带。而1960年秋以后，市场上商品匮乏，货架空荡，到处排着长队抢购东西。听说，也害怕北京太特殊，引起外地人民的不满，不得已减少了对北京物品的调配，北京也和全国其它各地一样地紧张了起来。计划供应的商品严格凭票、凭证供应，连蔬菜、青菜都有每户每天的定量。豆腐、豆制品也实行了定量供应。

我们在食堂吃饭，要严格按计划控制，每天用餐是“三·四·三”控制。即，早上三两，中午四两，晚上三两，我们的定量是每人每月三十二斤，如果控制不好吃超了，月底就要没有粮票饿肚子。我星期天回城里的家，必须带粮票回去，母亲是按居民粮食定量，每月只有二十七斤，我妹高中生每月也只有三十斤。1960年的冬天，因为肚子不饱，总觉得很冷，穿的多多的也不觉得暖和，人们都没有劲头，龟缩在自己的房间里，晚上很早就睡觉了。操场上冷冷清清没有锻炼

的身影，学生们在课堂上大多也是无精打采。更惨的是那些刚到教研室来的新教师，他们从学生的定量一下减成为教师的定量，原本生龙活虎，变得蔫蔫的，血气方刚，盛气凌人的劲头没有了，学习会上曾经是政治高调，也不自主地降下来了。

三年的困难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给苏联还债。抗美援朝的时候，斯大林为了让中国能出兵朝鲜，答应提供战争需要的一切武器和军事装备。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翻脸讨要所提供的武器、装备的钱款。这是苏联乘中国困难之危，逼债还钱，想让中国屈膝就范，听从指挥。偏偏毛泽东不买帐，为了表现中国人硬骨头精神，宁肯饿死，用大量农产品和轻工产品，出口抵债，硬是在三年把债务还清。中国人的苦难更是雪上加霜了。

如果1958年不是那样疯狂折腾，把丰收的粮食收获入仓；如果不过分深耕密植，违反科学种植，致使粮食减产；如果不“大跃进”浮夸吹牛，邀功虚报产量，使农民没有一点儿存粮；如果不搞人民公社的“大公”，把农民口粮全都集中到公社粮库，而藏粮于民；如果不搞大食堂，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如果那些基层党政干部、那些农村胡作非为的乡村干部，不狂征暴敛；如果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表现与修正主义斗争的坚决性，斗气拿粮食还债，……。1959—1960年即使出现灾荒，出现困难，会大批的饿死上千万人吗？非官方的估计，死人达到三千万之多。粮食产量下滑到1949年的水平。天灾人祸，农村一下子不能正常生活了，很快就波及到城市，造成连锁反应，城市也就不能不产生恐慌。整个中国城乡出现全面的生活艰难，经济倒

退的状态。

能说什么呢？三年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不是穷折腾的后果吗？摆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一味地斗争！斗争！斗争！一味的跃进！跃进！跃进！一味地反右！一味地疯狂！高举着三面红旗。三面红旗指引我们走向灾难，指引我们走向饥饿，指引我们走向倒退，指引三千多万人走向死亡。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1960年的冬天说的，给我留下了极深的记忆。

这个时候，北京已经非常困难，粮食供应几乎全是粗粮和少量粳米，副食品供应严重不足，人们普遍是感到吃不饱。到了食堂里买了两个窝头，一点儿没油的熬白菜，三下两下就吃下肚里，好像还是没有什么感觉。粮不够，瓜菜代，玉米面包成大馅儿菜团子，或者瓜菜掺在玉米面做成饼子，饼子是用罐头筒截成圆形制子扣出饼状，再蒸出来，称做“扣黄”。因为肚里缺乏油，肚子显得特别能吃，像是肚子大了，怎么吃也不觉得饱。人体所需的蛋白质不够，就出现浮肿、虚弱、无力。特别是高等学校里的大学生们，和刚毕业的青年教师们，衣物单薄，身体的自身热量不足，发烧感冒的很多，浮肿、虚弱现象更为严重。北京的那麼多高等学校，各学校普遍这样。这成了一个群体性的危险信号，不能不引起有关领导的担忧。

这个严重的情况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非常重视，立即指示，要求北京市委采取一切措施，改变这个情况。总理的所说的语重心长的话，传达到了每一个师生。总理说，困难是暂时的，但是每一个同志必须劳逸结合，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保存好体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北京市立即决定，凡是有了浮肿的师生，每人特殊供应两斤黄豆、一斤白糖、半斤鸡蛋。学校贯彻总理的指示，特别规定，早晨7：30起床，8：00早饭，9：00上课，晚上9：00

统一熄灯睡觉，停止一切体育活动。总理的关怀使学校的每一个人感动，一定要听从总理的嘱咐，坚强地挺住，面对这暂时的困难。

北京有家的人相对的好得多，尤其家在城里的更好一些，城里零售点多，总有一些不完全是凭票、证的东西卖，在城里可以看到到处有排队买食物的，数量很少一会儿就卖完，要靠有机会碰到。例如白薯、土豆、豆子、干果等等，副食店还可以碰到骨头、下水之类的，也可能要肉票，但折合的肉票很少。排队的大多是那些不工作的老头儿老太太们，也有是碰上运气的过路人。城里在街上都是为吃奔波的人。有时候也会遇到农民，提着小蓝小筐买一点自产的薯干、果品，甚至是自捞的小鱼小虾。这些让市民看到无不是好东西。而在城外住在大院里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星期天回到城里家，母亲总要把一些好吃的，留着我们兄妹们，大家聚齐了一起吃。我和上大学的弟弟，户口都不在家里，吃的都是母亲和妹妹所供应的肉、蛋等东西。我们感到无比的愧疚，母亲总是宽慰说，我们在城里总还是有一点办法，可以买到骨头和下水，比你们吃大食堂还是要好得多。那时候南方还比较好，尤其是浙江更好一些。我的大妹恰好在杭州，不时托到北京出差的同志，带一点咸肉、咸鱼、虾仁、甘笋等等吃的东西，母亲如获至宝，留起来等我们都回到家一起吃，改善生活。一次我弟弟在他们学校外，农民的菜地里检摘到一点嫩绿的菠菜，带回到家里，正好做了一大碗菠菜鸡蛋汤。那真是味道鲜美极了。我们有家的人，比起只能在食堂吃饭的单身感到幸福的多了，但是我也只能每周回一次家。这时候多么想自己也能有

一个家呀，不用住在单身宿舍可以天天回家。

这时我也已经有了女朋友，她是经过我同学也是同事，孟澍森的爱人介绍认识的，她是离我们学院不远的一个小学校的老师，叫徐宏勤比我小五岁，人漂亮也活泼，初次相见我们彼此都很满意。他家在朝阳门外，棉纺厂的宿舍区，比我的家还要更远。我们1960年8月认识的，10月底我去玉门钻井现场教学回来，我们来往几次，只是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心心相印了。没有花前月下的甜蜜情话，没有浪漫的卿卿我我，大冬天的无处可去，只能短暂的相互依偎在我的宿舍里，知趣的同事只好回避到旁边的其它房间里，不能到很晚我得骑车带着她，把她送回小学校。在那个极端困难的特殊岁月和环境里，彼此都有有强烈互相依托相互温暖的要求。她的学校在前八家农村，校舍是有由大庙改成的，但还是这一片的中心小学。实际上是一个农村学校。宿舍是用炉子取暖，晚上回到宿舍一点都没有热气。所以她特别想在地质学院里我们能共同有一个小家，有一个栖身的安乐窝。如果不是因为认识我，他就要求调到朝阳区离家近的小学里。她每周六回家周日又要赶回学校，每天又要住到那破旧的平房里，在那个冬天实在有些受不了。这时候有了我，想很快结婚能够有个依托，也算是找到了归宿。我们很快相互去见了对方的老人，老人和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都很满意，我们就算正式确定了婚约。

就在这时候，我母亲发现得了乳腺癌，需要立即手术，我不得不忙于母亲的治病，把结婚的事先放一放。1961年1月多母亲在医院做了乳腺癌的切除手术，当然花了不少钱，经过领导批准向学校借了

住院手术费，经过一年逐月扣工资还清的。母亲手术很成功，五十多岁手术，直到终老活到九十多岁，算是长寿了。虽然当时已经是非常困难，但是医院的伙食还是不错，保证了病人的营养，吃得全是细粮，也有一定的肉食荤菜，外边的食堂是全然做不到的。我去探视母亲的时候，她偷偷把没有吃完的馒头，给我带走，让护士看到了，说了我们，弄得我非常的尴尬，那个年头真是顾不上脸面了。

我母亲出院回到家里，正好学校也都开始放寒假，徐宏勤也常住在我家里帮助照顾母亲。凭母亲出院的诊断证明，我们可以买到一点额外的鲜肉、鸡蛋、红糖和好几斤的大骨头。即将赶上春节，我们都拿回了节日的肉票、油票、点心票，我们全家，母亲兄弟妹还加上未来的大嫂，共同过了一个美美的大年。当然没有过门儿的媳妇，除夕她还得回到自己家吃年夜饭。每当我回想起这一个艰苦的日子，我都感到内疚和惭愧，母亲手术以后本应该让她获得好的营养，让她吃得好，使身体得到很快的恢复，但是我无法做到，反而借着母亲生病的光，我们得到一些好吃好喝，怎能不让我难受呢？

母亲术后恢复得不错，身体也逐渐好起来，他催促着我们马上结婚，在这个时候赶快有个家，能够互相照应着。于是我们在三月中办了结婚登记，向学校申请了住房，老同学李震跑上跑下给我要到了一间筒子楼宿舍，我总算有了自己的一个小的蜗居。我们匆忙地做了一点准备，那时候简单得很，既不需要购买家具，也不准备什么大件物品，只是每人买了一点新衣服，床单、枕头，妈妈早已准备了新的被褥。幸好那时有了高价糖果和高价香烟卖，买了一点糖和烟，成了结

婚的一笔最大的开支，大约是我半个月的工资。5月1日的晚上系里、教研室的同事们，一起来热闹了热闹，家里人是母亲弟妹和宏勤的妹妹来了。我们就是这样完成了，人生的一个最大的启动程序。我有了一个小小的安乐窝，有了一个旅途中，可以停泊的避风港湾。

1961年春节过后，北京经历了一段更加艰苦的日子，一些凭票、凭证供应的东西，都不能足量供应了。肉票有两个月不能兑现，油也减少了数量，粳米、面粉都没有。食堂里看不见馒头。但是市场上出现了高价的点心。和高价的奶油糖果，俗称高级点心、高级糖，还有高级餐厅、餐馆。实际上是照顾到一小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社会上有钱的高层人士（不包括高干，高干享受特供）。市场出现了一点转机，也给人们带来了希望。高等学校里由于采取了积极的措施，遏制了师生健康下滑的趋势。

1961年3、4月份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两个特别的座谈会，一个是“科学技术座谈会”，一个是“文艺工作座谈会”特别地请到了一些科学家、艺术家、工程技术专家、知名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相关领导，由周恩来总理指派陈毅副总理主持两个座谈会。一方面是倾听这些老知识分子的意见，另一方面更是借此让这些老同志休息、休养，好吃、好喝。陈毅同志说，我受总理委托，给大家赔礼，前一个时期让大家受了不少委屈，这里我来给大家“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桂冠”。陈毅同志让大家在座谈会上畅所欲言，绝不打棍子，绝不揪辫子，说完了就算。陈毅风趣的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这两个会议的精神大大地鼓舞了

广大的知识分子。我想这也是贯彻总理指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国家保护好珍贵的人才，让这些老人们心情舒畅，延年益寿。我所知道的，我们学院的两个地质学家也是地质教育元老，一级教授冯景兰和袁复礼被请了去（他们都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现在称谓院士）。这确实体现了国家对特殊人才的关怀和照顾。陈毅还特别关照这些老同志们说，你们要好好在这里休息好、吃好，这是总理给我的任务，保证你们要心情好胖起来，否则我不好向总理交差。

最寒冷的冬天过去了，万象复甦，北京的市场也呈现了复苏的景象，两三个月最严重的短缺结束了，回复了原先按标准的供应，食堂里的菜看到了肉和鱼了，由于食物的一些改善，浮肿的人逐渐少了。但是严重的营养不足，使得有一些人，患上了慢性肝炎。我们教研室里就有好几个，李砚藻原来爱好武生戏，可以空翻、打旋，经过 1960 年，像变了一人，走路都打晃。他几乎过了三年才好转过来。还有个别的一些人发展为乙型肝炎。从大范围看这真是一个庞大的人群，过了若干年也不能完全消除这个伤害，致使我们国家成为世界上，乙型肝炎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所以这么说，因为以前并不常听说肝炎病，每年的体检也并没有听说谁得了肝炎的，而从这个时候起，以后的年月里，肝炎成了常见病，到处都有，这难道不是困难时期的后遗症吗？

困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健康的伤害，精神的伤害，从更高一点的角度看，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大伤害。总理的高瞻远瞩，采取了果断措施，不使浮肿扩大，不使肝炎蔓延，不仅拯救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拯救了一代人，也拯救了国家，这应该是永记青史，

功德无量的。

1961.3—1962.9年，约一年半的时间，各地各级都执行了比较好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出现了宽松的局面，知识分子们获得了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全国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的，50余万人有35万得到了甄别和摘帽，大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这就使着30多万人和他们的家庭，恢复到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摘帽右派”成了这些人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而且成为随时再打击这些人的把柄。文化大革命时，这些人大多又遭遇回锅。从1961年3月直到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这一段时期被称作“知识分子的短暂春天”。在这以后又大张旗鼓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知识分子们获得的一个短暂喘息机会，因为要应对“国内的和国际的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又彻底结束了。

无论周恩来怎么竭尽全力地保护知识分子，无论周恩来如何千方百计想留得青山在，但是有人总要从中断周恩来的努力，把前进的步伐，拖回到不断革命，不断斗争的的逆行线里。

很长时间里，我总是有些纳闷，为什么政策总是变来变去，特别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一会儿“左”了，一会儿又纠过来，可是过不久又说右了，赶紧又“左”。真是忽左忽右，摇来摆去，我真的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才弄明白，毛泽东总说，“党内有党，党中有派”的含义。毛泽东打骨子里就把周恩来看做另派，也确实很多时候周恩来就跟他合不了拍，或者说他总是搅乱周恩来所执行的工作方针，特别是有关对知识分子，由中共中央制定下的政策。1956年

共产党中央有关知识分子的政策作出明确的决定，要给知识分子松绑，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工作，这是毛泽东同意的，周恩来出面做了好多工作，得以有了宽松的局面。1956 年知识分子们衷心拥护共产党，在各项工作中，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积极努力，紧跟着共产党。而到了 1957 年风云突变，毛泽东翻脸大抓右派，刚过一年稳定下的知识分子们，又跌进了深渊。1961 年又是重复了历史，周恩来费了很大力气抚慰了受伤的知识分子们，但是到 1962 年毛泽东又发难批判右倾保守，对知识分子大拔白旗，再次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我现在才明白政策的变来变去，原来是执行者和发令者总是不协调，执行者做了很多事情，最初发令者是认可的，而后又翻盘。不仅是知识分子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重复这样的怪圈。

1961 年在这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在这个困难形势逐步好转的局面下，在这个又迸发出勃勃生机的春风里，人们又焕发了新的热情。我们系又开展了比较多的科研项目，有：铸钢钻粒、钻粒全面钻进、孔内风动冲击钻进、农田水利冲击钻机、岩石破碎力学理论、炮眼静态爆破等等。各项研究都取得可喜的成绩。我也积极地参加了铸钢钻头和铸钢钻粒的研究。

我个人也有了一个温馨的安乐窝，心情愉悦，轻松快乐。星期天一同回到我的家或是她的家，这也是我们一段美好快乐的时光，这时候还没有孩子，过着两个人的幸福。一年多以后增加了一个孩子，生活的艰难，经济的拮据，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压力。但仍然是高兴的。正像一个电影里的台词：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另外中国还

有一句古话，“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相信总归有办法，不是我一家，我们每家都是这样，我们不幻想虚无缥缈的未来，也不垂头沮丧。我和我的妻子就是这样携手度过一个一个难关，磕磕绊绊走过半辈子。我发现那个时代，我们每一个家庭都非常稳定，不像现在那么多的容易解体。因为我们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同患难，同呼吸，都必须相互搀扶，艰难地向前同行。在那个时候，家庭就是旅途中随时可以停靠的一个避风港，家庭就是苦难环境里的暂能休息的一个安乐窝。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难，我们就是这样度过来的，也可以说是熬过来的，挺过来了。不管怎么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所受到的苦难比起6亿农民真不知道好了多少倍。一则我们是城市居民，吃着计划供应的商品粮，受到一定的保证。那些农村的干部，接受上级的命令，强制地把粮食供应到城市里来。如果城市里还有饿死人，那不是要成为最大的事件了，谁也封锁不了这样的消息。这一点做到了城市里基本上没有饿死人的现象。二则我们更是生活在大城市，尤其是天子脚下的北京，更加受到特殊的照顾。不管怎样要比全国大多数的城镇好，极为困难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三、四个月。全国其它城镇熬得时间比我们长。比我们更加困难。三则应对严重的局面，对知识分子包括在校的学生的紧急措施，对高级知识分子的保护政策，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一手抓的。中央领导人清楚要建设国家，繁荣经济还要依靠这些人，不能使这些人受到损失。尽管不时敲打、挤兑他们，为的是使他们服帖，便于领导，但是在生活上还是要给与倾斜和照顾。这也正是周总理所要求的，“留得青山

在”的本意

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他是小孩子时候的事情。他是河南温县人，农村的孩子。温县是产粮大县，那里 1960 年的时候也不是饥荒特别严重，只是农民手里没有粮食，为了仅分到的一点口粮，保证劳力能够有力气干活，他的母亲只好带着她和弟弟，出门到洛阳要饭逃荒，把粮食省下来给干活的父亲吃，他就是这样随着母亲熬过了春荒。豫北这算是好的，而河南驻马店、周口地区却更是凄惨，真是饿死了不少人了。饿死很多人的省份，还有湖北、安徽、陕西、甘肃等等，全国大约有三千万人之多，都是农民。

过去我对这个也没有想过很多，而现在随着对事件了解得愈多，愈觉得愧疚，每每想到这些，就隐隐作痛。留下了青山，青山脚下也陪葬了无数的冤魂。

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受到的“教育”

1962年的1月中旬，由于从1959年以来出现的不求实际的冒进、浮夸、瞒报、造假，农村里大刮共产风，坑害农民；同时又是自然灾害，农业主产区都发生了饥荒，饿死了人。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国家经济急剧下滑，人民生活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的工作会议，全国各地，省地县级以上的主要干部全都参加，共有七千人之多，加上党中央、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坐满了人民大会堂。习惯上称做七千人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从未有的。刘少奇代表了党中央做了报告，把当前出现偏差的责任担当起来，承认困难是“三分人祸七分天灾”。要求立刻纠正各种过“左”的做法，特别要制止农村中的“一平二调”风（一是平均主义，二是无偿调拨物资，主要指粮食、牲畜、大型农具），号召全党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七千人大会之后，人们受到鼓舞，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规，国家的经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接着农村中开展了“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目的是彻底清查混乱的经济和粮食的收支，整治那些胡作非为伤害农民利益，贪污腐败的村、乡干部。这本来是刘少奇管的，挺好的一件事。进行了一段时期后，毛泽东插手过来，把“四清”运动改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加强阶级斗争的内容。在农村彻底铲除产生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发展集体经济，教育农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鉴于美帝、苏修对中国的威胁，要做好“反修防修”，

决定在城市也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做“四清”，叫做：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1962.9）上，强调千万不能忘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样实际上又掀起一场新的斗争高潮，要在城乡全面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把刘少奇甩在了一边。1958—1960年折腾得大伤元气，又遭自然灾害遇了极端困难的中国老百姓，1961年刚刚缓和下来一年多，再次卷进了斗争的漩涡。

1964年开学不久，全院师生分批下到农村参加“四清”，接受社会主义教育，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要进行访贫、问苦，听取农民的意见，了解农民的疾苦。我和一个班级的学生来到房山县南尚乐公社的一个生产大队里。这是一个平原地区的农村，主产是小麦，相对于山区这里应该是富足之乡。我们进村之后，师生混合着编组集体住在农民家里，轮流到农民家里吃派饭，每天和农民一起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用去专门地“访贫问苦”，农民会自然的给你讲很多，但是他们讲的那些，不是上面所希望的那样，让我们受到阶级教育，倒是反面的效果。他们诉说刚刚过去的，困难吃不饱之苦；诉说今不如昔，还不如解放前吃得好（因为这个地方原来很富裕）；诉说土改以后，由互助组、合作化初级社、高级社、到公社化，他们一次一次的变穷，吃的、穿的、用的都没有了，没有一点儿活钱；诉说挣得一点儿工分，不够付给分口粮的钱，农民多数都透支欠着队里的钱；诉说干部多吃多占，一茬换一茬，都是一个样儿。诉说解放前这里是拉锯的地方，今天是八路军、明天是国民党，来回地变，村干部们不管

谁来他们都不受苦……。在和农民的接触中，越穷的越敢说，无所顾忌。

总之在农村受了一个月的“教育”，确实让我有很深的感触，让我真正地了解了点儿农村，了解了点儿农民，了解了不是报纸、广播、和大报告里所说的那一套。首先，感到最为深刻的，解放后了十年多，农民还那样苦，不少农民住的还是破房烂屋，屋里空荡无物，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学，还有二十几岁的青年文盲。要知道，这是京郊农村，而且是南郊土地比较肥沃的平原地带，边远山区贫穷的更是可想而知。其二，公社化的目的似乎要把农民的私有观念全部化掉，但是人们更是斤斤计较得失，与干部争吵，干部说农民难管，自私自利，农民说干部多吃多占，不劳动；农民之间为一点小事打架、骂街，没有了过去邻里村民间的相互感情，没有亲属间的血缘亲情。其三，所谓集体劳动，敲钟后稀稀拉拉好半天到齐。我们干的多是耨地锄麦，干活的尽是妇女老人，干了一会儿地头休息，休息的时间比干活的时间还长。宣布歇工，妇女们赶紧忙着回家做饭，心在家里，出工不出力。其四，工分的计算，上面就规定下了，妇女只及男壮劳力的一半，干部是满工分，不用干累活，干部开会办事都算工分，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其五，村子里凡是大门楼高房子，不用问准是干部的房子，一般农民住的还是老房子，即使有新盖的房也是低矮的小房。贫富的差别不是贫农和地主富农，而是一般的农民和干部。过去地主富农的房子，远不及现在干部的房子。我感觉不到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就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村子里缺乏劳力，孩子多，有病人的

家庭，生活尤其困难，我们去访贫问苦，去不了最贫苦的农民家，他们管不起派饭，队里就不安排上这样的家里去。我们反而避开了这样最穷苦农户的“访贫问苦”。

我们在每家吃派饭，感到特别为难，我们只给半斤粮票三毛钱，农民总是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你炒鸡蛋，吃细粮，由家里的男主人陪你吃，妇女忙着，小孩儿拿眼盯着你吃。你能忍着心吃得下去吗？我们大窝蜂的跑到农村，是去帮助农民还是去给农民增加负担？我们确实在受教育，教育使我明白，为什么那些决策者，不能为农民多做一些实事，提高农民的生活，而总在那里折腾农民。建国十几年让农民还感到今不如昔，不是农村工作的一大失误吗？这就是我在农村“四清”时所受到的教育。我们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不是说人民公社好，不是说社会主义使人民生活提高，而是普通的农民都在怀旧，怀念过去。农民生活苦难到难以想象。

在这个农村里，还看到了唯一一个“地主分子”，是一个穿着又脏又破的孤老头子，在村里被派掏厕所，拉粪车的工作。他一个人迟缓蹒跚吃力地干着。看着他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可怜？同情？还是觉得过分？农民说他很老实，不吭不声的干自己的活。没搞“社教”之前，农民对他还挺好，队里派他做的也不是重活。逢年过节给人家写一些楹联对子，他是一个老文化人，写了一手好书法，我在不少的农民家里，看到他写的中堂，挂在堂屋正中的条案之上。在两家看到的，写的都是西晋李密的《陈情表》，我记得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字眼。因为他是

整大段的抄录《陈情表》。农民也看不出什么意思，当时我觉得这里有问题，像是一种哀鸣，像是哭诉。但是我对谁也没有说，只是记在心里。后来我回校查了《古文观止》里的全文，文中诉说的是祖母又老又病，可怜兮兮。李密陈请皇帝恩准他回家伺候他的老祖母。在《古文观止》里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而这个“地主分子”不抄录表达忠心护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出师表》，不抄录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辞藻华丽的《滕王阁序》，不抄录憧憬美好世界的《桃花源记》，不抄录表达崇高思想境界“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而抄录了有这么苦难凄惨描述的一段《陈情表》。这个“老地主”分明是在比喻自己，不仅是哀鸣、乞怜，还透露出愤懑不满。我当时思想一闪，是不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但是有什么必要去发难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糟老头子。可能就是一种人性的同情和可怜，我没有言语，没有声张，没有表现出“邀功”的“阶级觉悟”。现在想起来，确实是做对了，如果我把他揭发出来，或是报告他隐藏的意图，那他就一定成了地主分子翻案和对抗改造的典型，非被整死不可。我说出来，我则会被认为阶级警惕性高，受到表扬，还表明我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了觉悟。但是我只把这个当作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必非置人死地，装作没看到吞下肚子了。这也算是我参加“社教”运动所得到的又一个“教育”效果，居然同情和保护起一个老“地主分子”。天啦！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我反而是在起着如此的反作用，激起我的人性，激起我丧失“立场”的善心，这真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为了大学生们和老师们，到农村去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停掉一个月的正规教学。为了“反修防修”，遵照中央统一部署，地质部的所有地质队也进行“四清”运动。1965年秋季学院的马杏垣副院长被委任西北“四清工作团”总团团长。我们探工系四、五两个年级加上全系的多半教师，政治辅导员，又是停课半年，参加地质系统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这确实体现了政治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是第一位的。我是参加到，去甘肃省604地质队的“四清工作队”，地点在甘肃酒泉。地质部安排有专款，我们系师生几百人，连学生都可乘坐火车卧铺，开赴甘肃西部酒泉好几个地质单位。这回我们不止是学习受教育，而是做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四清”工作，说白了这回是派去整人的。地质部（其他省部级单位也一样），贯彻中央指示，不惜血本，不顾正常工作，劳民伤财，要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

我们到了604队，领到了工作服、皮工作鞋，立刻进入祁连山，参加钻机的生产劳动。十月份的山上已经十分寒冷，我们住进了用煤取暖的棉帐篷里。天空不时飘着雪花，供水要不停地往上泵，水管才能不被冻住，钻探需要赶紧结束，天气太冷无法作业。停工收队回到酒泉基地，往常是休整、学习，然后工人放假。而那年则要在此间歇，进行“四清”，工人们也都不能休假，全部要参加“四清”运动。我们在山上待有二十多天，除了需要检修的设备运到山下队部，其余的全部留在山上，也不用人看管。机长说，没有人上来，什么东西也丢不了。从山上到山脚垂直高度大约1000米，空手上山、下山都需要

两个小时，物资和设备都是靠索道运上运下的。山上海拔有 4000 米，冬天绝不会有人上去，东西当然丢不了。

我们回到了酒泉基地，很快召开了全队“四清”运动的动员大会，由工作队队长宣布运动的进行程序，纪律要求和政策交底。先是发动群众，全体职工揭盖子、找问题，同时学文件，提高认识；再是帮助干部洗手、洗澡，干部自己抖包袱、倒豆子、自我检查；三是，干部和群众见面，听取群众意见，向群众检查，求得群众谅解、通过；四是，下楼落地，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五是，对阶级敌人、坏分子、右派分子要揭发批判，斗争示众。提高群众的阶级斗争的警觉性；最后是，全体职工群众通过学习讨论提高觉悟，提高阶级斗争的意识，把革命的热情转化为工作的干劲。

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反修防修”，不发生帝国主义所幻想的“和平演变”，不屈服沦为苏联修正主义的附属，防止亡党亡国；批判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杜绝腐化堕落，防患于未然，使共产党员保持革命本色，使共产党永不变色；要以政治统帅一切，带动全体职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是果真能那样达到毛东想要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吗？第一，毛泽东想通过运动，达到全党步调一致，但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好象并不一致，以至于毛怀疑至少刘少奇就是身边的赫鲁晓夫，这样的运动他不满足；第二，不抓经济空喊口号，一味劳民伤财使国家愈来愈穷，使人民愈来愈苦，人民没有积极性，工作效率不高，他则认为突出政治还不够；第三，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断绝不了腐败，但是毛

泽东认为应该发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从政治到经济一起铲除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复辟。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在他的心中酝酿着。

“四清”运动开始，我们下到机台的工人里、队部机关的科室里与他们座谈，听取意见。每天学生（工作队员），整理记录，然后分别列出给每个干部的意见（包括揭发），可以给本人看的，还要抄出来交给本人，我则是做文案工作写出每天的《简报》，上交给“四清”总队队部，汇报工作的进展。毕竟我们是大学生和大学老师，做这些工作是毫不费力的，还有做政工的政治辅导员带领学生，整理记录、汇总分类都做得很快很好。我们工作分队队长不是学校的，是甘肃地质局物探队的领导，他就感觉到在这里领导很轻松，不需要怎么交代一切都做得满意。比他在原单位工作顺手得很多。

在 604 队的“四清”工作中，我扮演了一个很可笑又无奈的角色。先是帮助分队长，一个钻工出身的基层领导，没有多少文化，不会讲也不会说，粗鲁直爆脾气，检查过不了关，要我帮助帮助写检查。我就是耐心地一句话、一个字的帮助他，让他用最通俗的语言，最诚恳语气表达他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联系他的苦难家史，和自己的受苦经历，诉说自己忘了本，不应该随意和自己的战友、阶级兄弟，发火发脾气。他还真是声泪俱下的动了真情，讲得很实在。我帮他写的，不是照抄陈词滥调的政治套话，和干瘪扣帽子的检查，而是启发他，让他认识自己既然是当了干部，就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自己的工作水平。这样他可以脱掉稿子，用他的内心去讲，能够真情

流露。他检查的效果非常好，令人感动。他也非常感谢我，使他一下过关。本来他就没有什么问题，一个工人师傅那是很习惯地，骂骂咧咧对待它带出来的徒弟，对待下面的工人。非要搞这种人人过关的检查，我觉得应该帮助他，不要让他那样受罪，下楼就赶快下来吧。我觉得他虽然这回检查过关了，也真有“悔悟”，我相信以后他还会照样发火发脾气，因为在钻探的现场，见到违规的操作，见到违反安全的地方，特别是见到事故苗头，必然当场立即发火，容不得慢条斯理地讲道理的。所以那种检查过关，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纯粹是瞎折腾人。

轮到了 604 队大队的队长兼党委书记，他的检查在队党委会上就没有过关，然后还要在全队大会上向全队职工做检查。工作队队长又指定我帮帮他，这就让我有点儿犯难了。他不是没有水平，也不是文化很低。我了解了一下，也还是一个工作很不错的领导，有一定工作能力，也有威信，就是不很平易近人，官架子比较大。我觉得他也没有什么过不了的坎儿，两次三次检查也能过去。但是正赶上春节即将到来，“四清”工作必须要做到一个阶段，酌情收尾，春节后要开始做出队生产的准备工作。工作队队长要我一定帮他写好检查，一次过关，腾出手来抓工作。其他工作队员这时都已放假回家了，我留下来授命于紧急关头。我直接接触了这个队长，看了他写的检查，主要是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干巴巴，罗列一条一条，不像检查倒像报告。另外也不突出重点，平铺直叙，还不恰当地上纲上线，牵强附会。干脆我也不跟他讨论商量，就在他原稿基础上，修改润色。我看他也是不愿

再下功夫，任我给他修改。也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种检查显得无奈，也是根本不上心的，我也正是乐得赶紧帮他弄完，下楼落地，好交差放假回京。

首先，我帮他按他写的，摆出一些主要的工作上的缺点，对照第一把手的要求来检查自己，严格寻找差距；第二。抓住“突出政治”的纲，说自己未能用政治统帅业务，工作中主次不分，大事小事一把抓；再有，我帮他血肉丰满的讲述自己的工作热情，认真负责的态度，但又表示做得不够，还要进一步提高；最后，还表示一定不辜负党的培养和教育，不辜负大家的信任，带领好队伍做出新的成绩，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地质勘探任务。当然这讲的都是套话，迎合当时的潮流，但是我帮他润色，用真情的语言，让他表达得很恳切，很谦虚。但也不贬低自己，自我批评恰到好处。就这样，这位队长原封不动地照我写的讲，他讲的也很好，很自然，不像念稿子，更不是做报告了，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得到通过。他对我也说了一些客气和感谢的话，因为我毕竟不是他们队上的职工，更不是专职秘书，官面上的感谢话总是要说的。我总算完成了任务，赶紧启程回北京。过年的前两天上的火车，初一早晨到北京，年三十在车上过的，餐车还给包了饺子。

下火车，我穿着从队上的皮大衣、大头毛皮鞋，戴着皮帽子，看着是地地道道从大西北来的，直接去了城里我的家，进门让家里人吃了一惊。在北京休假大约十几天，又匆匆忙忙赶回酒泉了。

回去后，接下的就是“四清”收尾工作。忙着和队上的职工座谈，征求意见，忙着写总结，忙着归还从队上借的物品。对我来说还干了

一件可笑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的“四清”工作队长，写一篇他给地质队的全体党员上党课的讲稿。这真是很滑稽，我连党员都不是，我有什么资格来写党课讲稿。这位队长是一个当兵的出身，甘肃另一个地质队的队长，文化水平不高，让他正式的给别人上一堂党课，也真是有点儿难为他。他让我帮他，我只好接受了这个任务。我问他想讲什么内容，他说就讲一下，怎样做一个好党员。我说我给你写出一个详细的大纲，你照着那个用自己的话讲，不要念稿子。我想，他当了多年的领导，大会上讲话应该是有问题的，只不过要讲讲党课，缺乏条理性、逻辑性，这是我们当老师的专长。我不记得给他写的什么了，总之我看了看党章，按着我想象的应该怎样做一个好党员，起草了一个详细的大纲，至于他怎么讲的我知道了。事后他告诉我，他讲完反映很好，听他那个口气，是基本按我给他拟的那个提纲讲的。从这里也就可以想到，一般单位里的党课教育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道理谁都会讲的。

“四清”工作结束，“四清”工作队解散，工作队员各回各的原单位，我们学生们也都返回学校上课。搞了这么一个“四清”，学生们几乎一个学期没上课，这就是所谓的为了“反修防修”。为了“社会主义的教育”，什么教学计划、课程设置，一个上级指令就可以任意缩减或者取消。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是随意停学、停课，这种不正常不就是在按某一个人的意志行事吗？

在参加了两个“四清”的社会主义的教育后，我确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我总结了一下这种“教育”有五点：

一、强力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突出政治，首要的就是要求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时刻保持着对国内外阶级敌人，颠覆革命政权的警惕性。看待任何社会现象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任何人和事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任何言行要以什么阶级立场去衡量。一句话，就是要练就每个人都成为六亲不认的“革命人”，只有阶级情，不要“人性论”。

二、彻底树立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一个意志、一个行动”的准则，任何不遵循这个准则的人，就是偏离轨道，就是离心叛道，就要受到批判。当然对这个准则，从来不能这样明着说，但是却这样做，贯彻在工作中的方方面面。我小时候记得，这是“蒋委员长”的训令，查其根源，好像是从希氏那里移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那里怎么会有这个呢？

三、必须与毛主席的党中央保持一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不能有任何不同的意见（仅是不同意见，绝非不同政见，那也不行），更不能有反对的声音，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轻者是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重者就是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按照后来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就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永世不得翻身”。歌功颂德，高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就能高升、腾达。

四、我不会天真地相信通过这样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就能提高人民的觉悟，共同走向社会主义光明大道；不再相信我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全世界的三分之二的人还在受苦受难，我们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谎言；不能糊里糊涂，盲目地跟风跑，充当左先锋。这一点，

很遗憾，我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还是卷入到政治漩涡里；再不会“完全”“彻底”地向组织交心，暴露自己的不解和怀疑，事实是多少人因此带来灭顶之灾。

五、我通过参加“四清”，看清了不论搞什么政治运动，不能解决什么防止“变修”，防止“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变质”，而腐化、堕落。的确声势浩大的运动，能暂时的吓唬住，在利益和色诱面前意志薄弱的官员，但是因为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没有严格的监督机制，一有机会，他们早忘了廉洁、奉公的准则。共产党的官员从来就没有断过腐败，什么政治教育，什么党校学习，总是刹不住某些有权而缺乏监督的当官者的贪婪的欲望。

以上就是我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所受“教育”的心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贯彻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完全是一个劳民伤财的折腾。晚年的毛泽东时刻担心大权旁落，害怕身边的赫鲁晓夫，害怕他身后不能继续执行他的路线，一个劲地要扫清一切障碍，为他的“接班人”铺平道路。所以他不满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达不到他的理想的那样，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就是他晚年对别人讲的，是他一生里所完成的伟大事情之一。他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国民党，打到蒋介石，二是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地质学院里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3月我们就出队了，我带着五年级的学生，到内蒙杭锦后旗冶金部的405地质队，进行毕业实习。矿山探区是在黄河河套以北，大青山以南的山区丘陵地带。队部驻地在富饶的河套旁边。队上的生活还比较好，因为靠近农区，食物供应都很便宜。队上给我们提供了一顶大帐篷，我们全都住下了。

我们学生在进行了一段现场生产劳动实习之后，进入了收集专题资料阶段。这时候从报纸、广播传来了闹闹腾腾的大批判的信息，声势浩大地批判“三家村”、《北京夜话》、《海瑞罢官》。报纸上还发表了林彪请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一时轰轰烈烈的舆论攻势拉开了，像是要展开一场新的斗争运动。我们也赶紧组织学生学习讨论，完全搅乱了学生实习的心情。紧接着宣传机构公布了北大聂元梓等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北京各个高等学校里像炸开了锅，沸腾起来了，纷纷向本校的党委开炮，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所有的学校也全都自动的停了课。我们也接到系里的电报，立即停止实习，回到北京。这个时候，5月16日中共中央下发了《通知》，

制订了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序幕。在中国的现代的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十年大浩劫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这个时刻开始了。

回到北京进校一看，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什么声讨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砸烂封、资、修的教学制度，高校排挤工农兵学生，学校里学了许多没有用的东西，学制太长，要抛弃苏修

的教育模式……等等。但是直接指向院党委的大字报，倒不是很多。给老师们也贴了不少的大字报。更多的是直指教授们，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这时候各系各班的学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战斗队，有什么风雷战斗队、打狗队、横扫牛鬼蛇神战斗队……，其中最大的是“东方红”战斗队。它是联络了几个系和不同年级的学生建立的红卫兵组织。6月20日由“东方红”挑头，还有部分教师和干部，更是搞了一个小有声势的游行，控诉院领导不公平的对待一个处级工农干部，为这个干部鸣不平，闹闹哄哄展示了这个干部的清平生活。的确这老个干部比起其他同级的老干部，廉洁奉公的多，生活非常简朴。这个事闹得很有影响，沸沸扬扬。后来把这个定成了“6·20”事件。

学校里乱哄哄给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戴高帽子游街；把“反动学术权威”（其实就是多数的教授）、“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所有的院级领导）集中劳动改造；动手打骂所谓的“牛鬼蛇神”和家属当中的受管制的分子；有工人赤卫队到教授家里任意抄家，把教授从教授住宅里驱赶到小黑屋里，抢占他们的住房。

高校的局面越来越难于控制，新北京市委（彭真已经下台）汇报到了中央。刘少奇主持工作，决定向各高校派出工作组，控制住混乱的局面，整顿学校里的秩序。进校的工作组这在后来被称作刘少奇的灭火队，把烧起来的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给扑灭了。这个烈火实际上是江青、康生那条线上，派出的人偷偷跑到高校里煽起来的。跑来我们学校来的就有毛泽东和江青的女儿李讷，她直接联系的是我们系

里的一个政治辅导员叫王二来。后来工作组在批判王二来说，“你王二来！王二来！是大有来头”，他们确实不知道，其来头之大，是他们想象不到的。

毛泽东这个时候呆在武汉，还畅游长江，看着北京的局势任其发展。刘少奇派工作组他也不表态。我们学校里来的工作组是地质部何长工第一副部长（李四光是部长），派出的由一个副部长邹家尤带队。几百个工作组成员分配到各系、各班、各科室都有，首先把挑头的老师、干部和学生都管制起来，重点打击的是“东方红”组织。工作组首先把党委书记王焕，扶起来抓好日常工作，把瘫痪的各级党的组织启动起来，发挥党员作用。首先把矛头指向院长高元贵，把他定成为走资派，号召全院师生员工揭发批判高元贵。高元贵在师生中是有很高威信，学生们并不买账。这和北大清华不完全一样，那里是学生和教师在运动开始时，集中炮轰校党委和校长。地院到没有炮轰院党委和院长，而工作组却是千方百计的想抓出高元贵的罪行，欲置高元贵于死地。但是事与愿违，工作组没有抓到高元贵的任何实质内容，更无从抓到学生和教师、干部的“反党、反革命”的言行（这一点和北大清华大不一样）。工作组接着就是重点调查，整材料，组织批斗那些带头闹事的，学生组织的头头和教师、干部。工作组打的是“反干扰、反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旗号。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对组织“6·20”游行的学生和干部，成了重点的批斗对象。大会小会批斗那些定性为，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学生和教师、干部。工作组共整理了几大箱“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罪行材料，后来

被中央文革强令从地质部交了出来。工作组组员被群众追问，说这些人都是要被处理，送去劳改和劳教的，与极右分子同等对待。而对那些迫害教授的所谓“造反者”却任之不管，对受群众尊敬的院领导却不予解放，只是忙于对“反革命”学生和教师、干部的批斗。激烈残酷地批斗，大约持续了 20 余天。这后来被毛泽东斥责为反动黑暗的 20 天，并声言：“镇压学生的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把那场镇压行动，算到了刘少奇的头上。刘少奇（他要求人人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是活该倒霉，其实所有的专制者，对不驯服，违抗秩序的闹事者都不心慈手软。

正在工作队有条不紊的组织批斗，“引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回到了北京，发表了《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革命群众。在我们这个制度里，最上面的决定从来都是一级一级传达下来。唯独这次毛泽东的这一手，让各级官员意想不不到，一下子懵了，不知所措。这一下一个大翻个，工作组一个晚上从审判官坐到了被告席上。工作组长首先溜之大吉，工作组组员们群龙无首，龟缩起来。紧接着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撤销向高等学校派工作组》，至此工作组成员们各自回到原单位，垂头丧气灰溜溜地走了。

“东方红”组织的学生们却是不依不饶，向地质部要求让工作组长邹家尤回地质学院接受，地院革命师生的批判，但是邹家尤躲着不见，于是“东方红”发动更多的学生到地质部大院里静坐。邹家尤还是不出面，坚持了大约十天，直到毛泽东点了何长工的名，把他也列

入了刘邓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当中，邹家尤失去了靠山，老老实实跟随着“东方红”的学生们回到了地质学院。

邹家尤弄到了地质学院，也没有人批判他，更没有批斗，只是叫个工人看着他，关在了小屋里，似乎就是煞煞他这个副部长的威风，让他闭门思过而已。到了9月份，学生们都纷纷出去到校外煽风点火，或是离开北京出外大串联。也没有人顾及到这个邹家尤，于是派个车把他送回家去了。地质“东方红”在地质部大院静坐了十天，赢得了声誉，名声大噪，在高校的红卫兵组织里排到了前位，成了经常被召到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接见的学生红卫兵组织之一。

“东方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那些各种名称的红卫兵战斗队都合并到了“东方红”，正式定名为“东方红公社”，教师里的“红教联”，干部里的“红干联”。工人中的“工人赤卫队”，也都合并到“东方红公社”里，“东方红”在地质学院里一统天下。“东方红公社”的领导人，经过推荐公选产生了领导机构，负责的头头是朱成昭，其次是王大宾、蔡新平、聂树人等。“地质东方红”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都不断扩大，由“地质东方红”牵头联合了一些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中学生先成立有第一、第二司令部），“地质东方红”派去了一个常驻的联络员叫周永璋，被人们误认为司令，他也哼哼哈哈默认，被“东方红”撤了回来。实际上“三司”只是一块牌子，没有什么作用。应该朱成昭是司令，但是他自己不承认，也从不去过问“三司”的事，也不过问“东方红”的事物。这时候他已经走向反面，暗中反对起中央文革，

此时的地质“东方红公社”与“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北航“红旗兵团”、师大“井冈山兵团”，成为北京赫赫有名的五大红卫兵组织，其中，地质东方红、北航红旗在其本学校里都是唯一的红卫兵组织。而清华、北大、师大里都有对立派别，原本受压制、受打击时，都是一致的造反红卫兵，后来某些观点不一致，始终没有能够联合起来，有的倒是从统一的组织里分裂出来的新派别。北大、清华、师大都是这样。北航虽然只是一个组织，但是职工并没有参与，北航红旗也只是学生团体的组织。地质东方红却是大量的教师、干部、和工人都参加到里头了，形成了一个代替了原来原来行政机构的，一个全校性的权力组织。特别是各级的后勤管理部门，从处、科、室到下面的工人的班组，都是“东方红”，保持了原来的管理系统，维持了正常的运作。尤其是财务部门严格地遵守国家的规定，控制着各项经费支出，任何学生的头头都无权去支出现金，都必须通过原来各级的行政领导的签字和批准才能借款和报销。整个学校都是井井有序的，环境卫生也保持着良好。表明着学校里面没有混乱，没有纷争，职工们也都是正常的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到1967年底北京高校红卫兵渐渐地分为两大派，一个是以北航红旗为首的称之为天派，一个是以地质东方红为首的称之为地派。天派观点比较激进一些，地派观点则温和一些。这也有背景上的原因，北航红旗头头多是低年级的学生，背后又没有教师和干部，做什么事情就带有偏激的一面。地院就不一样，头头多是四年级、五年级的学生，背后又有干部教师把握，做事就稳妥一些。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

是，地质东方红和北航红旗，都同样接受了“中央文革”联络员们的暗示和唆使，派出人员到成都去抓彭德怀，地质先找到了彭德怀，派去的王大来直接接触了彭还谈了话，倾听了彭的诉说，他说他不反对毛主席，王大来向总部汇报，立即请示了“中央文革”，被大骂右倾。

“中央文革”又责成北航红旗去抓彭。地质东方红先下手秘密把彭德怀带到北京。夜间到了北京以后，严格保密不向外透露一点消息，不许监护人员对彭有丝毫伤害，严加保护彭德怀的人身安全。第二天一早就移交北京卫戍区，由卫戍区接走。北航红旗不依不饶向“中央文革”要求批斗彭德怀，“中央文革”居然批准北航要求，指示北航红旗和地质东方红共同组织批斗，批斗在北航大操场进行。地质东方红没有派任何人参加，成了北航红旗单独批斗彭德怀。在批斗中北航学生使用了强暴手段，彭德怀倔强，不承认反党反毛主席，北航红旗头头韩爱晶（他就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带头动手打了彭德怀。这是一个重大事件，以后成了韩爱晶判刑的一条主要的罪行。

北航红旗在许多方面与地质东方红，观点不一样，做法也迥异。例如在支持文艺界的“造反”行动方面，他们就支持打倒以“三名三高”为口号的低层人员为主体的一派，当然这派人多。三名三高则是名演员、名流、名人，高工资、高级别、高地位的少数人，实际上上他们也是受压制、常挨整、常受批的演艺人员、创作人员、编导人员。东方红并不是要支持他们，但是不认为他们是打击的对象。这些人在文革中更是受到迫害，甚至有的跑到地质学院里来寻求保护。例如，总政文工团以马玉涛、马国光为首的《长征组歌》全体演职员，

来地质学院演出《长征组歌》，慰问地质东方红，感谢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他们也是少数派。北影谢芳更是因为演过受批判的电影，再次受到打击，地质东方红的学生把她秘密转移保护了起来。北航支持的七机部“915”，地质支持的“916”就是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915”是以庞大的工人为主体的派，而“916”则是以技术人员为主体的派。在单位里搞文革运动，各自的观点绝对是不一致的。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各单位里的“革命派”，都或多或少表现出“天”派“地”派的特点，一派激进一些，一派温和一些。尤其是几个名牌大学里更是突出，北大、清华、师大、人大里的两派对立、斗争得很厉害，校园里双方的广播大喇叭大喊大骂着，双方的人员相见就像斗鸡一样互相攻击，各执一词，逐渐发展走向武斗。到了1967年1月上海的一月风暴，刺激了这些学校的主流派，想使用强力手段控制局面，但是上面（中央文革、北京新市委）绝不支持他们那样做，强调还是要联合。中央两报也在竭力地呼唤大联合。3月份的时候到处纷纷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没有派别斗争的学校顺利地建立起革委会。北大、清华、师大等控制学校的主流派也强行成立了革委会，但是对立面仍然坚持地对抗着。革委会里倒也给对立面留有席位，暂时的稍微消停了一段时间，进入了夏季，激烈的战斗又爆发了，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3月中为了庆祝院革命委员成立，“东方红”号召了全校的师生员工，约有两、三千人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游行式的庆祝活动。游行的途中不断地有“东方红”的支持者，推着自行车或是

步行跟在游行队伍的后面。进入了城里之后加入了中央民委和中央民族乐团的人。令人感动的是，胡松华真实地站在天安门的金水桥前，唱起了他在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里的成名曲《赞歌》。“东方红”广播车里拉出了麦克风，胡松华在麦克风前没有伴奏的条件下，一串高亢婉转蒙古长调的引导之后，唱起了：“从草原来到天安门广场，高举金杯把赞歌唱……”立刻引起广场上、长安街上骑车人和行人注意起来。最初人们并不太相信真的是胡松华在这里唱，但是看到了的确是胡松华，又有身旁的其他人传递的信息，都停下脚步围观了起来。我想胡松华也是难得大白天在天安门，实地唱起他的最衷爱最动人的颂歌，不禁心潮澎湃；也可能是因为“三名三高”受挤兑，对“东方红”的支持使压抑突然感情释放；或许是看到群众的热情和爱戴，令他激动而感自豪。他似乎是真正发自内心，唱得无比地激动，可以感觉得出来他是特别动情而不是表演。曲终人们爆发出热烈地掌声，甚至有尖叫和欢呼。像是对大家的谢意，他回场又重复地唱了一段。这个庆祝活动别的讲话什么的，我都完全忘记了，唯独这一幕我深深地刻在了脑海里。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人们是傻子吃饱了撑的，还是文革煽动起来的狂热，还是因为打压以后的突然的自由放松？并没有人驱赶和强迫，人们从地质学院花两个多小时步行二十多里路来到天安门。这以后在军宣队进校，庆祝毛主席发表什么“最新指示”时，也搞了游行，那好像并不怎么自愿。再后来，1969年国庆二十周年，我和我周围的人，完全没有热情报名参加去天安门的游行。

新组建的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基本上是“东方红公社”的班底，

但是三结合了解放了的院级领导，有院长高元贵，党委书记王焕。地质学院虽然是“东方红”一派独统，但是“东方红”本身也非铁板一块，仍然是派中有派，被称之为“二团”的就是一批更讲究政策，更注意策略的稳健派，以有头脑的政工干部为核心，学生也多是党员干部，这些人的主心骨就是院长高元贵，和团委书记安静中，这些政工和领导干部，确实在院革委会和“东方红”总部里，起到重要的平衡和把舵的作用。“东方红”里还有一批激进派，这是一批最初造反的人，为首的是朱成昭，而这一批人随着朱成昭垮掉，分崩离析了形成不了气候，在革委会里和“东方红”总部里都没有了席位。

地质“东方红”最开始的造反的学生头头朱成昭的垮掉，是和大多数的造反红卫兵垮掉是相一致的。朱成昭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出身，他的家庭不在北京，官职也不是很高，但是有着高干子女所共有的通性——狂妄自大，桀骜不驯。文化大革命从中学到大学最早造反的主要是这些高干子女。朱成昭后来与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头头叶向真搞到一起，更是知道了许多中央的内幕，特别是江青的一些所作所为。叶向真是叶剑英的女儿，从小在江青的身边长大，对江青是了如指掌的。朱成昭在知道了一些中央的一些不为外界所知的一些事情之后，彻底地动摇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信念。还纠集了身边的少数人，悄然地反起了中央文革。不再过问“东方红”的事情，不再参加任何的召见和会议。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最后和叶向真一起逃到了云南，由公安部派了一个副部长从云南抓了回来，送进了监狱。叶向真自然是送回家了，看管了起来。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联动”和“西纠”，基

本都是高干子女组成，也都是同样的下场，被取缔宣布为反动组织。正是那样，被请出来打鬼的钟馗，最后也是被当作恶鬼，从阎王殿里清除了出去，只能在民间打鬼。这是 1967 年初，“二月逆流”之后，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大的变化。席卷了一大批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被靠边站，挂了起来，更有不少人成了“叛徒、特务、工贼”坐了大牢。保爹保妈派的红卫兵也都成了反革命，毛泽东是否想到文化大革命是这样一个结局。打鬼打出了如此多的鬼，文化大革命将是如何收场？

院革委会的第一把手自然是学生首领，是朱成昭的继任者王大宾。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阶段，他是个默默无闻的人，既不是造反的领军人物，也没有受过任何打击和压制，只因为他出身特别贫苦，四川山区里的一个放牛娃，四乡八里唯一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的孩子，人并不机灵聪慧，而是非常刻苦用功，只顾学习连班干部都不是。为人非常坦诚老实朴素无华，寡言少语不善言辞，待人随和没有心计。他只是红卫兵的一个小卒，在系里的各战斗队联合起来的推选中，担当起一个小头目，后来全院红卫兵的大联合，又被推上了总部一级。朱成昭垮台以后，许多人更主要是干部和老师，把他怂恿着坐上了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交椅。也是被中央文革、北京新市委召见的地院第一人。成为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其他的四人是：北大“新北大公社”聂元梓、清华“井冈山兵团”蒯大富、北航“红旗兵团”韩爱晶、北师大“井冈山兵团”谭厚兰。聂元梓不是学生红卫兵，是北大哲学系的总支书记，一个半老徐娘的官太太。只因为她是被毛泽东钦

定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一署名人，这张大字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浪潮。

五个红卫兵领袖，聂元梓有着深刻背景受康生指使，写出了反对北大校长陆平的大字报，算是文化大革命造反第一人；蒯大富能说会写，清华挑头反校党委，被刘少奇工作组打成头号反革命分子；谭厚兰敢想敢干带头造学校党委反，又把矛头直指冲击了高教部，当然是没跑的反革命；韩爱晶更是愣头青，横冲直闯造反，在有国防机密的高校里，绝逃不了镇压的命运。应该说他们四人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中，拼杀出来的勇士，当之无愧的造反英雄。而唯独地院的王大宾，是在地质学院已经是造反派“东方红”掌权之后，他本身并没有造反拼杀，遭受打击镇压，是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的地位。他确实不是英雄式的人物，也不具备领导的魄力（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大小领导），他被推到高位的时候，他拒绝过，不敢担当。支持他的人表示绝对保驾，他也是很能听取别人的意见，在一些很有能力的老师和干部的辅佐下，把地质学院的管理做得很好。他自知自己的分量，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品德，从不狂妄自大，他特别尊重高元贵，要求车队一定按时用轿车接送高元贵上下班，而他自己被召见开会，只坐吉普车。他是以身作则，保持自己仍是一个学生的身份，在生活上严格律己，不像有的学校传云：“走了老爷，来了少爷”。这就是地质学院能在1967年那样混乱的年代里，仍然安定平稳的关键所在。地质学院的全体红卫兵，都保持着地质学院的优良校风。这种“吃苦耐劳，艰苦朴素”的传统影响了几代的地院人，温家宝总

理更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1967年尽管地质学院内风平浪静，井井有序，但是社会上的武斗和纷争却是愈演愈烈。七机部“515”、“516”两派武斗有打死人的，惊动京城老百姓。有的工厂因为武斗造成停产，例如纺织系统一个工厂少数派被打出工厂，裹挟了当权派跑到地质学院，地院的人出面调解才回厂。文艺团体例如北京京剧团，多数派把少数派打出团里，四处逃散，不少跑到各大学里。就是中央国家，也出现混乱情况，例如外交部激进派就在处理外交关系上造成恶劣影响。大学里的武斗最激烈的是北大、清华、人大，武斗是花样别致，简直是创新。北大学生在所控制的楼房顶上安置了大弹弓，用自行车胎绑在固定起来的铁架上，把石块和砖头弹射到对方控制的楼房。人大学生在大操场山摆开架势械斗，一方佯装退却，却在地上撒下豆子，进攻方冲过来踩在豆子上，摔得前仰后合，退到一旁的一方哈哈大笑，真是像儿戏一样。清华不愧是理工科大学，把汽车四周焊上铁板像是坦克，开在校园里高音喇叭叫喊着，耀武扬威地向对方示威，任你用砖头砸还是用棍棒打。不过大学里不管怎么胡折腾搞武斗，没有听说有重伤和死人的。大学生们绝对不那么愚蠢，毕竟头脑尚不糊涂，低头不见抬头见，打斗完毕回头还在一个食堂用餐买饭。敌人呼？同学呼？说不清楚。

武斗严重的是在北京以外的地方，例如河北、广西、云南，武斗的双方都有军队插手，表面上是武斗双方抢了军队的军械库，实际上是变相地发枪。武斗升级动用了枪炮子弹，形成割据，几乎是要发展成为内战。中央不是不知道，最初还是任其发展，不管不问。那些上

面的人心里清楚，孙猴子不论怎么折腾，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到了 1967 年 7 月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放得差不多了，该是收的时候了，中央喉舌放出了舆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八月一日那天，又是大力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接着不久中央就发出通知，要向全国各级学校派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和“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同时还要对重要工矿企业和国家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至此，文化大革命一年多的大开大放，嘎然截至。不论什么造反派、革命派，此时起，都要循规蹈矩接受管制，老老实实起来。1967 年 7 月底，首先被派进“工宣队”和“军宣队”的是清华大学。“军宣队”是 8341 部队（中央警卫师），带队的是迟群、谢静宜。这两人他们后来都是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

“军宣队”工宣队”进校以后立即宣布各项纪律，所有人员各回各的原班级和原单位。我们学校的“东方红”就有所准备了，首先他们清理了一年多来的，各种宣传材料和所谓的“文件”。院革委会也开了最后的会议，都预感着灾难即将降临了。

地质学院进驻“工宣队”和“军宣队”已是 8 月下旬了，几乎比清华晚了一个月，这时候的北京高校都进驻了宣传队，是北京市委的统一部署。后来就连中小学也派进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地质学院可能是重点户，“军宣队”是由空军政治学院选派来的，当然在政治力量上是特别加强的。带队的总指挥是空军学院的一个副政委。队员全部是年青的学院政工干部，有少数的老的有系主任，甚至将军级别的，但只是普通队员，据说也是靠边站，跟着来受教育的。“工

宣队”是公安部一个制作警具手铐什么的小厂，队员里连车间主任的级别都没有，都是工人，队长只是一个稍老的木工师傅，说话磕磕巴巴，语句不清，文化程度很低。所谓“工宣队”宣传不了什么，只是陪绑。而“军宣队”是真正的全面接管权力的统治者，什么毛泽东思想宣传？瞎扯！就是实行军管，就是要挥舞大棒，整治！所有这一切又是来自最高指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宣传队进校以后，开始似乎按兵不动，没有多少动静，实际上是在调查情况，摸排排队，组织力量。党员又重新被启动，当然那些曾为“东方红”竭力效劳的除外。我回忆宣传队来校之后，所采取的的行动，大致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调查情况，座谈访问，摸底排队，组织基本的依靠对象。第二阶段就是查文化大革命中每人的态度表现，自我交代，背靠背揭发，把文化大革命时，有反动言论和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分子挖出来。第三阶段是清理阶级队伍，内查外调，上查三代，下查所有社会关系，把混入革命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来。第四阶段是“斗私批修”，自我剖析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检查自己对党对毛主席的忠诚度，灵魂深处闹革命。而清查和清理中并没有把揪斗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冲击、造反、砸烂党委当作问题；甚至是对打、砸、抢，等恶劣的暴行不追查、不追究；对制造混乱，浑水摸鱼的“造反”根本不管不问，不理睬。看来还是以保护文化大革命为中心任务，防止这些知识分子、文化人的干扰和破坏。这个宣传队绝对是，坚持执行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既定方针。只不过是改变了方式方法，不是再依靠造反学生，推动文化

大革命，而是动用军队保证文化大革命的进行。要从疾风暴雨的运动，转化为深入细致地推进“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的使命，完成“防修反修”的大业。

这个由军队政治学院基层政工干部组成的宣传队，实际是工作队，确实有一套整人治人的办法，把管军人的那一套来对付知识分子们。他们分别地找每一个人谈话，让你谈自己也谈别人，他们分析捋顺人物间的关系，再定性小集团，背靠背揭发，挖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言论。使多年的老朋友老同学反目，甚至使夫妻分裂。达到挖出反文革、反群众运动分子，找到批判的对象。他们把学生和老师混合编班一起学习，利用学生去整治老师，因为学生大部分是出身好，阶级立场鲜明，动员学生帮助老师挖阶级根源，批判老师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强调突出政治，政治挂帅，大力批判只抓业务不问政治的修正主义倾向（这些林彪的忠实门徒，正是在部队里大搞批判“军事挂帅”而兴起的少壮派）。

这些宣传队们，也是推行林彪形式主义的急先锋。除了每天必须进行的程式，早请示晚汇报，朗读语录，背诵“老三篇”之外，还要每人表达忠心，绣忠字旗幅，做忠字礼品。另外在办公室里，教室里贴满了，挂满了“四个伟大”（伟大领袖 伟大导师 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三忠于”“四无限”的标语口号，（永远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崇拜、热爱、信仰、忠诚）；还有“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长条

横幅。把广场上、马路上的文革政治气氛，全部都转移到了室内，让你一抬头，就映入眼帘里。

从1967年9月到1968年底，军宣队把学校老师和干部们折腾个够，已经再没有什么花样了。学生除了69、70两届的还留在了学校，毕业打发了三届的学生。1969年新学年之后，部分专业课教师带着69、70的学生，组成教改小分队出野外、下矿山，进行现场教学。各教改小分队还跟随的有“军宣队”“工宣队”的人员，他们实际的体验了一下地质工作的野外生活。年轻的宣传队员们，在野外跑不过五十多岁的老教授。下矿井、下机台，干着劳累的生产作业，带实习的老师，还要频频地照顾他们。这些跟着野外教学的宣传队员，亲身经历了地质、矿山的艰辛和劳累，改变了对地质学院知识分子的看法。地质学院的教师不是象牙宝塔里的贵族。

1969年“军宣队”“工宣队”都撤走了不少人，从上面传下来的指示：高等学校、研究单位、部分中央机关，都要外迁搬离北京，学院、地质部联合派人出去选址。同时还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教师干部职工们要到“五七干校”，参加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我们系外加部分勘探系的教师干部自组勘探队，带领未毕业的学生，钻探找矿。地质学院的全部教职员，1969年底就被分配、调遣，各自准备奔赴所划定的去向。我是被圈定去干校的，为备战疏散，动员了全家一起走，不留下任何物品，全部带走离开北京。全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还在“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而地质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却是告一段落。当然，学校迁出北京，去干校接受教育，

自办勘探队，都是在贯彻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战略。地质学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仍在进行中。

我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

反右运动以后，我曾立下决心远离政治，任何政治运动绝不冲锋陷阵，不入党，不做积极分子，在政治洪流里随大流。然而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却鬼使神差地卷入到漩涡里，违背了自己的信念，致使我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遗憾，还惹出来了一些麻烦。但是我也不觉得有莫大的愧疚，我自认为也没有做了多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是觉得做了一些无意义的事，真不如闲呆着，还觉得有一点上当的感觉。我是怎样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呢？也是从随大流开始的。

1966年8月后，地质学院里成了“地质东方红”的一统天下，学校里已经风平浪静，大批的学生走出校园，在市里到处煽风点火的去点火，去外地革命串连的去串连，学校里基本上是空巢。文化大革命中各学校的特点之一，就是播音大喇叭喊叫不停，煽火着气氛，张扬着声势。我们系里的一个我很熟的学生政治辅导员，他在“东方红”总部，一次见到我对我说：“你到广播台去帮一下忙，编审一下稿件，现在学生都走了，不能没有广播的声音，每天用不了多少时间，早中晚把广播响起来就行了”。我到了广播台一看，编辑、播音、机务全都是教师和干部，全面替代了在广播台里的学生。我们在那里确实事情不多，基本不需要自己写稿，只是把“东方红”学生送来的通讯稿，编辑修改，有时候需要誊写一下，便于播音人员好认识。多数的情况是广播通知，或者是转播电台的新闻、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文章。老师们到广播台值班以后，大喇叭里没有了激烈的战斗的檄文，也没有了声嘶力竭的口号呐喊，不像学生红卫兵那样，充满了战斗的火药味。

我们做到的也就是让校园里不能沉默无声，要有一些革命的气氛。做到这一点也倒并不难，到时候打开广播机就行了。有广播稿就播广播稿，没有稿件就转播广播电台的声音，哪怕就是放放革命歌曲，也可以了。

我在广播台也就一共待了三个多月，直到1967年的春节过后，广播台里的学生们都陆续回来了，我们就没有必要继续留在广播台，都回到我们原来的系和科室了。在广播台的日子里，基本上是起着一个看守值班的作用，我自认为没有直接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没有成为舆论宣传的狂热吹鼓手。而这以后所发生的事，我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作为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回到教研室后不久，“东方红”负责宣传的学生头头直接找到我说：“中央文革和新北京市委，决定五大院校的红卫兵小报，可以公开对外发行，专门供应我们新闻纸，在大报社里排版印刷。我们要重组编辑部，加强《东方红报》力量。原来编辑部都是学生，现在需要一些老师进去，保证小报的质量，也请老师们帮助把关，不要出现重大原则性的错误，请您也能参加帮助一下。”学生说得很客气也很诚恳，我也推辞了一下，说我也没有搞过报纸怕胜任不了。他劝说我没有关系，说学生们更没有搞过，不也搞出了几期了吗？大家一起动手慢慢就行了。真是盛情难却，我也就勉强答应，试试看吧。这一试就是真真切切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狂潮里了。

我后来检讨自己，虽然我不愿意卷入政治，但是我看到那么多人在文革开始时受打击，被镇压，我也非常压抑，突然的形势翻个，也

有被解放的感觉，象是获得了自由的心情，压抑的情绪有了舒缓和释放，自然对文化大革命抱有参与的热情。这不是政治的狂热，而是错误地认为，今后不再会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一定是自由解放的世界。因此怀着感恩的激情，所以心甘情愿地为文化大革命而献身。

大约是1967年的3月底，新扩大的《东方红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议，来了约有二十人，学生和教师干部各占有一半。学生原来有四、五人，又增加了一些新人，多是涌现出来的写大字报的好枪手，教师和干部分别来自政治教研室、党委宣传部、和各系，当然都是笔头过硬的“笔杆子”。“东方红”总部负责宣传的学生头头聂树人是会议的召集人，他先介绍了一些情况，《东方红报》已经出了五期，前两期是油印的，从第三期改成铅印，在学校的印刷厂印的，从第六期起我们将要到正规大报印刷厂印刷，固定印刷日期，每周两次，要保证按时出版，不能延误。现在我们有这么多人需要分成两班，每周各负责一期编辑出版。他希望老师们能帮助把好关，不能出现任何大问题。我们和其他四家，清华、北大、师大、北航都是一样的，不要落后于人家。他讲完了，我提出意见，编辑部仍然是学生负责，到上面开会，对外交涉和联络，还是学生们去出面。这个意见得到所有教师和干部的一致同意，学生们也没有异议。我们还表示了，可以每天都来编辑部，按时上下班，至少来看一看有什么事，学生的编辑们除了负责人不受这个限制。就这样我就算正式的参与了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制造工作。

《东方红报》被安排在《前进报》排版印刷，《前进报》原是报

人王芸五的《大公报》，和香港《大公报》同属一个老板。大陆不许私人办报，1956年以后改成名义上是全国工商联主办的《前进报》，文革开始后就停办了，文革后复刊改称《经济日报》。这里安排了三个学校，除了我们还有清华和北航，从星期一到星期六，每个晚上都排满了。

发稿排版的当天晚上，责任编辑在校吃完晚饭，七点多钟骑车赶往报社。报社在城里和平门外虎坊桥，骑车过去大约一个小时，八点多到了报社，把要发稿的稿件和板样交给检字排版师傅。我们去的三、四人当时就在那里，完成一校、二校，直到正式的报纸大样出来校对完毕。这中间报社的专职校对，还要负责校对两次。出来的报纸是和正规报纸完全一样，不会出现文字和标点符号任何一点错误。我们在大样上签完字，全部工作就算完成，此时已是午夜零点多了。夜深人静可以飞快地骑车回到学校。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印好的报，去车拉回学校。

负责发行的也是一大堆人，基本上都是院机关的人，除了校内要留一些分发各单位和各班级外，其余的都要销售出去。一小部分报纸组织机关人员包卷，交邮局寄给订户，和图书馆等有关单位。其余所有报纸组织学生到市区街头叫卖零售。价格相当于一份晚报的价钱，我记得是5分钱。那时《北京晚报》也停刊了，红卫兵小报很好卖，学生带出去的报纸很快就卖光了。从成本来看我们每次印两万份一点也不亏，除了纸张钱和印刷费，没有其他开支，所有的人力费用都是无偿的。发行组收回来的钱，直接交到院财务科。

《东方红报》从1967年4月正规印刷出版，到8月份“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共四个多月，出版发行了50余期，被勒令停止，寿终正寝。所有的红卫兵小报都销声匿迹，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北京的五大红卫兵小报，为什么能批准正规印刷发行？还特别供应新闻纸。到底红卫兵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第一、红卫兵小报对文化大革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红卫兵小报随着学生红卫兵造反起家，首先是控诉和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控诉刘少奇工作组的残酷斗争，揭露原北京市委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进而是矛头对准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否定十七年来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小报和大报遥相呼应，把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

第二、红卫兵小报能够传递不能公开的信息。中央文革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召集红卫兵头头一些讲话，或是传达某些精神，不便于公布，那么就可以通过红卫兵小报透露出来。这些上级领导调节红卫兵派别间的矛盾，申斥某些红卫兵组织的过激行为，暗授某些机密行动，也可以从红卫兵小报给出一鳞片爪的信息。更有甚者中央文革里的某些关键人物例如康生，讲出的某些“经典”观点，表示了他们核心理念，这些都渗透到红卫兵小报字里行间。康生讲，革命不是目的，是手段，无产阶级要达到消灭剥削、消灭阶级的目的，就是通过革命的手段。民主、自由也不是目的，只是口号，用这个口号来鼓动革命，也是手段。康生还说过，无产阶级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不能捆住自

己的手脚，无产阶级要达到最终目的，要不断改变自己的方针，修订自己的策略，甚至不惜废除自己早先制定的政策。康生把这些理论讲给红卫兵头头，再传达到这些办报的人，目的无非是向小报编辑们灌输极“左”的思想，为文化大革命可以随意践踏宪法，践踏民主寻找理论根据，贯彻到红卫兵报的宣传里。

第三、红卫兵小报是鼓吹个人崇拜和造神行动的最好帮手。文化大革命中鼓吹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神话毛泽东，是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动力，也是文化大革命宣传的核心内容。当然这些主要是靠林彪及中央文革等人的讲话，中央宣传工具的大造舆论。但是也同时依靠充斥街头的红卫兵小报，大力地帮腔鼓噪。红卫兵小报最先喊出，毛泽东是世界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小报不论怎么过头的言论，也是那些造神行动的幕后者，愿意看到的，为造神运动添砖加瓦。这种鼓噪看似荒唐无聊，实际上也是文化大革命火热气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喜欢看到人们对他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更喜欢的是，把他当作是伟大的神，当作当今唯一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领袖。红卫兵小报所起的作用是公开宣传所不便于做的，因而功不可没。

第四、红卫兵小报是红卫兵动态的风向标。通过红卫兵小报的窗口可以洞悉红卫兵的动态，红卫兵的倾向，在红卫兵的报纸里可以观察到的红卫兵思想和情绪，上面那些决策者就可以摸到红卫兵的脉络。我认为他们不怕你谩骂闹翻天，如果走向冷静和理智那倒是可怕的。例如，1967年的夏季红卫兵小报已经不注意斗、批、改

的宣传报道，热衷于宣传全国一些地区的血腥武斗。宣传动乱，宣传丑恶，隐蔽地反映着青年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夏季以后红卫兵小报愈来愈表现得没有生气和活力，反映着青年学生对文化大革命的厌烦和理智。我觉得这些正是促进了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派出“军宣队”、“工宣队”，终止了红卫兵的时代。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红卫兵小报也随之结束了它的命运。

我亲身经历了将近五个月的“东方红报”的编辑工作，深切的体会到了上述的四点，红卫兵小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也愈来愈觉得《红卫兵报》是被利用，自己已经是很深地卷进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我仔细地盘点了一下自己的所作所为，确实感到了是为虎作伥，干了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并不是被迫，而是心甘情愿的做了，不能不说是被愚弄和上当受骗。那时候虽然感觉到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不正常，但是也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祸害与灾难。我反思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那样，像一个忠实的卫道者去摇旗呐喊？我既不是思想单纯的小孩子，也不是想拼命向上爬的投机分子，更不是极“左”思想坚定的维护、执行者。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干的那么起劲，除了开始时的一点感恩激情，我觉得还有可能有某种深层的动机，就是隐约地不自觉地干着一点“做游戏”和“搅屎棍”的恶作剧。

大部分做编辑的学生、教师和干部，应该说都是一些有头脑有思想的人，他们最初对红卫兵报的热情是好玩，轰轰烈烈尽情的发泄，顺着文化大革命领导者们的口吻，呐喊狂呼，时间长了自然厌烦泄气。

红卫兵小报在后期，愈来愈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的愿望相反，不是在做文化大革命的舆论工具，是帮倒忙搅浑水，让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们，感到红卫兵和红卫兵小报不能得心应手，而是麻烦不断，不听指挥。于是这些决策者们看到了，红卫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若再利用下去，不但不能起到他们所想的好作用，反而会成绊脚石。当然对红卫兵和红卫兵小报采取了断然的措施。

我认真地想了想，《东方红报》以及我到底都做了哪些“做游戏”和“搅屎棍”的事情呢？大概有以下这些：我主持了《东方红报》很有特色的杂文小栏目。除了讽刺和挖苦一些“走资派”的官僚作风外，更多的是派性的暗斗和讽刺。讽刺聂元梓是燕园里的老佛爷，发号施令独断专行，不能容下一起揭竿造反的兄弟们；讽刺蒯大富是忘恩负义的愧大，忘了自己曾经受压逃到地院，寻求支持的狼狈境遇；讽刺那些造反英雄，有枣没枣三竿子乱打乱反，矛头指向“三名三高”，是农民狭隘平均主义；调侃“校园里的游戏”，讽刺北大、清华等学校里的武斗。我们曾在小报上大骂“苏修混蛋”，强烈抗议苏联警察在莫斯科红场，殴打中国留学生，撕毁留学生们手中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后来我们被《人民日报》报道，遭到中央领导人严厉批评。

《东方红报》在后来的各期连续刊载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这篇学生们编写的大事记，如实地记载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发生的每一件事，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事件的过程。从批判《海瑞罢官》，打倒“三家村”开始，继而是揭开“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北京市委的盖子；再而是北大的“第一篇大字报”，刘邓的镇压革命的反动

路线；然后是翻盘，刘少奇被打倒，成立红卫兵组织，掀起“造反”高潮；社会上“破四旧立新风”，揪斗走资派；毛泽东七次接见红卫兵，学生全国革命大串联；以后是上海“一月风暴”；中央的“二月逆流”；全国各省市大夺权，祖国山河一片红……等等。《大事记》也记述着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一批批地被打倒和揪斗，最初是北京市委彭真、吴晗、刘仁，文化大革命大规模开始是国家和党的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继而是几个副总理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后来又是刚调到中央就被打倒的陶铸、陶鲁笏，再就是一大批叛徒刘澜涛、薄一波、安子文、……。军队里最先揪出的是“土匪”出身的贺龙，军事压倒政治的教条主义分子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然后又是打倒军队中主管政治工作的肖华、刘志坚（还是参与写出《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纪要》的主角），然后又是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到了1967年7月江青身边的御用文人王力、关峰、戚本禹，也当作变色龙、小爬虫被揪了出来。《大事记里》还记录了一批没有公开点名的很有影响的人物，受到革命群众的批斗，有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陈毅、谭震林等，甚至是涉及到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受到军事院校革命派的大字报批判。《大事记》里也记述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四旧”破坏文物、古迹、庙宇、古建等的恶劣行径，《大事记》也揭出了社会上的打、砸、抢的罪恶。那末这个“大事记”是对文化大革命胜利的歌颂呢？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记述，从而揭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和混乱？难道这不是“搅屎棍”吗？在后来清查“516”分子的时候，那些积极分子们没有一个人指出《东

方红报》这个“罪行”，实际上他们也不敢指出这个“罪行”。

还有，《东方红报》连篇累牍地报道过各地的武斗，更是发表过长篇报道广西、湖南，四川武斗的残酷和激烈。提供报道的都是专业记者，报道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人们看热闹，看到混乱的局面。另外还在还在一些文稿里透露着河北、山东、云南等地动用枪械的武斗。能说这不是明明白白的给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抹黑吗？这么说《东方红报》和其他的红卫兵小报，起着“搅屎棍”作用一点也不假。可以看得出来，决策人当初设想的发动群众，特别是让青年人来推动狂热，必须改弦易辙了，否则就会走向反面。以上都是我很久以来，对红卫兵和红卫兵小报的反思得出的看法。我们虽说是干了一些与文革领导者的愿望相反的负面效应，但是我主观上没有任何“韬晦之计”，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胆略。事实上是起了“做游戏”“搅屎棍”的效应，的确与那些年轻人也包括我们一些老师，没有了热情，想着赶紧退场的情绪有关，与主张办红卫兵小报的初衷，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文化大革命搞到那样一个局面，不能不使一些有头脑的人，通过各种隐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一些情绪。

我在《东方报报》的后来一段时间里，还作了一件事情，花去了我大部分的时间。有一天我在编辑部里，一个同学带着外校的一个学生进来，说是有一份《毛主席诗词注释》的手稿，问我能否帮助印刷出版，我问到那位外校的同学怎么回事，他说他是师大中文系的，他们有一个编写小组，编写了公开发表的《毛主席诗词》注释，自己没有印刷出版的能力，请求我们帮助印出来。他说：“我们同学们都

信任地质东方红，委托我过来找你们，我们希望能印得好一些，你们一定能做得到。”那我说我们看一下你们的稿子，如果可以，我们一定帮忙。他把稿件留下，我仔细的看了一下，确实不错。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了很多的版本，比较了他们编写的，注释还是很细致认真。他们特别注意了，每首诗词写出来时候的时代背景，和作者此时的心绪感情。我觉得这本诗词注释写得不错，还是很值得印刷出版。于是一、两天后那个师大的同学再来的时候，我就承诺了我们可以帮助印刷出版。那时候也没有订合同一说，我们就是口头上确认了相互的责任和义务。他们负责初校和二校，我们完成三校和终校。他们提出他们要求的印数，我们给出一定数量的免费数目。我们保证最好的印刷质量，配上丰富的插页。双方同意不署校名，只写诗词编写小组，扉页上有“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印”的字样。这是一个互相高度信任的一个口头协议。

我所以愿意揽下这件事，一是后来的《东方红报》，确实也没有了多少事情，学生们已没有了开始的热情，报纸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多余品，我就也是应付差事；二是毛泽东的诗词确有很大的魅力，我对毛泽东做为诗人还是非常钦佩的，我很愿意做这件事的；三是人们一定会要这本书，这是一个热门需求。因为这些，我还真是不遗余力地跑成了这件事情。

我先是找好了排版印刷的厂子，选好了新华印刷厂二厂，稿件直接让师大的同学送去，他们正好就地去负责清样的校对。然后就跑新华图片社，选择毛主席的有关照片，诗词手稿的影印件。诗词中一些

相关的风景照片，再联系了美术出版社印刷厂，制版印刷了采色照片的插页，又联系了外文印刷厂黑白照片插页的印刷。还联系了北京商标印刷厂印制了烫金的塑料封皮。全部印好我仔细的校勘了一遍，由印刷厂推荐跑到河北燕郊，在一个乡镇装订厂确定了《诗词注释》的装订工作。装订的样书出来以后，认真地做了检查，真是非常满意，也难怪各个单位都是当作一类图书下达任务，保证了各个环节没有一点差错。因为我打着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名义，又因为这是印的《毛主席诗词注释》，一路绿灯通行无阻，从确定到出书大约花了不到两个月，就全部完成了。我也向师大的同学兑现了全部诺言，都是皆大欢喜。我已经记不得印了几万册书，很快就全部销售一空，连留下的几十本样书也都被被人要走了。

印刷《毛泽东诗词注释》这件事完成之后，不久“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开始了整顿和全面接管学校的工作，组织学习、清理思想、清理阶级队伍。当那些宣传队员们看到我们所印的《毛主席诗词注释》，想索要和购买时问到我们，我们说一本也没有了。他们问到能否再印，我说还要从新联系，只要原版还保留就可以。我又得到特别恩准去专门做这件事情，我可以不完全参加教研室的学习，有事去办打个招呼就行了。又是跑了几个月，这不像先前了，我有学生帮手，现在干什么事到需要自己亲自去干。不但这样，还给我派了一个跟班的，名义上是帮我的忙，实际上是监护者我，就连去财务科开支票，办公室开介绍都要自己办理，他真是跟着我给我拎包。以前到各印刷

单位凭着“东方红公社”的介绍信办事很顺，现在拿着院革委会

的介绍信，倒是官腔十足，办事并不痛快。这次我又只印了几千本，反而拖了三个多月，当然人家嫌印得太少，所以不爱搭理，我无权决定印数，只能央求说好话，人家才接受订单。到了第二年的春天，才印刷装订出来，印出来的我全部交给了工、军宣队算是完成了任务。这件事干得非常憋气，真是不痛快，费了很大力气完成了，没有落了一声好。我象是在被管制下，带着“镣铐”去干完这件事的。

我就是这样卷入了文化大革命，主观上并不想出风头，也没有想捞到什么好处，但还是做了一个文革中的积极行动者。然而我也不后悔，我毕竟看到很多东西，也学到了不少的东西；领悟了一些事情，也认清了这个中国的现实。我没有什么愧疚，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不欠下什么债孽。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无形比有形更多，我们所失去的最好时光是无法弥补的。由此而牵连的后来的清查什么“516”，更是冤枉之极，滑稽之极。这积累起来的怨恨，不能不全都发在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我无法高呼“伟大！正确！”。后来心境虽是平息了下来，但是一回想起来那些，心灵不免还是被针扎似的刺痛。

老九，都需要上“五七干校”

文化大革命时候，社会上把知识分子贬称做“老九”，起因于对原来打倒和批判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之后，文化大革命中又增加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共八种人。人们于是又把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为第九，这就是“老九”的来历。这是文革中民间的流传，官方正式书面的文字里没有这样的称呼，而社会上谁都知道“老九”的涵义。因为极“左”思潮对知识的轻视，对人才的不尊重，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靠边站。因此也就不分什么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就统称“老九”。其实，这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调侃和自嘲。

1969年秋，学校里已经没有了学生，教师、干部、职员们都无事可干了，不能总是学习批判，闲呆着。这时候中央和地方机关单位也是精简机构，编余了大批的干部，还挂起来不少的领导干部，为安置这些人，各单位都办起了“五七干校”。高等学校和各事业单位也立即效法，办起干校。

“五七干校”是遵循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起名办起的。1966年5月7日的，毛泽东批转林彪关于军队办农场的报告，做出一个指示。毛批示说，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他还说，学生要学军、学工、学农。……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劳动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毛总在琢磨怎样一个办法，让知识分子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参加体力劳动，否则“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毛

认为当官的应该轮流到的农村去，不能总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工农，这样势必产生特权地位，走向腐化堕落。毛泽东警告，要防止苏联修正主义的重演。

1968年，黑龙江省革委会，发表整改经验，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精神，把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办了一个农场，定名叫“五七干校”，既教育了干部，让干部劳动锻炼，有安置了精简下来的闲置人员。这个经验让毛泽东如获至宝，毛正愁如何实现他的“反修防修”的设想，让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都能到农村去接受教育。黑龙江这个办法真是两全其美，既能够让干部下放去学农，接受教育，又能够大批集中实行军事化管理。于是让报纸、广播宣传、推荐，又发表评论，责令各地、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办“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和干部们要轮流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

1968年初至1969年末，北京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都办起了“五七干校”，开始时只是要受教育的本人去干校，目的只是单纯地进干校去学习锻炼。到后来中苏之间形势发生骤变，因为战备的要求，去干校凡是能举家全去的，不管夫妻双方是否是同一个单位，家属是否是在职职工，都一律同去。这时候正好中苏边境发生了两次战斗，据传林彪下达了一个一号命令：准备打仗，疏散人口。所有的干校都选在南方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正是表现了这个意图。人们忧心忡忡，害怕真的打起仗来，不愿全家分开。都很自愿自觉地拖家带口到干校去。一切能带的东西都带上了，一些家连蜂窝煤都舍不得扔掉带上了。

这哪里是去干校学习，简直就是举家逃难。

我们的干校选在江西峡江县，赣江之畔，倒是一个环境很不错的山青水秀的丘陵山区。原是当地的一个农业学校，有不少的校舍，但绝容不下几百个家庭的安置。凡是有老有小的家庭，都安排住在附近村子里农户的家里。干校里的组织按连队编制，我们探工系和机关党政干部，加上数学教研室编成了一个连。一到干校的首要任务就是盖房子，解决房子不够住的问题。来到干校时正是十二月份，江西还不算很冷，大家一起凑合着挤着，有几个连队的家属住在了离干校很远的农村里，不必来干校参加劳动，但是要二丁抽一，一人须住在上面参加劳动。住在上面校部的，夫妻或孩子大的，分别集体住在男女大宿舍里。我的家和戴学恕的家就在离校部不远的村子里，我和爱人徐宏勤轮流到校部，我是参加劳动，徐宏勤在自办的小学里教孩子。

我们连因为主要是探工系的，以从工为主，为盖房和修路凿岩放炮，开山炸石；打铁电焊，车床、刨床加工，抽水发电；我们还有人破竹修篾，带领体弱女同志编筐编箩，为装石，装土，装粮制作工具。传云某处有煤，还被派去开凿竖井，挖矿采煤。自造的辘轳提升渣石，当然也就挖了二十米不到，也花不起支护费用，只能作罢。这也是带队的军宣队的主意，但是再蛮干下去，他也怕出危险担当不起责任，停止了异想天开。还有一件更是天方夜谭的事，干校就一台破车床、小刨床和台钻，军宣队要我们敢想敢干，破除迷信，自己造拖拉机。干机工的几个老师不得已，提出了增添设备的要求，当然无法做到，也就不了了之。

过了冬，春耕开始了，比较年轻的教师干部抽调出来学习开拖拉机，一部分人跟着农民，学习催芽育秧，在小块田上用牛犁田、耙田。较大的田块用拖拉机犁田、耙田。要插秧的田地放进水，平整田地，准备插秧。插秧时能劳动的人都一齐上阵，起秧，运秧、插秧，我们倒是不用起早贪黑，人多力量大，很快就完成了插秧任务。尽管大多数人都没有干过多少农活，尤其是水田种稻的活，但毕竟是简单劳动，知识分子们一看也就能跟着会干了。毛泽东非要知识分子和干部下到农村劳动，是否就是要这些人经历吃苦受累，劳其筋骨，达到锻炼改造的目的，这样就能防修正主义，防资本主义复辟，防止腐化堕落？但是，这样的多的人集体劳动干上那么一点点，谈不上什么吃苦，比起教学科研的脑力劳动，倒是轻松愉快的多。尤其是对这些学地质搞地质人，这点苦简直算不得什么。而我们心里真苦，苦的是我们学不能所用，在这里荒废时光，浪费人力。

当时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是开开会老一套的学“老三篇”，读《语录》，隔三差五地把文化大革命中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和戴着各种帽子的“牛鬼蛇神”批斗一下。这里名其为学校，实质上是劳动改造场所。我们同一个连的党政机关和政治教研室的人，他们倒满不在乎，对这些都无所谓，没管它是什么劳动还是学习。在小组会上他们也不过多的官话套话，会下平常更是调侃穷逗，毫无正经，和那些刚在会上遭批判的人，也谈笑风生，若无其事。过去我和他们没有什么直接接触，对政工干部多是敬而远之。现在较多的接触，发觉他们的政治敏感性确实比我们强，他们对当时对政治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

只是不表露出来，比我们更有心计。我们探工系的人学工的头脑还稍活泛一点，数学教研室的人却是死轴，批判起来真是认真，平时会下对那些所谓有问题的人，也绝对不苟言笑。有一个女老师，后来还是知名教授，并且做了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就因为说话耿直，家庭出身是旧政府高官，文革中自然会受到冲击，可是我们那些并不极“左”的政工干部（极“左”的不会被发到干校），对她从不另眼看待，还常常直呼其名。我以前认为搞政工的都左，这是很片面的，只是那些爱整人的，他们惯于迎风。现在才感到真正的政治工作者，确是有政治头脑的，特别那些教政治理论课的更是这样。

我们在干校还有一个重大的劳动任务就是砍柴，食堂每天供应一千多口人的三顿饭，用大灶烧掉的就是几千斤的柴火。一个星期有一天是砍柴日，各连队全体动员上山砍柴，每个人的砍刀都是自备的，砍柴头天都磨好柴刀，第二天吃完早饭，就拉上板车集体出发上山砍柴。最初砍柴还在干校附近的山上，后来越砍越远，不到一年，砍柴就深入到十几里远的深山里。我们砍的柴不是小灌木的毛柴，因为要塞入到大灶膛里，细柴草轰燃一下就没有了，柴火都是杯口粗细的小树，砍过以后向前推移，砍过之处就象剃头一样光秃一片。老倌（江西独有的对老乡的称呼）烧柴都是细小灌木或修枝砍下的树枝。而我们砍柴对野生林木除大树外一律砍尽，现在看绝对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那个时候为了政治需求，即使是造成荒山秃岭，给农民的家园造成破坏也是在所不惜。1964年我去到湖南江西交界的大山里的一个地质队，看到山上满是粗大树木的树桩，为了大炼钢铁土法炼钢，把

上百年的林木砍倒烧炭。这样的破坏有谁来管呢？为防修改造干部知识分子，烧一些次生山林又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我们种两季稻，早稻插下以后，田间管理用不了多少人，大部分人还是忙于盖房和修路，盖房用的木料运到了江边码头，我们百多名体力较强的男性学员两人一组，把松树原木接力扛运到干校，大约十公里路程，上百根的木料完全是人力搬运了回来。很快原木打柁上梁，钉板挂瓦，房子抢在了雨季前封顶。一条大约三、四公里的连接干校另一个聚集点的石基路，也在雨季前基本上铺好，可以通行汽车了。我们还进行了一项大的基本建设，就是通电工程。我们从十几公里外的高压电网上，引入高压电。原来靠自行发电电力就不足，又盖起了很多宿舍，根本解决不了照明问题。没有电力线路，必须我们自己栽杆架线，在县电业局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翻山越岭抬着几百斤的水泥电杆，分别埋设在线路上，固定好担铁瓷珠以后，再大家通力合作，把电线拉架到电杆上。十公里不到的直线距离，二十几根杆子折腾了我们一个星期，真是把我们累坏了。这还是 660 伏最低的三相高压线（也就是最细的线），可见在崇山峻岭架设几万伏到几十万伏的，上千公里的超高压线，该是多么困难的。电力建设的工人们和工程技术人员，艰苦的风餐露宿的野外工作条件，逢山攀登逢水跨越，不断延伸的幸劳作业，一点也不比地质勘探工作者差。为什么小农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只认为农民辛苦，各行各业都有辛苦的地方。其实农民辛苦的不是劳动，而是农民的生存空间被挤轧的养活不了自己，中国农民可怜的一点耕地，还要接纳下放干部和知识分子，还要安置城市里的

知识青年，甚至城市里的无业人员。大锅饭的集体劳动，挣下的一点工分，连买口粮钱都支付不了。下放到农村的人所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是看不到前途，看不到希望。看到的是农民的苦难，农民生活的艰辛。

春天三、四月的时候，干校所在的那个小山坳里，简直是美极了，山丘是郁郁葱葱的松树和灌木丛，漫山遍野的杜鹃花，把一片一片的山坡映红，称谓映山红，夹杂着百色的栀子花，走进了山林香气袭人，沁入肺腑。我们干校的前面流淌着一条清澈的小河，春天的雨量充沛，跌宕处哗哗地流水声，发出悦耳的歌唱。小河蜿蜒曲折，转折处形成一个一个小水潭，小河两岸和水潭周围是青翠的水竹，和荆棘丛生的灌木，组成了屏障，这成了我们天然的浴场。这里有好几个小潭，最前面是一个男浴区，中间一个较大的水潭辟为女浴区，再后又是一个男区，前后保护了女浴区，不使外人进入。每天劳动之后，小河水里传出欢声笑语，大人人们的谈天说唱，孩子们的嬉戏欢叫，伴随着牛群归家的哞叫，远处拖拉机的轰鸣，衬着落日的晚霞，寂静的山坳里演奏着美妙和谐的田园交响乐。

凭心说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如果没有烦心的政治斗争，没有假话空话的学习讨论，这样的生活岂不是神仙般的日子。拿着全额的工资，带着家眷，从城市里躲避到这里休养来了。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毛泽东也未曾想到的，本来要我们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达到脱胎换骨的锻炼。结果是在这里享了福。什么锻炼改造，是使用国家和人民的钱，浪费折腾，上下一齐糊弄，做一点欺世盗名的花架子。

其实我们在这里真没有吃多少苦，倒是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享受大自然之乐。但是我们并没有心旷神怡的心情。没有谁来唸这个好，没有人感激这种“幸福”，没有人打心里愿意接受这些。这是在浪费国家的财富，浪费人民的血汗，也是浪费我们自己的生命，浪费宝贵的时间。

北大和清华的干校也在江西，在鄱阳湖边上的鲤鱼洲，他们可没有我们幸运，那里没有山清水秀，没有花香松涛。湖泊平原炎热潮湿不说，最糟糕的是水里有血吸虫，两校的教师干部，得上了血吸虫病的人真不少，而且是终身难愈的。这更是对人才的摧残，这样的锻炼和改造，不是把人往死里送？这个帐算到谁的头上？

我在种菜班上种了一时期的菜，我们种菜当然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也要种一点，大约有二十多畦。种菜作业主要是浇水和施肥。我从来没有挑过担子，种菜每天都需要挑水和挑粪，我一点一点地练习着挑担子，开始肩肿胳膊酸，慢慢地练得适应了，满满的两桶水，也可以挑着走几百米。我们天天都要从厕所大粪坑里舀粪，走在田埂小路上，把粪挑到菜地。然后又从小河里挑水，粪桶里兑上水泼向菜地，泼粪时有时迎着风向，弄得满脸粪水甚至溅到嘴里，粪水不仅臭味难当，还又苦又咸简直不是滋味。开始时恶心的不得了，时间一长，也没觉得脏了，也许这就算是被改造过来了。的确就是为了改造，收获的一点菜送到食堂，也只能是一点搭配，食堂的做菜基本还是靠买来的。种菜也倒没有觉得什么苦累，我们地质学院的知识分子没有多少娇气，干什么也不怵头，没有干不了的。原本改造就是带有惩罚的

含义，偏偏这些人满不在乎，对这些人又能改造些什么呢？

七月份早稻成熟开镰收割，一方面要抢收，抓紧脱粒、晒干、风选，然后装袋过秤入库；另一方面要抢种，赶紧翻土犁田、放水耙平，把晚稻秧苗及时插到田里。这就是最忙的双枪季节。这时候真是不分白天黑夜，在田地上、在打谷场里忙收忙种。连队组织女同志不时向作业地点送水，送绿豆汤，食堂也加餐做夜宵，供应干活的劳力。南方此时正是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天的紧张战斗，全仗着在小河里洗浴汗水，驱散热气，解除疲劳。这时候劳动之余，在小河里清凉的水里一泡，才感到无比地放松和惬意。黑夜还需要打着手电筒，拿着棍子打草惊蛇，到小河里去洗澡。一个月下来，人们一个一个皮肤黝黑发亮，超过当地农民，南方农民干活并不赤背光膀子，这是北方人的习惯，农民们看到也感到新鲜。我们和当地农民鲜明的对比，一眼就区别开来了。

双抢最忙碌的时候，接到北京徐宏勤家里来的电报，说她母亲摔了，腿部骨折住院，他赶紧请假带着两个孩子回京，我也请了一天假，坐船到樟树，把他们送上了火车。我应该跟着送到上海，再转车到北京，但是正是大忙时节，没有办法只好托上海的同学帮忙买票专车。她到了北京照顾了妈妈病情好转，原本说好了再回到干校，这时候她看到北京许多单位，正在大抓“516”，她一想我一定不会脱掉干系，决定不再回来了。回到他们学校和校长一说，就留下回学校上班了。

幸亏她这样决定了，果真是那样。9月份之后，干校开始了声势浩大的清查“516”分子的运动，成了干校的中心工作。我自然是重

点被清查的对象，《东方红报》编辑的身份，被当作是“516”，那是绝对没跑的。我也预感到灾难的来临，在清查到我头上之前，我赶紧利用了一个星期天，把徐宏勤和孩子们的东西，托运回到北京。不久以后，我也就失去了自由，被所谓的隔离审查，实际上就是被看管了起来，没完没了地责令写材料，交待问题。在我之前已经拿下了好几个重点的“516”分子了。

1970年前多半年，先是忙于基本建设，又是忙于农业生产，直到秋收大忙之后，干校的中心工作就是清查“516”，几乎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到1971年10月都是搞的这项政治斗争。那真是战果累累，地质学院的教师干部三分之一的人，被抓成“516”。1971年没有了基本建设，农业生产也已是轻车熟路，所以那些执行上级命令者，就全力以赴地抓“516”。越抓越多，抓人的那些人不少自己最后也成了“516”。我是被关了四个多月，从70年10月到71年2月，交待了他们所想要的所谓“516问题”，把我放了出来，恢复了人身自由，回到了连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那真是没有多少事好干，我们二十多人管理了一片十几亩的麦田，锄锄草、松松土，麦穗长出来之后，人们轮流地到田间轰鸟，那是一长条的山坡地，农村生产队闲弃的土地，无法种稻，我们反正人多就试着播种了小麦，起一点看管的作用。一块孤零零的狭长麦田，左面是河右面是山林，麦子出穗之后，成了众鸟之的，我们不能不在田边四周设人轰鸟，否则颗粒无收。难怪农民放弃这块田。对我们来说，收多收少都是无所谓的，不能让我们闲呆着。我们只能采取人力轰鸟

的笨办法，从清晨天麻麻亮到晚上擦黑，都派人轮流值守。坚持了个把月和鸟战斗，直到割完麦运回场地。就是这样还是让鸟啄，连吃带祸害损失了不少。

尽管清查“516”如火如荼，表面很紧张，但是人们似乎并没有，把这个当作多大的政治斗争，不像过去搞反右那样。抓出来的“516”就好像没事似的，照样都是嘻嘻哈哈。宿舍里最热闹的就是抬杠。说起：“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对的说，应该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魔代表的是造反的，道是玉皇大帝。争辩者反驳：道是如来佛，孙猴子翻不过如来佛的手心。又有人反驳，如来不是道，道是如来的下属可以翻过来，如来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又有人争辩说没有绝对权威，魔是人民群众，权威也能打倒。“哈哈！‘516’就是要造反……”。激烈争辩让引起搞政治的老师，感到要出格，赶忙岔开问道：不管魔和道谁大谁小，到底什么是魔？魔和鬼有什么区别？众嘴纷纷：“魔就是鬼，魔鬼魔鬼嘛！”、“魔是鬼头，要不鬼怎么叫小鬼。”、“魔比鬼有本事，道行深。”、“那么，魔就是经过深造了的鬼。”“不对，不用上学，魔是鬼中杰出者，打拼出来的。”、“不，他是不择手段，踩着别的鬼爬上来的。”有一人突然语出惊人：“你们看魔字怎么写，魔就是长了麻子的鬼！”大家轰然大笑，一场抬杠也就收场了。仔细想想也很有意思，这种调侃和起哄，不也是一种深层地对劳动改造的满不在乎么？似乎还有点映射什么。

1971年9月份我被批准回京探亲一个月，回到学校看到四处冷冷清清，学校留守看摊的没有多少人。我也没有住在校内，徐宏勤回

到小学之后，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大单位里，借了一间平房住在那里。我休假还不到一个月，干校就来电报催我回去，听取传达重要文件，参加学习讨论。回到干校之后立即听取了，传达林彪叛逃的“913”事件，的确是令人震惊。我感到惊愕的是，抓“516”要我们交代的重点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江青、反林彪。党章上定下的接班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成了十恶不赦的敌人，这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学习文件，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成了我们干校的主要任务，清查“516”早就扔到一边去了。

1970年地质学院决定外迁到湖北，湖北省给选址在荆州。1971年北京派出的军宣队，也要换成湖北派出的军宣队。原来北京的军宣队是空军政治学院的，本身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只是林彪一套的政治“三忠于 四无限”贯彻执行的特别好，多数是政治指导员出身，能说会道（“913”之后他们的下场极惨），相比之下荆州军分区派出的军宣队都是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大兵出身，他们那里接触过大学的知识分子，根本玩儿不转，军宣队的领导于是决定，把“五七干校”搬回湖北便于管理。1972年春节过后我们就忙于准备搬家，他们也不考虑经济损失，不考虑搬迁的复杂性，硬是要搬家，结果是折腾得刚刚在湖北沙洋落脚，形势发生变化，军宣队指挥不灵了，一个一个不辞而别灰溜溜的溜走了。

湖北沙洋原是公安部所属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文化大革命后认为不安全，撤销迁到更远的大西北了。方圆几十里的农场，安置了北京湖北几十个单位的“五七干校”。我是第一批打前站到达沙洋

的人员之一，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安置全部人员的住宿，在这里只能是搭建临时的窝棚，不能再像江西那样建设半永久性的平房。又是花了不少的钱。购买了毛竹、苇席，搭成了圆拱形苇棚，上面再糊上泥，实际就是当地放鸭子人住的棚子称为鸭棚，我们刚去的时候已是初夏，盛夏棚子里是40度以上的高温，人们只能在外边用雨布塑料布扯起凉棚休息。夜晚午后再回到棚内睡觉。

我在沙洋干校基本上没有住在农场，我被派在沙洋镇上舒服地住在镇招待所里，接待从江西到武汉，再坐船到沙洋的人员和行李物资。江西过来的人员分成了数批，多数人坐汽车到干校农场，也有少数的坐船过来，下船后用卡车送到干校农场，大宗的行李是从火车货运到武汉，包驳船运到沙洋。我再找马车拉到农场。我驻守在沙洋镇差不多有两个月，完成了全部的物资和行李的转运工作。回到了干校农场。这时候派来的军宣队已经悄悄地撤走了，干校归在迁到江陵的地质学院校部直接领导了。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八月份了，我申请回京探亲。到了10月了我写信问干校那边的同志，说我要回去，他们回信告诉我，叫我别回去了，这里的人都要回北京，那里没法过冬。我的东西他们会给我运回来的。干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结束了。没有结业式，没有鉴定，没有任何的说法，作鸟兽散。我想所有的上千个“五七干校”也大概都是如此，至今官方的文字从来也未提起过，这个劳民伤财的“五七干校”。连公开的文艺作品，从来也没有涉及过这个题材，看来很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五七干校，将

来有谁来书写这一笔呢？

现在有时候，我们退休了的人碰到了一起聊天，其中有些去过于校的人，开玩笑地说：我们是经过干校学习深造的，我们比你们（指没去过于校的人）学历高，我们是“高材生”，说起来有些调侃。抛开政治的层面，政治的纠缠，那段生活还真是令人怀念的。

为什么大学都要迁出北京？

1970 年北京各个大学，都在远离北京的外地寻找地方准备搬迁，按当时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战备的原因。中国和苏联闹僵，老要反对人家的修正主义，边境上又有摩擦，害怕真的打起来，北京各方面都做着备战的准备。各个大学和主要的科研单位都计划着是首先外迁的，我们 1969 年去干校是人员疏散的先行一步。1972 年中苏间的紧张局势有了缓解，所有各单位的“五七干校”的人，大部分也都撤回北京，北京备战的气氛也放松了许多。

我们回到北京只是无事的呆着，没有教学，没有科研，在干校练就了一些做木工的手艺，没事打柜子做沙发，再有就是攒电视机。后来我们和张家口探矿机械厂联系，承担了一个研究和设计钻机试验台的装置，总算找了一些事干。忙到了 1975 年。这期间院长高元贵，与湖北省委交涉了很长时间，敲定了学校搬迁到武汉市，新的校址算是落实了下来。原定学校的大队人马 6、7 月份就要迁到武汉，因为河南大水灾，京汉路中断，直到 9 月由副总理李先念督办检查，一个死命令，我们多数教职工像赶鸭子，轰到了武汉，夫妻都是地质学院的双职工是举家搬迁。新的学校刚刚开始基本建设，涌到了武汉的人被分散到三、四个点安置着。

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为什么要把那么多大学迁出北京，原本认为大学搬迁是为了战备，现在似乎没有那个必要了，但是更迫不及待地要把大学搬走。一个首都应该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为什么就不能容许

大学集中在北京？海淀区是大学集中最多的区域，各院校都在忙着搬家。清华搬四川绵阳，北大搬陕西汉中，中国科技大学搬安徽合肥，师大要迁到某省与该省师范学院合并，农大搬陕北延安，矿业学院搬四川华蓥山，后改到江苏徐州，石油学院搬山东东营，林学院搬到云南西双版纳，钢铁学院搬云南楚雄，水利电力学院搬河北邯郸，机械学院搬陕西咸阳，建工学院搬武汉……等等。不能再一一列举。这种搬迁难道没有慎重考虑，是随意做出的吗？

有几句经典的话我记忆犹深，“农业院校办在城里，那不是见鬼吗？”、“工科学校就应该同工矿企业结合到一起。”当然这就是最高指示。那么非农非工的院校呢，不是照样也要外迁搬走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猜想北京有那么多大学，就会有思想活跃的青年人，就会有难以预料出格的事情发生。这会使老人家坐卧不安，担心风云变化，担心设计的理想目标不能实现。当然大学必须外迁，以绝后患。最高领导人的意愿，那些听命者能不遵旨照办吗？1975年迫不急待地催促大学外迁，只能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赶紧到武汉去，正值河南发大水，驻马店地方两个水库的水坝冲垮，西平和遂平两个县被夷成平地，据说死亡人数达到二十多万人。京广铁路中断有一个多月，刚一恢复通车铁道部受中央指示，通车的第一趟列车派做专列，仅只拉了我们一个学校的人，包了全部的卧铺和硬座席，直达武汉，沿途不上下任何其他别的旅客。如此大的水灾，没有一点的公开报道，但是天上的卫星是有眼睛的，人家外国会怎样看待你中国政府。列车夜间路过灾区，路基刚浸泡过水，列

车行进地极慢，靠着车窗透出去的灯光可以看到，路基两边全是水，远处是一片漆黑没有一点灯光。停靠在小站的时候，车站上有许多要想上车的灾民，车门紧闭着不开，车下哭嚎着也没有用，我们好心的同志对列车员央求，就开一下车们吧，他们都会是短途到前面下车，投奔亲戚的。列车员为难：“我不是不想开门，门如果打开人都会涌上来，列车就别想前行了。”列车本来就是临时停车，列车员也无权利让人上车。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可怜的灾民无助的哀求。

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无视那样大的灾情，把一个大学的搬迁，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而不设法去救助灾民。究竟是救灾重要呢，还是强制我们赶紧去武汉重要？难道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

然而，我们到了武汉却是无事可干。总共安置了四个点，前三个点大家都是闲呆干等着。第一个点是全面接管合并了的武汉地质学校，第二个点是整个借用了武汉教师进修学院，第三个点是挤占了华中农学院的一些校舍，农学院遵照“农校不能办在城市里”的指示搬到下面去了。第四个点是新校址，分配从事基建工作的人员，都到建设工地上岗。我们系留在了地校，整天的闲扯天、吹牛、打扑克、下棋、上街瞎逛，也真是无聊透顶。非要我们赶到武汉难道为了就是为了这样闲待着？就这样我们从1975年的9月份闲待到第二年的3月。10月份的时候，受湖北教委的指示，学校派人下到地区县招生，由公社和生产大队推荐，派去的人做文化考核，县里批准。推荐的考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部分城市下乡知识青年，略好一点，学了一些高中课

程，最差的只有小学低年级水平，答卷： $1/2+1/2=2/4$ 。这种学生还不能不要，一定是大队或公社干部子女，你如果不收，别的好一些的考生，也别想收。另外辽宁交白卷的张铁生的事例，也给了我们招生同志一个警钟，文化考核只不过作为摸底，不能定成是录取标准。

3月份之后，我们一些人有事可干了，去帮助这些新招来的学生，补习最基础的数理化课程。只有是个别辅导，手把手地教。就这样还是有个别太差的，什么听不明白。这就是毛泽东要求的改革的招生制度，这样招来的学生毕业后能干什么？哪个用人单位能用？难怪“四人帮”倒台以后很多单位，对这些称之为工农兵学员的大学生，一律回炉学习，重新考核再分配工作。这样招来的学生，稀里糊涂的学习，没有基本的基础知识，没有高素质的专业技能。培养这样学生的大学，的确在不在城市也无所谓，那个小地方都可以办学。大学里也不用什么教授副教授，也不需要科学实验，更不需要科学研究，只要传授一些劳动技能就可以了。这纯粹是毁掉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我们院长高元贵一个近七十岁的老人，坚决顶住不在一个小县城里办学，最后选定武汉。在那个文革的极“左”年代里，顶着来自各方的压力，为地质学院的前途费尽精力，那真是太难能可贵的。

迁校的热浪仅仅是一年多的时间，就发生了一些逆转的变化。最先是北京化工学院和北京钢铁学院，借口因为燕山石化总厂和首都钢铁公司发展的需要，按照谢富治请求暂缓迁校，后来索性不迁了，搬出去的一些物资主要是桌椅板凳床也就扔在了外边不要了。其实化工学院还没有行动，可是主要的教学楼已经移交给中国科技文献馆，严

重影响了化工学院的恢复招生和教学，但是学生宿舍和职工宿舍却没有被侵占。农口的三个学校却受到了极大地摧残。农大给弄到了陕北，人员在当地不少得了克山病，是一种心肌受到损害的严重心脏病，这与地质条件和土质有关，而且农大还死许多引进的珍贵品种的牲畜。林学院到了云南也因为水土不服，疟疾肆掠，人员也病了很多，另外也没有合适的地盘搞基建。农机学院到四川挤占四川农学院，四川农院本来地盘也不大，也是要它向下搬，人走家属不走，两校人员摩擦不断，农机又不得以迁回到河北邢台。折腾得大伤元气。这时候主持农口方面的副总理王震，毫不犹豫批准三校都全部回北京，王震的脾气是不管不顾，那些把持着教育口的迟群谢静宜们，不敢有任何阻拦。三校在外头折腾两三年又回来了。副总理万里主持铁道部，没有让北京铁道学院走，倒让唐山铁道学院搬到四川峨眉，它真是躲祸得福，唐山铁道学院原址遭受地震最惨烈的破坏。后来万里当了安徽省委书记，却挽留下中国科技大学留在合肥。科大在北京原来是与中科院各研究所紧密连系的，利用科学院的最先进的设备，依靠科学院的著名科学家，办学、开展学术活动。而在合肥脱离了这样的条件，原本是可以和北大清华平起平坐的，现在下滑到二流地位。

高等学校因为外迁和停止教学引发了许多因为侵占了校园的矛盾，一个惊动了周恩来总理的事件，就是人民大学校园之争。中国人民大学没有要外迁，但是因为不知是谁人作主，把第二炮兵司令部迁到人大，在人大的大操场下秘密修建了一个地下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的修筑费用比人大几个教学楼合起来的还要高。要让二炮搬出去也确

实是很困难的。问题提交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说，人民大学不能停办也不能搬走，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办的第一所新型大学，不能有变动。二炮不论再花多少钱也得另找地方搬出去。这个事情由总理敲定。人民大学要回了被占的地盘。

石油学院迁到山东胜利油田，东营旁边，一个寸草不生的海边滩涂之地，周围没有村庄，没有田地。也是石油系统有钱。在远处买土运过来种树、种草、种花，建立植被绿化校园，这是基本建设里一笔巨大的花费。功夫不负有心人，校园的小气候得到改变，恶劣的环境大大改善。刚开始的时候潮湿含盐的空气使许多仪器设备损坏，后来绿化再加上有效防护，潮湿锈蚀的问题基本克服了。但是这样的地方无法得到优秀的生源。他们多次呼吁山东只作为分校，恢复北京本校。余秋里坚决不准，文革时他在石油学院批斗，永远耿耿于怀。后来余秋里实在管不了了，石油学院不仅以北京为校本部，而且在昌平购地，建立了新的石油学院。矿业学院先到四川，遭遇了像农业大学一样地厄运，不少人得了克山病，他们重新迁到徐州，江苏省给了特别的照顾，在徐州建起了当地标准最高的建筑和花园式的校园。后来矿业学院在北京仍然恢复大学本科专业的招生。原校园让北京语言学院占了多半，但是它有很大向北发展的空间，逐步扩大得与语言学院差不多的地盘。

后来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地质学院、矿业学院、石油学院都更名为：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这三个学校都在北京以外，建设了规模很大，设施不错的当地一流的学校。为了区

别一个学校两地并存的情况。在学校的名字之后，打一个括号里面注明北京或外地。例如，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这是教育部下属的三个特例。是以一个统一校名做为教育部直属重点院校（原来都是部直属院校）。这三个大学都冠有中国的头名。都是一个学校分在两地，各自是独立的实体，没有总校和分校之分。教育部分别下拨经费，直接管理。党的关系则分别由所在地的党委管辖。对外可以用统一的名称进行国际交往，算作是一个学校。

形成这样结果的历史过程以地质学院为例，代表了大多数搬走了，又重新杀回马枪的学校所经历的曲折。1978年，迁出去的学校都开始了招生，但是老教授们，像地院那些知名教授，科学院学部委员（即后来称科学院院士），都不能跟着迁校离开北京，于是1980年在北京建立了研究生部，恢复高考的同时，1981年也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国家教委认可，北京市也认可，头两届的学生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先都是硕士研究生，三年以后有了硕士学位的，又从他们中招考博士研究生。从地质学院开始，迁出去的各大学都纷纷在北京成立了研究生部。中国科技大学成立的直接称研究生院。各学校实际上是偷梁换柱式的来回走。但是各个学校又有各自复杂的情况，一些学校前脚走他的地盘立刻被别的单位占据了。若是是本校的上级单位占了，或是它责成了下属的其他单位占了，那简直是没辙。地质学院的地盘除了地质部航空物探大队、遥感中心、计算中心、石油局及石油地质测试中心、地质印刷厂进驻之外，参与瓜分的还有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铁道兵新兵教导团、海淀区政府及一些小单位等等。地质学院成

立研究生部之后，外单位逐步清退，而地质部系统的单位总共占据了地院三分之一的面积，成为永久的住户，地质学院称之地质大院。后来地质系统各单位相对集中腾出来一些房子，地质学院得以开展各项教学和科研活动。到 1980 年代末，地质学院经过主管单位批准研究生部都扩大成研究生院，北京其他院校也都这样。1985 年随着对人才的需求，社会要求有更多的大学生，地质学院先是试着办本科的代培生，后来又逐渐纳入北京市的招生计划，招收计划内的本科生。高等学校的外迁，不明不白地经历了一个巡回，在北京又重整锣鼓开张了。没人说当初为什么外迁，如今又为什么可以回来，只是默认了先是合理，后又是合法的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全国各高校都扩大招生，北京市接受了更多的扩招任务，因为北京的教育资源雄厚，理应多承担一些。这些恢复了招生的老学校，起了重要的扩招作用。

不是所有的外迁的学校都可以回来，有的学校在北京已没有他一席之地，想回来也没有办法。像机械学院因为地盘全部给了《人民日报》社，他没有办法再回来了；建工学院因为北京市把一个建工学校升格成建工学院，还搜罗了原建工的在京人员，原建工学院就完全没有必要再恢复了；原水利电力学院，因为水利与电力分家，电力部主管把电力学校变成北京电力学院，原水电学院人员就全部归了华北电力学院，华北电力学院北京一部分，河北一部分，两地很近没有分家，算是一个学校。类似以上的还有一些学校。至此，十余年的迁校的动乱，算是划了一个句号。将来只有让历史来评议这个外迁高等学校的荒唐之举。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使北京的高校从文革前的 54 所，

现在增为 100 多所。在校的学生总共翻了上约十倍。北京才真正完成了做为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从邓小平开始的国家领导人，认识到国家的富强，经济实力的增长，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发展在于教育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才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毛泽东可悲的短见，就是不尊重知识，不重视教育，不重视人才。他以阶级斗争斗争为纲，把国家拖到经济崩溃的边缘，把科学教育摧残到毁灭的地步。我们这一代人亲历了这这一痛苦的过程，感谢“拨乱反正”，感谢“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高等教育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1979 年我是第一批被安置到北京研究生部工作的，回北京单职工是一个首要条件。一起回来的还有杨惠民，我们名义上都是做为李世忠教授的助手。在这之前我在山西侯马支援当地打水井一年多，我没有参加 1976—1978 年那两年所招工农兵学院的教学。这以后李世忠教授招了研究生，一方面帮了他的研究生的指导实验，另一方面我操办了地矿部探矿司的钻探总工培训班的工作。

这就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人力资源，利用的我们在北京信息获取的有利条件，利用我们与主管部联系方便，更易了解需求。我们这样做有利国家，有利探矿事业，也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提高，不荒废业务。这也是为我们逐渐恢复本科生招生，创造有利条件。地质矿产部主管教育的不让我们招本科，我们办班总可以吧。1986 年我们又为煤炭部、冶金部、化工部、建材部培养本科人才，由外地的招生办按当地招生录取线，录取考生，发录取通知。教育经费按人头由各部出，学

校向各部去要。北京市教育主管认可，学生可取得正式的本科学历。这样绕开了我们的直接主管——地矿部教育司。我们逐步冲破不准招本科的限制，造成既成事实，地矿部也管不了了。

大约是1990年地质矿产部的部长宋瑞祥，他有一个自认为非常得意的打算，他在部党组的会议上说，武汉地质学院招收的本科大学生，每年毕业的学生已经足够使用，北京研究生部只需要培养高级的地质科学人才，不能再招本科大学生。这就是下了一道禁令，不许北京招本科生。宋瑞祥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打算将中国地质科学院迁入地院，地科院在百万庄腾出的大楼，地矿部的部分机关可以搬过去，这样西四地矿部机关就松快的多了。宋瑞祥派了他的秘书到研究生部，宣布了他的这个决定，研究生部的领导们就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老师们听到就炸了窝了，纷纷议论表示不满。煤田地质系的教授全国政协委员李宝芳，通过政协常委会反映学校老师们的不满意见。宋瑞祥得知地院的老师上告，亲自出马到地院来，说是听取意见，解释部党组的决定。实际上想施压。李宝芳等教授质询宋瑞祥，你们报请了国务院了吗？地质学院的去留你地矿部无权决定，宋瑞祥老羞成怒，拍起桌子，说，你们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吗？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有的老师通过关系，把意见反映到朱镕基副总理那里，朱镕基派人调查，作出批示制止了宋瑞祥的一意孤行。朱镕基对宋瑞祥原本就没有好印象。两年后朱镕基出任总理，国务院机构改革大调整，地矿部变成国土资源部，宋瑞祥改任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级别降下了许多。他的仕途也算是到了末路。

上世纪九十年代，地质学院更名“中国地质大学”以后，武汉和北京各自独立，统一使用这个名字，此时还是地矿部部属。进入二十一世纪，高等教育的飞速发展，各学校都扩大招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达到超过万人的规模。进一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所有高等学校和所有的高等职业教育，都划归各地教育系统领导，原部属的重点院校由教育部直接领导。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都不仅恢复得完全与文革前一样，而且都扩大了规模，扩大了专业范围，一方面保持了原学科的特色，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多个文理学科，成了多学科的综合理工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走向了新阶段。彻底摆脱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下的高等教育体制的框框。

教育革命，革得没有了高等教育

从 1962 年起一直到 1978 年，中国高等学校里闹腾了十六、七年的教学改革、教育改革、教育革命，最后闹腾了没有了高等教育。中国这个大国，整整十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高等教育的荒漠大国。即使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时代，那时的最高领导人，觉得中国即便没有了高等教育，也不能保留着产生修正主义的阵地，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于是大刀阔斧地砍向高等教育。从 1966 年起停止了所有高等学校的教学、招生，先是停课闹革命，到了 1968 年更是进一步封闭了所有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止教学，停止一切科研学术活动。包括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北京大学，也未能幸免。

文革前高等教育从改革到革命，回想起来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教学改革到教育革命。大约是 1962—1965 年。开始时还真是着手教学改革，诸如：课程设置、实践环节、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比例、真刀真枪毕业设计、理论结合实际等等一些具体的教学改革。后来进一步涉及到有关培养目标、培养方向、为何学习，为谁服务，又红又专等改革的问题。再后来改革又要求，明确指出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入学政治条件必须可靠，阶级成分要偏重劳动家庭出身，等等。改革的方向变成了，更主要的是涉及教育的根本目的。从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上升到高等学校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政治第一，还是业务第一？是培

养革命的劳动者，还是培养专家？改革提高到“革命”的深层次高度。已经不是什么教学改革，而是教学革命，教育革命。第二个阶段，发动学生闹革命，斗资、批修。大约从1965—1972年。文革开始之前，到文革的火热爆发，那些革命先锋们，对准现存的教育体制，教育方针，进行了全面攻击。列数教育体制、教育方针的罪状，声讨要彻底砸烂旧体制、旧方针。斗“旧”教育体制的资本主义方向，批“旧”教育方针的修正主义本质。进入1965年毛泽东就明里暗里，否定解放后十六年的高等教育的成就，发难高等学校是资产阶级的最后堡垒。1966年文化大革命，首先从高校开始，高等学校和高等教育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毛泽东煽动学生批判高等教育体制，打倒教育部阎王殿。然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了全社会。推向了全中国。然而，文革运动的发展，大学生们跑到全国各地各部门煽风点火。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决策者只好反过来对高等学校派军宣队实行军管，封闭了高等学校，禁止了学生的“串联”，教育革命也中途停摆。此时高等教育是空有其名，有校无学。第三个阶段，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付诸实现。从1975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学校实行了军管，学校也送走了文革前全部的学生，排除了一切干扰，革命领导人可以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实践。1975年责令高校开始招生，“恢复”教学，高等教育必须是全新的“革命化”的面目。学生入学无需考试，上课不在学校，而是现场教学；学制缩短到两年、三年，减少“无用的”理论，压缩外语学时；教学结合实际，边实践边教学，以实践为主；教学相长，老师要按照学生的要求施教，教会为止；与

工农同吃同住，工人农民上讲堂。这哪里是高等教育？就是简单的职业培训。这种教育革命的成果，分明是取消了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教育革命的结果，彻底地没有了高等教育。

文科院校的教学改革和教学革命，具体怎样更不好说，可能更是极荒谬的。在那些革命者看来，文、史、哲、政、法等无需要高等教育，这些人才，只要经过革命锻炼就可以了。这些专业的命运我估计，只可能被砸掉。至于理工科院校，具体的教育改革与教育革命，也会是百花齐放。可能有不同的“创造”。我身在地质学院，把我所经历的和所看到的，略微地梳理一下，也足可以见一斑，而概全豹。总之，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彻底地“破”，而后，全新地“立”，建立所谓“革命化”的高等教育。

我们学校 1961 年就开始了试行教学改革，那时我们是很自发地进行的。我记得当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加强理论基础的教学，切合实际地选择教学内容，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摒弃在课堂上听起来，令人厌烦的操作过程和机器结构细节的讲述，加强实验实习的教学环节，取消与专业关系系不大的课程设置，或改为选修。1962 年也从上面正式布置了教学改革的任务，教师和教学管理等人都是由衷地拥护，积极地投入到教学改革的活动。因为老师们经过将近十年的，照搬苏联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的实践，感到教学计划和一些课程设置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此外，教学大纲和许多教学内容脱离实际，教材中过多繁琐冗长的叙述，某些理论也有牵强附会，简单的东西虚张声势，弄得极为复杂。老师们确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一面调

研和仔细斟酌，一面着手进行改革，应该说初步的教学改革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

大约从 1963 年起，我们的教学比起原来有了不小的变化，教学计划的总学时数从原来的 3000 多学时，降到了 2400 学时以下，实习的周数增加了 5、6 周。由于各个地质勘探专业，如地质普查专业、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地质专业、煤田地质专业、石油地质专业、水文及工程地质专业、物探专业都取消了钻探、坑探等工程课程的课堂教学，改成结合本专业的勘探教学实习，通过现场教学，了解钻探、坑探的基本知识。同时也取消了机械学、力学、电工学等工程基础课程，地质学院里的纯理科性的地质学、矿物岩石学、地史古生物学专业，安排的勘探方法的课程也取消了。这样大大减少了我们系和各教研室对外系的教学负担，使我们有能力和精力去研究，我们自身探工专业的教学改革。探工专业也整合了六、七门零零散散的地质课程，统一成为一门综合地质课，并且结合野外地质实习进行教学。大量地减少了学时数。同时，钻探、坑探的专业课也几乎是缩短了三分之一，增加了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的周数。这样的教学改革，使我们的教学更符合实际，更能适应未来的工作需要，更能够打好扎实的基础，和专业的工作能力。我们进行的教学改革是很有成效的，这是我们全体教学人员努力的结果。

这样的教学改革，虽然还是初步的试行，不够成熟，不很完善，但是受到老师们的支持，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收到学校领导的赞许，也受到上级教育主管的认可。这是皆大欢喜的事情。然而，那个正忙

于抓革命的“中央”，对于这样的教学改革不宣传，不报道，不肯定。似乎是不屑一顾。

1963年、1964年，在院长高元贵亲自带领下，紧抓了课堂上的讲课质量和讲台教风的检查，批评松散拖拉、不很好备课的作风，树立优秀讲课的典型，高元贵经常随堂听课，及时讲评；学生也参与评课和提意见。全院确实树立了精细、活泛的教学作风。这样一个良好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965年。65年的“社教”运动，把正常有序的教育改革彻底地打乱了。

在大环境形成的高压力下，在极“左”思潮的怂恿下，在一些喜欢赶风的人积极努力下，我们系率先办起了，探工专业半工半读的教学试点。那是从1965年新招的学生中，动员一部分学生参加半工半读，说明半工半读是，一方面学习读书，一方面从事所学专业的生产工作，不交伙食费，享受全助学金待遇，还有每月一定的生活补贴。毕业仍然是本科学历，学制还是五年。接受了动员参加半工半读的新生，组成了两个班一共约六十人。从基础科教研室、技术基础科教研室、专业教研室抽调出老师，组成了半工半读教研室，有教数学、外语、政治、力学、机械、钻探的老师。半工半读办学地点选择在山东招远，山东地质局的一个金矿地质勘探队，通过地质部的安排，学校与山东地质局签定下共同办学的协议。教学开始将会有很繁杂的教学管理，与勘探队各部门的联络协调，学生劳动安排，师生的生活管理等等一系列的大小琐事。要有庞大的组织工作。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半工半读办公室，由院、系和队上领导，及教学行政管理人员组

成，此外组成人员，还包括有财务、生活后勤、党团组织、政治辅导员等干部。办学给地质队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幸亏勘探所在的矿山也给与非常大的支持和帮助，提供了宿舍、教室、桌椅板凳家具和食堂的入伙。一切从零开始，半工半读的正式开学到了10月份，比规定的9月开学推迟了一个多月。从决定招半工半读生就开始了筹备工作，至少有半年之久。这已经是快马加鞭了。这样的办学当然是一个彻底的教学革命，一个创新的典范。

一年级刚入学的新生。大多数还是毛头小孩，半工半读没有女生倒是省了一些事。学生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开始不参加任何技术性的生产劳动。如何安排学习和劳动，让组织者们伤透脑筋，因为现场条件的各种限制，安排计划经常变化。一年级的有些基础课，物理、化学离不开实验室，机械制图需要绘图条件和工具，这以后都还要在校内的条件下上课。这样的半工半读教学试验，纯粹是政治性的噱头，迎合了正兴起的极“左”风向，符合毛泽东培养人才的思路。毛泽东说过：“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活见鬼吗？要到农村去，工科大学也要到工矿去”。他后来还说：“学生以学为主，还要兼学工农兵”。这个半工半读的教育改革的创举，一经我们有些人提出来，就一路绿灯得到通过。实际上它是劳民伤财，教育倒退。一方面无法进行有效地教学组织管理，学生在杂乱的环境下也无法学好。另一方面参加工业性的劳动，让老师干部们整天提心吊胆，硬着头皮小心呵护。然而这是新生事物，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只能是叫好。1966年6月，这个教学试验班，起步不到一个学年，就让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摧毁了，所

有师生都匆忙撤回北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兴师动众，耗费了很多的人力财力的半工半读的试验，就此中途夭折，寿终正寝。

这一批半工半读的学生，应该算作文化大革命受害最深的，他们基本上没有学什么大学的课程，只上了点儿高等数学、力学、俄语，也没有学到任何专业技能。后来在 1968 年“复课闹革命”时，零散地补了一点课，也只是蜻蜓点水，听讲了一点儿皮毛。1970 年分配出去，基本上都做了工人，过了多少年后，通过努力，在工作中学习，才干上了各式各样符合大学毕业身份的工作。

回来再说学校里的情况。1965 年“防修反修”的气氛绷的愈来愈紧，“阶级斗争”的高调唱得震天响，学校里的教学改革也跟着变了味儿，由改革升级到革命。没有政府系统转达下来的任何指示。没有党的上级的任何文件精神，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来的暗流，难听的说是一股股阴风，指向了当时现行的教育方针、教育体制和教育目标。什么“高等教育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培养工程师、培养高级人才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苗子”、“砸烂苏修的教育体制！”等等。我们下面也不厌其烦地争论“必须培养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那么中学、小学不也是这个目标吗？高等教育与之怎么区别呢？大家糊涂起来，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呢？这时候不知怎么出现了“砸烂旧大学”的口号，那么新大学又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试验的那个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就是未来大学的雏形？砸烂了现有的高等学校，那么也就没有了高等教育。这在艰苦抗日战争的年代，也未曾有过。这个荒唐的论调到了 1966 年文

化大革命，也真的就那样出现了。高等学校关门大吉。中国没有了高等教育。

1966—1974 年高等学校不招生，不办学，当时在校的学生被煽起当枪使用了一段，抛至一边，甚至有的“造反”过头，判刑坐牢，学生们再也不敢闹了。老的“走资派”打倒，新的教育部门掌权者迟群、谢静宜之流，遵循最高指示，开始了彻底的“教育革命”。高等学校被责令要恢复招生。这个时候，北京的高等学校大部分已经外迁，就要求各自在新的办校地点，因地制宜招生开学。1975 年首先部分工科院校开始了招生，张铁生那样的交白卷的典型，也当上了大学生。我们学校迁到了武汉，只批准在湖北、湖南、河南招生，派到县乡下面的招生人员，碰到了回答 $1/2+1/2=2/4$ 的推荐生，没有办法也得收下，因为他是县乡头头的孩子，你不收下他，别的比较好一些的推荐生也别想招到。新招来的大学生被称之为“工农兵大学生”，一律是家庭出身好的工、农、革命干部的子弟，只有少数是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大多数是农村来的。因为文化程度的差别非常大，极少数是高中毕业，有部分上过高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多数，个别的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他们到校以后，不得不补习最基本的中学的数理化课程。

以探工系说，正式开始学习大学的基础课程，学制短，不得不在学校里，一门一门的突击式上课，精简内容，压缩时数。基础课数、理、化、制图，技术基础课力学、机械、电工、水力、金工、热工、测量等等，还要有一点外语，以及不能少的政治课，一古脑填鸭式灌输。也不考试，只要上课就是通过。那些学得稀里糊涂的，也跟着混

下来，反正是包上学，包分配，包工作，一包到底。学好学坏没有关系。在学校里的课堂教学，一年全部突击拿下，后一年就是在野外现场，边学边干的专业教学了。

现场教学定在了河南商洛地质勘探队，商洛地区是河南最贫困的一个山区，当初李自成造反起家的根据地。1976年当地老百姓还生活还非常清苦，粮食不足，地质队的生活吸引着农村公社社员们羡慕目光，一来到队上师生们感到震撼。钻探专业课老师，先是概况地介绍钻探的机械设备、工具，钻探的生产程序和过程，然后是分配到钻探机台上进行跟班劳动，这是类似于以往的钻探教学实习，劳动了一段时间后再系统的，听老师讲解《钻探设备》《钻探力学》《钻探工艺学》的课程，边听课学习，边参加维修车间维修机器的劳动。另外还有地质老师带领进行地质教学实习，学习基本的地质知识，认识矿物、岩石，学习一点地质构造、地层学、地质水文等知识，学认地质图，学习地质勘探方法，地质岩心编录。这样的边教学边实践，倒是使学生们记得清、掌握牢。然而，这样费事劳神地教与学，学生们将来一参加工作，一接触实际，可以简单地解决了。而这样培养大学生，纯粹是浪费精力，浪费时间，完全没有必要。也许对于学习能力差，基础薄弱的工农兵大学生也只能是这样。

这样的边实践边教学进行了一段，学生们就完全分散到许多机台，为期三个月或是更多一些时间的跟班劳动。他们有的会再分到别的勘探队的机台劳动，都挤在原来的勘探队，人数太多。参加机台一段时间劳动，比较熟悉地掌握了钻探的业务知识和生产的技能，钻探专业

老师拟定出一些专题，交给学生，让他们准备资料，研究问题，写出专题的论文报告。这是最后阶段的毕业教学，也算是毕业实习，编写出毕业论文报告。质量高一些的称谓论文，达不到的也就是实习报告。事先老师给出论文报告的大纲，收集资料的目录，列出要调研的生产中的问题，让学生来分析和评述，提出建议。通过这样的环节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能力，对于一些学习比较优秀的学生，能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毕业前教学的一个最后环节，能不能达到设想的要求，也只有试着看一看。

我这个时候正在山西侯马进行供水井钻井，也给我分来五个学生。让我带一下他们的毕业实习。我这里是不合适进行学生实习的，这里不是矿区，只是一个孤零零的野井，目的就是打一个供水井，提供不了良好的教学条件。但是来了我也要想办法管他们。我给他们讲解，选择在这个地方钻井的依据；钻井过程遇到的各种问题，如何解决的；钻水井的程序和要求；钻大口径水井应该注意的事项；各种井内故的处理方法。我让他们评价这口井钻井的应该吸取的教训，他们听了我所讲的，亲自观察和体验，询问工人，翻看生产记录。我让他们先写出大纲，捋出思路，再着手写出论文。这些学生无论业务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思路的条理性、逻辑性；绘图及文字的表达水平，都比过去的大学生差得很远，达不到我对他们写论文报告的要求。也只好那样，写出什么样算什么。五个人之间也是有很大差别的，有的好一些，能把想说的写的清晰明了，讨论一些生产技术问题，提出意见；有的能把我讲的有条理地写出来，排列出钻水井的程序和要求；有的

无论怎么给他说，也不能用文字表述清楚钻井的基本过程，有点糊里糊涂。写得好的也也不够毕业论文的水平，勉强算一个普通的技术论文，缺乏自己创造性的观点，缺乏有见解的评论。

这些工农兵大学生，1978年毕业分配，“四人帮”已经倒台，中央也决定不再这样招生。这些学生向下分配遇到困难，生产单位拒绝接受，强制分下去，也当做了工人使用。过了很多年，有的通过再学习、锻炼，干起了技术员的工作；有的做起了党务行政工作；有的改行干了别的。

这就是我们教育革命的成果，我们培养的不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才，而是普通的劳动力。中国教育革命革得了，没有了高等教育。直到1978年重新恢复了高考招生，中国才结束了这种荒唐混乱的局面。

政治至上及突出政治等等

在那个非常年代里，做任何事情都要突出政治，一切以政治为首是瞻，那是时代的最大特征。这是谁也不能违背的铁定的原则，否则就要遭受灭顶之灾。不要说那些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突出政治的作为。就是大跃进、大炼钢铁、农业革命“八字宪法”等等，看似发展经济和经济工作问题，实际上还是以政治和革命为目的，仍然是属于政治范畴，

突出政治的提法好像是从 1962 年以后开始的，林彪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力批判军事工作中单纯军事主义，强调要突出政治，必须是政治统帅军事。这以后，“突出政治”一词就广泛成为一切工作的首要口号。这以前的政治第一、政治挂帅、政治为本的提法，就不如突出政治的口号更为响亮，中国社会从此走向了突出政治的极“左”思想统治的时代。

1949 年共产党刚取得政权的时候，大多数的人还不懂得什么政治不政治的。首先是对知识分子采取了加强政治教育，改造思想，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政治是怎么回事。我，一个单纯的中学生，虽然较早地参加了革命，但是并不真正懂得政治，而是只是学到了一些理论上的皮毛。1951 年上了大学之后，才逐步领会了政治的重要性。解放初期许多人天真地想着不过问政治，但是从五十年代起到七十年代末，谁也没有逃过政治对他大半生的干预。你不过问政治可是政治要过问你。不说那些众所周知的政治运动和革命什么的，我就从 1951 年说

起，我曾经经历过的，一些具体的琐碎的牵连着以政治为标准 and 突出政治的事情和事件。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荒唐和可笑，但那个时候却是天经地义的正确。

我 1951 年上的大学是华北大学工学院，它一方面保留着一些革命大学（华北大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实行着当时中国一般大学的学制，和教学管理方法。还有它又是国内最早学习苏联，着手改变英美自由式教学体系，不变地按照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进行教学，建立严格的保密制度和保密思想。总之，它比别的学校更注重政治。比如我们一入学就有政治辅导员，别的学校还没有辅导员制度。入学之后从中学生变为大学生，留下突出印象的就是政治审查。入学后组织政治学习，然后要求毫无隐瞒交代历史，交代问题。又是讲政策，又是吓唬，恩威并施。我因为是团干部还曾经入了党，知道了什么是政审，那些刚高中毕业的小孩子简直给吓懵了，有的吓得胡说八道。小时候偷妈妈的钱，欺负女同学，打架、手淫……等等都向组织交代了。共产党取得政权刚刚两年多，就让人们感觉到在这个新社会里，政治的重要地位。

更为使人吃惊的是，选拔留苏学生，煞有介事的让人报名、推选，最后选拔的都是出身好，政治上完全清白的人。学习，只有一个中等以上程度的，其他三个都是学习成绩很差，其中一个是在全班垫底儿的最差的学生，是班上唯一的贫农出身，岁数比我们大很多。这时他正闹着找对象，曾托我向班上一个女同学说合，气的那个女同学直哭。后来听说在苏联也学习不好，老跳舞追苏联女生。1959 年

毕业回国真的带回了一个苏联妞儿。1960 年中国生活困难，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女人回国了，听说他也神经失常。这是我印象很深，依靠政治第一选拔人才的一个笑话。再反过来看我们班上，两个学习最好的学生，他们入学考试的成绩都很好，尤其是数学的成绩都几乎是满分，但是家庭出身都是地主，他们报考的学校的第一志愿原来都是清华大学，可能就是所谓的政治条件不够，被刷到了华大工学院的采矿系里来了。

1956 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最为平静的一年。没有搞运动，没有搞斗争，党号召“向科学进军”，要保证专业人员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从事专业工作，政治活动和政治学习的时间只占六分之一。当时也确实做到了这样，高等学校里掀起钻研业务，提高教学质量的高潮。社会上也表现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我们刚分到地质学院参加教学工作的同学们也深受鼓舞，发愤图强的学习和工作。好景不长，1957 年 5 月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曾声言的“疾风骤雨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成为空话。这个突如其来的形势转变，首先要对党、团员、入党积极分子进行认清形势和“扭思想、转弯子”的学习和教育。我们少数比较幼稚的人不明白为了党的“整风”，给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怎么变成了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同学吕梅先，是个热心为大家服务的工会小组长，提议在院里游行，要党委对一些领导多吃多占福利费表态，后来被定成了右派。在这以前，解放后那五、六年里，我从政治上判断一个人，看他进步还是落后，看是否靠近党、团组织，是否积极进行政治学习，是否关心时事

形势，是否热情参加社会工作和各种社会活动……等等。我的看法，错，完全大错。原来一个人不论他以前对革命做过多少贡献，不论他是否共产党员还是非党员，不论他是一般群众或大官小官，只要是你给党组织或某个党的领导干部提了意见，撼动了党的领导地位都会成为右派分子。上自给党中央提出建议的民主党派的领袖，共产党内的个别领导干部，下到一般群众，党、团员，凡是触动了“党的领导”的这个红线，都会成为大小不等，级别不等的右派分子。

事情就是那样残酷，谁也救不了戴了右派帽子的人，因为共产党教育所有的人都要与右派划清界限，六亲不认。我曾经在反右开始时，还是被表彰的“反右积极分子”（我只是在一次反右大会上批评一个狂妄的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但是我又在团组织内受批评，立场动摇，温情主义，同情右派分子吕梅先。在高等学校、科研单位、文化、卫生部门，这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为发生了比较多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的矛盾，所以在这些地方挖出来的右派分子，超过最高指示所谓的“估计”，“‘右派分子’大约是百分之一、二、三”，差不多都满员的达到百分之三的比例。我检点了一下我们学校里的右派，除了有不少的学生之外，教师、干部很多都是党团员、基层骨干、积极分子，有党团支部书记、委员，基层行政领导，直到知名教授、副院长、院党常委、副书记。他们最大的共同特点，就是听信帮助党整风的话，敢讲话、敢放炮，直指到那些领导能力不强，无水平、摆架子还爱占便宜的官僚领导。当然也就成了凑足百分之三比例的倒霉者。这时候我才渐渐明白，政治上的左右划分，不是看表

面上的进步与落后，也不是看本身是不是共产党，而是看对“党的领导”的态度。不服从领导，特别是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言论，肯定就是右派。

1970年我们接受工农再教育，去到“五七干校”接受改造锻炼。同为学员的有，反右时的党委副书记聂克，我们同住一起。一次，我问他为什么学校里反右都结束了，怎么还把陈子谷弄成右派（党委副书记，华侨巨商的儿子，抗日战争捐资并参加新四军，皖南事变中，上饶集中营的暴动突围英雄），聂克意味深长地说，定成右派不能都是下面的人，领导层里的也要有，这是上面的要求。陈子谷同情右派教授，反右不力，市委调查出来，后来补报上去的。这一语道破右派不仅有数量指标，还有质量（级别）上的搭配。这同样是“政治”需要，让外人看到，抓出来的右派不只是一般平头百姓，还有共产党的老干部。我们学校党委领导，只有陈子谷更像知识分子（其实只是华侨青年出身，没有高学历），外表孤傲，显得文质彬彬。其他领导都是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右派非他莫属。连揭发、批判都没有，定成了右派。他的级别属于部管干部，被退回地质部，下放到地质队了。应该说陈子谷是革命功臣，那也不管了，谁让他掉进了一帮平庸之辈包围圈里，成了一个位居高官的知识分子的代表。经过反右斗争，我似乎进一步认识“政治”是怎么回事了。只要对“党的领导”表现忠诚，对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表示衷心拥护，甘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一个人革命（左派）的政治标签。尤其是紧跟直接领导人，看来是最保险的，因为他们就是代表党，是党的化身。

但是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多数基层领导人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跟领导的，莫名其妙地又错了。党的声音只是中央的报纸、广播和中央文件所传递出来的。这个时候政治的涵义又升格了，也扩大了。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紧跟党中央，就是紧跟毛主席，政治最直接的代表就是毛泽东思想。那时候，政治说不准它的确切内涵，外延往大了说，政治囊括一切，因为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包含在国家和社会的一切领域里，它涵盖了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等各个方面，政治是至高无上的。深入实质往小了说，政治的精髓就是毛泽东的言论，浓缩为《毛泽东语录》，它是“正统的”政治，其它理论都是非真正的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样以毛中心的“正统政治”思想的笼罩下，许多千奇百怪的作为，许多荒唐的举动，都打着为了政治的幌子，打着反修防修的旗号，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打着“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最高指示，在中国的大地上胡作非为，甚至是伤天害理。没有人敢反对，没有人敢说“不”字。因为那些都是天经地义的政治。

各种例子不胜枚举。诸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全社会搞乱了；打到走资派，摧毁了各个社会的职能管理机构；破四旧，破坏了积淀了几千年的中华古文化，和优秀的传统道德观念；抓革命，搞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受到极大损害，国家经济倒退；支持学生“造反”，“大串联”，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推动文革浪潮，掀起政治旋风，让国家和社会遭受空前灾难；挑动武斗，支持派性，使交通阻断，划地割据，人民正正常生活受到极大干扰；批斗“黑五类”，清理阶级队伍，

打死、逼死、迫害死无数的人，制造出所谓“红色恐怖”，阶级斗争成了没有制约的打人、杀人、迫害人的借口；让知识分子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中断高等教育，停止了科学研究，使人才培养断层断档，本来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停滞倒退：批判封、资、修的文化，树立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化，从而扼杀了所有文学艺术活动，曾经要求“百花齐放”的音乐、美术、戏剧、电影、以及民间艺术，统统都被禁止，只有中央文革审定的八个样板戏，开放绿灯，中华大地的文化一片荒漠化……。所有这些都是以政治口号：“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拥护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掩盖下，干出来使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和令人发指的罪行。对这些总有一天，历史会彻底清算这一段的政治污秽，还人民一个明确的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评价。

1972年，那时我正常驻在在湖北沙洋一个镇招待所里，接触了不少过往的出差的公务人员，听到和了解了许多，同时也亲眼看一些外表现象，都是令我瞠目结舌的事情。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几个以政治为口号，所进行的重大工程建设。那些一时掌了权的极“左”派们，高喊着发扬革命加拼命精神，“只争朝夕”抢时间，争速度，与“帝修反”竞赛，为中国人争气。就在我们所处的荆州地区周边，有三个重大工程项目，边勘察、边设计、边建设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由于不按科学规律办，只讲政治挂帅，匆忙建设，盲目施工，工程进行中就出现问题，不得不停工整改，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第一件就是三峡工程。关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包括三峡水

电站的建设，早在 1954 年中央水利部成立后就着手筹备，设立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专门负责长江流域水利建设的规划和实施。1957 年定名为长江流域水利办公室，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常设机构，一个副部级的单位。之后 1957—1959 年，开始了大规模的三峡水坝的坝址选定和地质勘探工作，最后选定在三峡瞿塘峡的出口湖北省的三斗坪地方。党中央和国务院征求了各方面专家的意见，考虑再三，根据国家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暂缓建设三峡工程。以后是三年经济困难，中苏关系破裂，反右倾机会主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三峡工程建设的调查研究完全停止。文革中“长办”（长江流域水利办公室简称）瘫痪，干部和技术人员被下放，“长办”主任（副部级）林一山遭到批斗。

1971 年出任省委一把手的张体学，头脑发热，想通过抓三峡建设捞政治资本，于是煽动那些新宠们，要凭他湖北一省之力建设起三峡水坝。当时报到中央，中央批示不上马三峡大坝建设，先进行原定的小的低坝水利枢纽的建设。大概是湖北省革委会想独揽建设，绕过“长办”，让水利部下属的一个小设计院——长沙水利设计院，做低水坝设计。同时组建了工程指挥部，抽调人员匆匆上马，工程定名为“三三 0”工程。我住在镇招待所里看到，“三三 0”各式各样的车辆向宜昌方向奔去，运送物资，运送人员。为建设施工的前期，修路、建房、建供水供电的设施等工作。由于坝基勘探得不够，水坝施工后发现坝基会渗水。周恩来总理知道了，立即责令叫停。1972 年的夏天，公路上繁忙的“三三 0”车辆不见了。周总理找到“长办”林一

山主任，从新接管此事，与湖北省共同对在宜昌上面，西陵峡的出口南津关地方的坝址，进行详细勘查和设计。已经施工建起的坝基炸掉。1972年紧急刹车的“三三〇”工程的建设，停工了近三年，1974年秋又从新开始，称为葛洲坝水利工程。这一段的真实情况至今始终没有揭密。我只是听到和看到的一鳞片爪，我这样说了一些，不一定准确。但是1972—1974年，长江水利建设确实停工了三年。1988年葛洲坝水利枢纽完全建成，起到了发电、防洪。提高航运能力的有效作用。最主要还是为后来的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提积累了宝贵的经验。1971—1872年的以政治为目标，以政治为口号的工程建设，如果不及时停止，建起来一个安全不保证的水坝，一旦有暴雨洪水，那就会给长江中下游带来巨大的灾难。

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二汽车厂的建设。早在1958年长春第一汽车厂建成之后，中央就计划在南方筹建第二汽车厂，经过几年的调查研究，因为多种原因拖下来没有实现。1965年国际形势变化，全国投入紧张的三线建设，因生产中型和重型的军用载重汽车迫在眉睫，一汽生产的4—5吨的较轻型的解放牌载重汽车，不能满足需要。一机部选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建厂。十堰处于正在建设中的从襄樊到四川广元的川汉铁路线上。又是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二汽的建设拖延到1969年上马。一机部汽车局根据战备的考虑，二汽厂不准备建成像一汽厂厂区集中的大厂，而是按汽车部件的集成，建成若干个分厂和一个总厂，各部件送到总厂总装。按照这样一个设想，湖北省的建设者们，主要是工程兵的领导，就把厂房沿着铁路线延绵几十里一字摆

开。厂房抢时间因陋就简，厂房建好之后，才发现投入正式生产后，零部件的运转不能按生产流程方便地进行，生产不能及时的调度，还会造成混乱，建成的厂房不适合放置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边设计边建设匆忙施工造成的恶果，使土建工程验收基本不能通过。不得已建成的厂房都要拆毁，重新规划厂区，按汽车生产的要求和流程，重新进行厂房设计。这又是只讲政治，不讲科学规律的一例重大工程的建设，造成了极大的浪费。二汽的建设因此又耽误了差不多两年，直到 1971 年建设才入了正轨。这正是我们干校，从江西迁到湖北的前一年所发生的事，我住在沙洋招待所听说到的。现在第二汽车厂已经被称为东风汽车集团，生产各式汽车，制造厂不只是在十堰，遍布在湖北省的很多地方。

第三件事是江汉油田的建设。1972 年我们干校到了沙洋，准备自己打一口供水井，我们几个人，开着车到潜江（离干校不远）江汉油田找熟人关系寻求支援，车子进入油田，油田宽敞的混凝土路上，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坑，路面被毁得不像个样子，有的道路完全在彻底翻修。我们问矿上的人，怎么是这个样子。他们向我们道出缘由。这是几年前油田刚开发建设时，油田建设总指挥部转业转业的领导，带领着一个师的军人整体转业到油田，从事建设工作。修建油田的道路时，他看到图纸上混凝土的厚度要求是 80 厘米—1 米，那位总指挥发话，哪里需要 1 米的厚度，知识分子就是会死照书本搞浪费。他下令只需 30 厘米，把设计厚度砍掉了一大半。他也不问问设计为什么要那么厚的混凝土。油田道路上走的多是大型的工程车、重载运输车，

还有大型履带拖拉机等，路面必需结实坚固；另外油田的土地原来都是水稻田，南方又多雨，土壤里含水高，按理说筑路时应该铲去较多的土层，铺上厚的碎石道砟。按照这个总指挥瞎指挥修筑起来的水泥路，行车一年多就先是小坑，后变大坑，道路坑坑洼洼，开车的人没有不骂街的。正好是我们经过那里的时候，一个路段一个路段的正在重新翻修，不仅浪费了金钱，还耽误了油田的建设。这种按政治理念不按科学规律搞工程建设，在极“左”政治的年代里，是比比皆是。其实江汉油田经过后来的详细勘探，并不是一个规模大的油田。1970年未经详细勘探，探明储量，就快马大上，最后是盘子做的很大，但是却收获不大，不得不紧缩收兵。虽然这在矿业开发中难以避免，而在那个特定环境里，不能不说也是政治挂帅造成的失误。

回想到那个以政治为中心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做过那么多政治至上、政治挂帅、突出政治、高举政治的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真是痛心疾首。文革之后终究醒悟了，不再做傻事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彻底地批判那些因突出政治劳民伤财的事情。这大概还是因为曾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至今还没有触动到。自然也不会去翻动，讳莫如深的毛的“突出政治”的话题。

难忘的住在窑洞里的一年

1975年8月我们迁校到了武汉，在武汉我呆了大约两个月，就接受了一个任务被派到山西侯马市，帮助当地自来水公司，勘查一个水源地，进行水井钻探工作。和我同去的还有三人，他们都是刚毕业留校的新教师，在校办丹江队干了两年，有熟练的操作技能，和一定的钻探生产经验。

到了侯马先了解了自来水公司他们的要求，和一些基本情况，才知道一切要从零开始，除了先期从我们校办队运去了一台钻机和一个泥浆泵之外，别的一无所有。工人也都是普通的管道工人，从没有接触过钻井工作。我们的任务就是，除了要完成至少一口井的钻井任务，还要培训原有的工人和新招的学徒工，使他们能够进行基本的生产操作。而这只是一年的时间，难度是够大的。钻探需要钻到基岩，深度大约是400—500多米，在水井来说，就算是深井了。我们只能保证钻成一口井，之后就只能视情况而定。确定下任务之后，这才开始定计划，做预算，向公司的上级申请经费。马上开钻，当然不能等经费下拨，只能从自来水公司现有流动资金中先垫付一切开支。而后我开出了需要采购的材料和一般设备工具的清单。钻探专用的设备、器材和工具，我专程回到北京学校里调运了出来。主要有钻塔、钻杆、套管和各种的钻头、专用工具等，整整装满了两辆大货车拉回到侯马。实际上我们带去的所有的设备、器材、工具和耗材都是无偿使用，后来我们离开了侯马，钻机等设备，管材和所有工具，全都留给了自来水公司，算是无偿调拨支援了地方。也因为是在迁校，我们扔在北

京的物资何止这些，后来都给了回收公司，当做了废品。

一切准备就绪就着手定井位平井场、通水通电修路等前期的施工，井场上搭建临时库房和值班房，所有的事情都要我们亲自去指导和监督。即使是这样一个小小的钻井工程问题，也是纷乱繁杂，比不得教学工作那么简单。现在的大学老师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这个时候已经是进入十二月份，快到年底了。为了进行设备安装，我们几个老师和所有工人都要进驻现场。井场工地是在汾河岸上的黄土台地上，是一片麦田，我们住的村子则是在台地下面，高差相对有二十多米。我们住处到井场工地上看似不远，但是只能从村口出去的大路，顺着黄土层被冲成的沟壑斜坡上去，这样绕着得走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没有近路可走。我们四个老师安排住在一个老乡家的窑洞里，我在那窑洞里整整住了一年，就是差不多是1976年的全年。我是第一次住在窑洞里，真是名不虚传——冬暖夏凉。我们工作到临近春节，三个新老师他们都是河南人，家离这里很近，我让他们都回家过年。工人们也都放假，留下值班人员看守场地，我在春节前回到公司招待所住着。

春节的时候，因为我没有回北京，住在了上面公司。公司的领导还有新认识的朋友，看到我一人留在侯马住在招待所里，就东一家西一家，要我到他们家里过年，真是盛情难却。三十晚上公司领导特地招待了一下，初一到初五我都是在各家吃饭，山西是出好酒的地方，山西人也特别能喝，每天都要应酬喝酒，我那时一辈子从来没有那样喝过，过了初五我再也我不敢答应吃饭喝酒，实在是不胜酒力应付不

了。1976 年人们的生活已经不错，侯马位于晋南是山西最富裕的地方。在一个老工人吃饭他告诉我，过去他们这里过年（指的合作化以前），家家户户都要杀肥猪一口，炸货装满缸，酒满瓮，天天过年一直过到十五。他还说“过去我们哪里吃过粗粮，我们这里只出小麦，现在我们要把小麦调出去，返回供应玉米。”我想的确是这样，地域的不同，例如晋北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干旱少雨，如果不平均调配，那里的人永远是过苦日子，永远也不会吃到细粮。

不到正月十五，我们工地就开工了，我又回到窑洞里住着，同去的年轻老师也都从家里回来了。我们开始安装钻塔，然后安装钻机、泥浆泵，配电柜等。虽然这些工人不是钻工，但毕竟不是农民，工程上的活，跟他们说一下就明白了，安装工作进行得很快。至于挖泥浆循环槽和泥浆坑，连接管线，对他们来说那都是很容易的事了。

从 1976 年 2 月初到 10 月底，我们磕磕绊绊完成了一口井的钻井。12 月份全部完成了水井的建井工作。这一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一年中连续的死去了三个伟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刚刚恢复工作约一年的邓小平又再一次下台；7 月 28 日唐山大地震，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10 月 6 日，“四人帮”被打倒，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凡是派”还要坚持极“左”路线，斗争还在继续。这一年我正是住在山西侯马的窑洞里。

春节以后 2 月几号，我们全力投入安装机座、钻塔、钻机、泥浆泵和各个附属设备的工作，工人都是新手，我们也不是有长期生产经

验的工程技术人员；机器设备配套也不齐全，自己又没有专门的后勤供应和库房。不能不拖拖拉拉，一点一点的组配安装，安装工作进行了一个多月。设备全部安装好，按照规程要求进行了测量校正，安装合格，总算顺利完成。试车也都正常，没有出现问题。对一个勘探队的生产机台来说，这安装工作只不过是几天的事情。而我们不行，不少东西需要采购、置备。这期间我还带着公司的人，出差到北京和张家口等地，去采购管材、设备配件、标准件、易损件、机电产品等。在北京家里我都不敢停留，呆了两天就赶紧回到侯马。原先我们运来的只是钻井的基本设备，像配电柜、泥浆搅拌机、人员升降机都需要采购或定制。安装过程中，等这些必需的配套机件就需要不少时间。例如所需钻塔固紧螺栓好几百个，在侯马就买不齐，要买好足够的螺栓才能安装起钻塔。

到3月多我们才安装好设备，开始试车运行。先手把手地教给工人操作运转，熟悉各项工序，仔细的给他们讲解操作规程，和安全事项。我们是异常小心翼翼，每一个工作环节和工作岗位，我们都在一旁悉心指导和提醒。正式开始向下钻井后一切都还顺利，工人逐渐熟悉了自己岗位的操作。上部表土层用小口径钻到钻到40米左右，我们停下来再扩大井径，准备下入保护井口十几米的井口管。由于只注意了工人的操作，没有注意到在黄土层钻进，洗井的泥浆里没有及时兑水，泥浆变得过稠，发生了泥包卡钻。工人开动绞车使劲向上拉，拉力过大把钻塔顶部一层的立柱拉弯了。没有办法只有把钻塔的最上层拆下，找到一家大的机械厂，配到一段相同规格的角钢，钻孔加工，

更换了立柱，重新安装好钻塔顶部。置换钻塔立柱耽搁了很长一段时间。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我和公司的项目负责同志一起出差到太原。他到省建委去要钱、办事，我则到省地质局，找到人打招呼，在必要时请求给予支援。地质局里有不少我们毕业的学生，真有事找他们，看在母校和老师的面子上，他们也不能不给一些帮忙。

在太原正是3月底的时候，快到清明节，我到人民广场看到了四周摆满了花圈，太钢工人甚至做了铁质的花圈，悼念周恩来总理。解放纪念碑上还贴满了悼念的诗词，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那首，传抄自天安门广场的，现在已经是经典的无名作者的诗：

欲悲闻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英杰 扬眉剑出鞘

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表达了人们对于那些江青等极“左”分子的鄙视和愤怒，对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怀念。那时候还没有指出“四人帮”分子，但是已经看到他们是一个反总理的集团。4月5日他们恼羞成怒，迁罪于邓小平，宣布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在全国掀起“打倒右倾翻案”狂潮，大力批判右倾翻案风。以中央名义动员小会学习，大会批判，人人检查，端正思想。我正好在山西钻井现场，无缘参与这一切，算是逃过灾难。

我还想起2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临汾到临汾钢厂寻找下井口套管的粗径钢管，住在临汾市招待所的楼上，看到楼下院内，有招待所服务员照顾着，坐在藤椅上一男一女两位老人，胳膊上还戴着黑纱。别人告诉我那是杨尚昆夫妇，听到总理去世，两位老人在屋内大哭一

场。他们都是总理的亲密战友，在腥风血雨的时候，也是总理保护了他们这一批人，把他们疏散到全国各地。总理的噩耗能使他们不痛哭流涕吗？我也想不到大约十年后，杨尚昆还当上了国家主席。

从太原办完事，立即回到侯马，这时候钻塔立柱加工好，置换了变形的钻塔立柱。赶紧启动钻机、泥浆泵把稠泥浆和泥包冲开，把钻杆、钻具从井内提了出来。因为是井浅，井内事故处理没有什么麻烦，很快就处理完毕。然后扩井到井底，把井口管下到预定的深度，固定好井口管，在井管外四周浇灌上水泥，封住井口防止井口坍塌，好保证向下顺利钻进。

我们又重新强调了各项技术要求，恢复了再用小口径向下钻井。从 40 米井深再继续钻进，一切都还正常，由两位年轻老师盯着，三位年轻老师中有一人回到武汉，有两人留了下来。我还去了霍县、洪洞，找到煤田地质勘探队，了解他们在我们现在钻井的附近，钻过一口水井的情况。那是他们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五七干校”钻的一口供水井，这井钻到了基岩，而且是获得低温的地热水，钻井深度大约 600 多米，他们给了我钻井的地质柱状剖面图，我心里有了底。但是又同时担心钻这个深度，难度和风险很大，怕是完不成任务。

5 月份继续向下钻进，还比较正常，由武汉学校我的老同学金希华带着几个实习的学生来到这里。不久，两个年轻教师也都回了武汉。学生在这里实习了近两个月结束回校，金希华留了下来。到 7 月我们磕磕绊绊用小井眼钻到了 400 米，正发愁再继续钻下去，钻杆不够了，通过关系解决了约 100 米钻杆用的无缝钢管，找到在侯马的冶

金地质勘探队，加工了钻杆丝扣，还好，我们带来的钻杆接头还有富裕，井可以打到 500 米。正当钻到 400 多米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井内事故，钻杆折断在井底附近，岩心管的上头，这个事故处理起来非常麻烦。幸而反转取上来大部分钻杆，剩下一小段，向冶金地质勘探队借来反丝钻杆，把下面的打捞了上来。处理完这个事故，我们先停下来，检查一下我们已经钻过的地质情况，如果能有好的含水层，就不必再向下钻了。我和金希华商量请山西水文地质队做一下电测井的工作。金希华就探亲回北京，如果不再继续向深部钻下去，他就不再来了。

为了送金老师，公司从市里借了一辆小车，有公司里两人陪着我和老金，去了黄河禹门口玩了一趟。禹门是吕梁山两山峰之间的一个夹缝形成的山口，黄河从这个山口奔流而下。相传是大禹治水时，为疏导河水。用大斧劈山打开缺口，使河水泄下，治理了洪水，因此称为禹门口。我爬上了山顶，上面有一个小庙，正是禹王庙。从山顶向北望去，黄河河道在山谷里很窄，大约只有几十米宽，蜿蜒曲折被群山挡住。向南望去，河水从山口奔流而出，立即扑散而开，形成许多支流，河床陡然宽阔无比，约有二十余里，主河道从高处望去就是一条反光的白带子。每次洪水泛滥河道就来回迁徙，所谓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正是这里。我循着山脊向北走了一些，看到黄河在狭窄处真是奔腾湍急，我不由得想起《黄河颂》：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惊涛澎湃，

掀起万丈狂澜，浊流婉转，结成九曲连环……

我也情不自禁地唱起了这首《黄河大合唱》里的颂歌。就是这样看了一眼，真正体会了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的伟大，她的两岸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她哺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它见证了抗击侵略的英勇斗争。我真感不虚此行，虽然只是一瞥，我却始终难忘。

后来我去了一趟礼元，找到山西水文地质队，请他们帮我们测井。他们一口答应下来，并说这是他们应该做的，不收费，他们能得到这个地区的地下水的资料就可以了。他们让我们等着，他们排好工作日程，约好了日子就过来。这时候自来水公司又从某一地质队，调进家是侯马的一个钻工，担任副机长（已经有一个党员当着机长）。总算有了一个可以完全负责的领工，我就可以轻松的多了。

水文队电测的结果使我喜出望外，我们穿过了几层水量可能不小的含水层，它们都是相邻的可以一起采用。后来我们又取了水样，做了化验分析水质也不错，是很好的饮用水。我们又何必舍近求远，非要钻到基岩呢？我和公司的人商量现在获得的水量是足够的，水质也很好可以不再继续钻下去。如果继续向下钻，除了我们的技术力量难以保证之外，我们的钻杆也还不够，所需的套管差得很多。还要想探明基岩的地下水之后，等再打几口取了这上面含水层的水之后，锻炼了队伍，准备了足够的器材，再探明和开发基岩水层。公司同意了这个意见，我们就一方面准备从井口管以下扩井；另一方面按测井的曲线，着手准备下入取水用的永久井管。

开始扩井不久，7月28日突然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向机长交代了一下继续扩井的工作之后就赶紧赶回北京去了。心急如焚地回

到了学校，看到了所有的人，都住在楼外的临时搭建的抗地震棚里，我们家也由系里留守的同志搭起了抗震棚，安排的很好，大人和孩子们都平安健康我也就放心了。进入了八月份，天气逐渐转凉，我们几家就合作搭建起可以过冬的比较严实的抗震棚，学校提供了部分建设材料，自己也买了一些，总算建起了一个稍好点的蜗居。这样我可以放下心来，回到山西我的岗位上。正在这个时候 9 月 9 日毛泽东去世，全国哀痛，似乎是天塌地陷。各部门各单位都是操办着布置灵堂悼念的活动，我爱人徐宏勤是小学校的领导，忙的也无暇顾及家里和孩子们，我又拖延下来，不能立即回到山西。过了一段时期平静了下来，小学也开始恢复了开学上课。幼儿园还没有恢复开园，儿子已经六岁是大班孩子，即使幼儿园开园，他也需要退园，我们只好决定由我带着孩子去到山西，等到春季开学上一年级。我不能老在家里看孩子等到开春，不得已只好把孩子带着走。不少单一去了武汉的男职工，也只有这样带着孩子回到武汉上班。

孩子跟我一起到了山西侯马，住在窑洞里，很是高兴。有时随我到工地现场，那是耕田里开辟出的一块工地，由他跑着玩儿，还经常有在作业空暇时的工人逗着他玩儿。有时候留在村子里和房东的孩子们一起玩儿，摘酸枣，啃嫩玉米棒子，整天玩的一点也不想他的妈妈和姐姐。10 月十几号的一个早晨，我还在窑洞里没出门，他突然从外面跑进窑洞，喊着对我说：“爸爸，爸爸，你快出来听，大喇叭讲打倒了死人帮……”。我出来以后才听清楚了是“四人帮”，江青一伙儿被揪出来打倒了。真是大快人心，广播里报道出来，举国欢腾。村

子里也放了鞭炮，我们工地上也洋溢着喜悦的心情。

我从北京回来后，就按着山西地质局水文队做出的测井曲线，设计了井眼下部的过滤管组合，然后加工制作过滤管，一方面准备井管的隔水和封堵材料，另一方面在工地上按照各个含水层的位置配管编号，这些工作要非常认真细致，一点也不能有差错。自来水管厂的工人倒是懂得这些，我只要交代清楚了就知道怎么做。整个下井的套管都要逐个反复地丈量编号记录，按次序排放在井口前场地的地面上。下井前泥浆保持着循环，然后再次再下入井径探测短管，全部井身没有丝毫阻挡，这才可以正式下入井管。我是教书的，虽然都知道怎么做，但是做这样技术指导、技术监督、现场指挥的工作还是第一次。幸亏这些自来水管厂的工人没有打过井但是经常修井，调来的钻工领着干，一交代他们就明白应该怎么做，比起生手的农民工还是强得多了。

一切都准备停当，没有问题需要立刻下入井管，不把井管下到井内，耽误过久就会出事故，我的心是始终悬吊着。第二天准备下管，我把孩子安排好托人照管，下管作业十几个小时，遇到麻烦可能一天一夜，我一分钟也不能离开工地现场。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细致，井管下得很顺利，完全在白天只用了十个多小时，就把井管下到了预定的地点。固定了管子之后，然后又是紧张地从井口向井管外四周填塞隔水、封堵材料。静候凝固，只需要少数人值班看守。其他人都是可以下班休息了。我们所有的人像是经历一次战斗，战斗结束，身心完全放松了下来。但是我还没有看到抽水的结果，这口井成功与否还是未知数，我还一点高兴不起来。

过了三天等候到井口凝固封堵好，我就要工人开泵循环清水，替换泥浆、洗井，后来出来的清水量逐渐增大，我高兴了，心里有了底。这是能够出水的一口井，钻井成功了，我们将近一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这是一个没有很多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领着一帮没有打过井的工人、农民工，独立地完成了一个工程。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认为我证明了知识分子不是无用，说什么“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那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我们这些学工的绝不能只会说不能干的，如果不会干，到了实际工作中，没有人听你的，还当什么技术员、工程师？那些贬低知识分子作用的言词，是闭眼瞎说。建国以来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哪一项没有知识分子起到的关键作用。

接下去的是用空气压缩机进行抽水试验，确定这口井的出水量。这项工作正是自来水公司工程队的业务专长，我可以完全不管了。借着他们做这项工作的期间，我带着儿子去到武汉学校，向系里做了汇报，听从系里最后收尾的指示。在武汉呆了大约一个多星期，就又回到了侯马。回来后看到了抽水试验的结果，这口井的日产水量大约是50吨左右，是一个产量不错的水井。证明这是一个前景不错的水源地，有进一步开发的潜力。我写了一个总结报告交给了自来水公司，算是完成了支援侯马地方发展的任务。我们没有收取他们任何的费用，临走还把全部设备移交给他们。这些设备当初校办队时，国家调拨给学校的，校办队撤销，这些设备器材在学校里不会再发挥作用，学校正在迁校建设，无处存放。索性给了人家，既做了人情，还避免了丢弃的浪费。

这时候已经过了 1977 年元旦，春节即将来临，我办完了一切手续，自来水公司和钻井队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我就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孩子在山西和我呆了差不多四个月，孩子整天在窑洞外的院子里，或是钻台现场，晒得黧黑，穿着窑洞房东大娘做的棉裤，就像农村的小孩。他妈妈见了一惊，但是健康结实，高兴的不得了。山西的将近四个月，至今给孩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这就是我住在山西窑洞里一年所完成的，对社会对人民一件有益的事情，虽然辛苦劳累一些，也没有显赫事迹，但是干了实事，锻炼了我的实际工作能力。没有政治活动，没有“阶级斗争”，对我来说没有浪费生命。

我的科研 总是围着试验台转

我开始接受科研任务，那是 1958 年前苏联专家建议，搞一搞铸钢钻粒钻头的试验，教研室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我跑了一趟上海，托关系在一家重型机械厂做了几个铸钢钻头的毛坯，有环状空心的，还有实心的，回来后再加工成环状的和全面的钻粒钻头。做钻头试验，就是用它在钻进试验台上实地钻进，根据钻进的效果做出评价。当时为教学，钻探实验室已经有一个简单的钻进试验台，但是不符合苏联专家提出的科研要求，于是我就参与和实验室的同志一起，改装和完善可以用于科研的钻进试验台。我们把手动钻机换成大能力的油压钻机，增加了钻进试验样品花岗岩石块的吊装设备，配备了一些测试仪表。这是我第一次地涉及建设试验台。建设这个试验台，主要工作是实验室的同志搞的，我做为想使用它，参与了一些工作。这次试验台的建设，除了在室内更换和安装钻机，配置测试仪表外，就是反复调试，使钻进设备和测试仪表连接，满足钻进参数测试的需要。

这个试验台安装好以后，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完成了铸钢钻头的钻进试验；系副主任屠厚泽在上面完成了全面钻粒钻头钻进的试验，试验结果写成论文，通过苏联专家还发表在苏联的探工杂志上；还有的人完成了确定铸钢钻粒淬火参数的钻进试验。试验台同时它还肩负了教学的钻进实验。和以后所建的其它各种试验台相比，它是既简单又实用。

再一次的搞试验台是 1959 年底，严格说是搞一个综合性的样板，自动化钻进生产性试验机台。大跃进的高潮促使了北京市各行各业，

掀起了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浪潮。特别是动员全体青年，大搞超声波技术应用和推广，团市委还举办了超声波的应用展览。学校里的食堂厨房大搞超声波煮饭、炒菜、清洗厨具餐具，探工系学生研究超声波搅拌泥浆，超声波粉碎固体物。一时期闹得沸沸扬扬，学校里弄得乱哄哄。学校领导想正确引导，也为了表现学校在技术革命运动中不落人后，要求工科探工系，搞出探工领域的技术革新的样板。机械教研室承担了油压钻机设计与制造的任务，钻探教研室承担了实现钻探机台操作自动化研制任务，这项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

1960年一开春，我就出差到湖南南部一个地质队，他们搞成了一个钻探升降工序自动化的装置，我去参观取经，临走时要了他们全套的图纸。回到北京，我们仔细研究和消化他们的图纸，着手设计我们自己的自动化钻探机台。受湖南地质队技术革新的一些启发，我们又做了很多的改进，使自动化程度更高一些。主设计就是我一人，图纸完成后，校机工厂负责加工零件和机件，拿回我们实验机台现场组装和安装。在现场配有四、五年级的同学五、六个人，他们主要从事自动化装置的安装，制作电磁铁，钻塔上下的走线，定位和调试的工作。我们整体的钻探操作自动化系统，包括：使用油压钻机把液压数转换成电量的显示，钻压自动操作和检测系统，钻杆拧卸手动变为机械操作系统，塔上无人扶管、摆管，自动提引系统，钻杆提升高度定位和限位系统，安全报警系统等等。我们从4月份，马不停蹄地日夜加班加点。大热天在钻塔架上爬上爬下，忙到了9月底，赶上向向国庆献礼。国庆前我们总算在众人的监护下，凑凑合合试车成功，这

种赶任务匆忙完成的技术革新，还自我夸大叫技术革命，其实技术粗糙，水平低，不稳定，谈不上实用和推广。当时大多数的技术革新也都是差不多这样。

国庆之后，在我们实验室前的的场地上，由校领导、系领导陪同地质部探矿司、教育司、科技司，和北京市、高教部有关领导来我校参观、检查。我们将完成的各项成果，做了示范表演，参观者给出了礼貌的赞许和鼓励，领导说了一些官样的套话，勉励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我们的示范表演基本上没有出漏子，给足了院领导和系领导的面子。我们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休息了好几天。然后把拼凑起来的一些仪表器材，电工设备，实验室的器械工具，归还到原来借出的地方。这次钻探自动化试验机台的展示，最终就是做了一次表演，我们的辛苦努力也就万事大吉了。1960年10月底北京严峻的食品紧张，人们吃不饱的懒慵，情绪低落，使所有的活动都停止了下来。我们也无法顾及，扔在实验室外场地上的那些自动化、机械化的装置和器件了。一个秋冬的雨雪和风吹日晒，除了钻机、泥浆泵、电动机、钻塔、钻杆等基本设备外，我们加工的那些器件、部件、电线、各种开关，都成了一堆破铜烂铁。

你说是浪费吗？不只是我们一家，大多数大轰大嗡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的命运都是这样，这也是大跃进的后果。但是我个人倒是有了收获。我没有交学费，没有人教，而从实践中学到了机械设计、机械加工、电工操作、电器安装的知识和技能。我扩大了知识范围，同时也加深和扩展了本身的专业领域。正是有了我这一次的实践基础，

我又不断地一次又一次的接受，试验台的研制任务。

三年所谓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学里也都比较安稳的学习上课，可也基本上停止了科研。国家经济刚有好转，接下去的是反右倾、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来更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不断革命、继续革命，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什么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统统扔到了一边，不要说科学研究，连中国科学院都似乎要砸烂。

1973 年，我们也都从干校、校办队回到北京，学校里没有学生，没有教学，我们无事可干。地质部张家口探矿机械厂，找到我们系，请求帮助设计和建造一个钻机的测试试验台，我们正在闲呆着，从系、各教研室主管到下面的老师，都一致同意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们组织了有近二十人的团队参与了这项工作。经过广泛调研，反复讨论，与厂方研究确定下了，钻机测试试验台的方案。厂方要求是整体动态测试，我们就分成了提升力加载，扭矩加载，试验台整体机座，提升井架和地下小圆井的载荷上下运行系统，各项测试仪器仪表系统。按参加同志各自特长，认领了任务。

我承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设计项目，有：25 米深 3 米直径的竖井（小圆井）、20 米高度的井架，及从天车到井底的贯通导轨，装载加载砝码重块贯笼的设计；台板下可进行钻头实钻钻进的峒室设计；承受钻机固定的铸钢台版及其混凝土基础的设计；试验钻机上方承载桁架的设计；绘制配重运行速度曲线的机械部分设计，所有的转弯滑轮、复式滑轮组以及天车的设计；室内外的运行指示系统；超速报警和制动系统等等。总之我做的都是试验台的整体连接、配套和加载物

运行的设计，是固定受测试钻机和连接各个测试项目的基座的设计，有土建工程、钢结构件和多项的小机械加工件，多个电控小元件（行程开关、限位开关、限速机构）安装设计。大多数的同志则做的是各种仪器仪表的具体选型、匹配设计；测试元件的调试以及仪器仪表的连接和安装；或是在实验室做先导性模拟试验；还有人具体制作控制系统、绕制线圈、焊接线路、制作控制柜和操作台；与厂方采购人员共同选购电器仪表器材，甚至是亲自出差，跑仪器仪表厂提要求、订货。搞仪器仪表的门类多、人数多，分头进行。我做的是粗重的的设计和制造，需要和工人一起安装和调整，还有土建工程，需要施工监督。多数同志都是在最后阶段前往工厂去忙，而我是自始至终都在那里忙，经常往张家口工厂里去跑。

1973 年我们接受了这项任务，经过近半年的调研、讨论研究，半年的设计画图，年底交出了设计图纸，工厂方面一年就完成了机械加工，土方工程，混凝土基础工程；完成了竖井建设；把试验钻机固定到机座；几百米的钢丝绳穿绳到位，缠绕到了钻机绞车上。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圆满。1975 年 5 月，我们的大批人马到位，开始做各项测试工作的仪器仪表安装。我们边调试边安装，各项工作做得也比较满意。这正是 6、7 月份，我们回北京休整了几天。在北京我们突然接到了通知，中央教育改革委员会命令，我们必须全校无条件迁往武汉，立刻准备搬迁，所有人员没有例外。湖北省革委会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北京监督执行。我们承担的张家口探矿机械厂，钻机测试台的建设任务也必须暂停下来，可以等到了武汉以后，再派人回来继续完成。

现在一切都必须服从迁校任务。我们都人心惶惶，需要安置家庭后事，夫妻是学校双职工的，还要举家搬迁。

我们参加测试台建设的人员，不愿留下一个尾巴，想赶紧完成任务结束工作。在北京没有停留几天，马不停蹄地赶回张家口探矿厂，忙着进行调试，对钻机进行测试运行。在测试过程中有厂方的技术人员共同参与，掌握操作，熟悉程序。最后厂方的技术负责人逐一看了测试项目的运行。不能说是验收，但也就是这样把测试台移交给了厂方。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连一个总结报告都没有又来得及写出来，更来不及写出操作规范和操作程序，没有制定出测试记录格式。匆匆忙忙做了一下测试演示，就算是交代了。我们也是心急如焚，北京的家里还在焦急等待我们赶紧回来，收拾行装准备搬迁。这就是“文革的作风”，迁校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对抗迁校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1975年9月我们全院能够搬迁的，遵照命令，乘着铁道部直接调配的专列浩浩荡荡地开赴到武汉。

五年以后，大约是1981年，我出差办事再次来到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看到我们建设的钻机测试试验台，20余米高的提升塔架完好地矗立在厂车间厂房外的场地上，感到很亲切。最初他们用它做了几次只是简单项目的测试，后来就完全闲置没用了。一方面是我们没有最后完成编写测试报告的文字说明，人家无法进行详细的各项测试；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生产任务有了变化，钻机的生产数量大大减少（国家对勘探队不再实行无偿的固定资产的分配），勘探队不再无限制地领取钻机。那时候勘探任务也在缩小，钻机的生产比较从容，不

需要做详细地抽检测试。

1979 年我结束了山西的打水井的钻井任务，回到了武汉，地质部科技司，接受一些专家的建议，要加强金刚石钻进岩石破碎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我们探工系和部的勘探技术研究所，共同研制一个钻进试验台。这时候我们已经搬迁到了武汉，系主任屠厚泽，同时他又是岩石破碎科研组的负责人，把这一项研制任务交给了我。双方的领导和我及勘探所参与研制的白继胜，开了多次的会确定下，要建一个液压驱动和液压控制的钻进试验台。一是不直接使用钻机，没有庞大笨重的身躯，二是没有变速箱，还可以实现无级变速地驱动，三是使用电液控制，操作集中方便。设计方案定下了，我们就收集资料调查研究，1979 年冬—1980 年春，我和勘探所白继胜，他也是我的学生，集中精力完成了主体设计，双方的负责人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审查通过，

1980 年 4、5 月我们带着设计图纸来到苏州探矿机械厂，地质部探矿司安排在该厂给我们加工制作。我们和工厂的师傅们共同研究，没有了问题，他们接受了这项加工制作的活。制作经费到位，外面订货的液压马达液压泵和各种液压元件到达之后，工厂 1981 年开始了钻进试验台的加工制造。1981—1983 年，我和勘探所白继胜及刘志方连续三年，每年两、三个月来到厂里，驻厂解决制作加工中出现的问题。这和五年前在张家口探矿厂不同，那时有张探厂的技术人员参与设计制作，我们不在场他们负责盯着，而这一次我们是自己完全负责，任何一个加工制作中的大小问题，都需要我们拍板定夺，液压元

件、电液控制元件的选定，都需要我们亲自到原厂家和销售商家敲定选购。我们不在他们就把我们的活，停下来等待，厂里的技术科不管此事。

在这一次的设计制作试验台的过程中，我又学到了液压技术的知识，特别是电液控制。我们用了液压马达、液压泵、多个液压缸，控制主轴的运转、调速和主轴的上下移动、加压，机身的前后移动。我们把电磁液压阀，组合连接在一起，制作了两个控制台柜，一个是仪表显示和电钮控制台，一个是电磁阀组合柜，这些都是我们在现场和工人师傅，共同研究商议制作出来的。试验台加工制作好了以后，我们在工厂的加工车间试运转，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试验台同样的做了三台，一台是北京勘探技术研究所的，一台是我们学校的，还一台是成都探矿工艺所的，勘探所的一台他们运回了北京，我们学校的那台，我一再询问屠厚泽是运到北京还是运到武汉，他也确定不了，就一直放在苏州的厂里。成都后来也无人负责，因为他们没有人直接参与研制，他们又是后追加的，厂方就给他们停止了加工制作。厂方一再催促我们学校，我无能为力来处理，只好扔在了苏州。因为这是地质部科技司直接拨款给苏州厂的，没有学校财务部门的事，我也无需报账，而运输和安装的钱却无处可出，我弄不回北京。做出来的东西，拉不回来，问谁也不管，厂方就当做废品处理了。这又是一次搞科研所得到的结果，白忙活白辛苦三年。

这里也有两个具体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迁校，北京没有地方来放置我加工的试验装置。校内原有的机械设备还卖的卖，扔的扔，

更不能为这个装置再建设专用场所；再一个原因是科研的方向变了，不再搞苏联式的空对空的理论研究，强调科研成果的经济效益，岩石破碎的理论研究都停止了，各学校各研究所的岩石破碎科研组都撤销了，而早在我完成的试验台制作之前，屠厚泽应用一台小型的由钻床改装的钻进试验台，完成了一些验证岩石破碎理论的试验，发表了几篇文章，他的岩石破碎的课题研究也算交了差，那我所搞的这个试验装置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北京勘探技术研究所拉回来的那个钻进试验台，也因为岩石破碎课题的研究停止，从来也没有使用过，独占一个机房的摆设。

1984年原北京地质学院又渐渐铺开了摊子，李世忠教授申请到一个微机控制金刚石钻进的科研项目，动用了在京钻探教研室的大部分的人力。又是一个首先要建成钻进试验台，再把微型计算机与钻机连上，实现电脑控制。初期钻进设备的改装和平台的建设，动员了相当多的人力，而钻进参数的检测及连接电脑，编制控制程序等关键环节，只有懂得电脑和非电测量的，李砚藻和研究生们少数几个人，李世忠本人也不太懂，但他是带头人。因为众多人物的参与，最后评审通过获奖，为争排名名次闹得不可开交。.

我和戴学恕都还是懂得一些非电测量技术的人，开初曾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检测元件的选型，受李砚藻的托付，我和戴都分别给他们跑过寻找合适的位移传感器、光电测速传感器、步进马达、同步运行的自整角微电机等，戴还帮他们拟定了，巡回检测采样的间隔和实时采样密度的安排。张探厂那个试验台的采样检测程序，就是戴学恕设计

的。他们这次是微机控制的钻进参数的实时采样，比我们当初钻机特性参数的检测复杂得多，那时候还没有微机，采样只是单项一项一项进行，采样用的是自己制作的单板机。但是原理是和微机（电脑）一样的。后来我和戴两人看到参与试验台项目有那么多人，我们自觉地撤退了，不再掺乎。

按说微机控制的钻进试验台，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钻进是一个多变量的控制系统。可控参数即可控变量有，钻压、转速、泵量。指标变量即目标变量有，钻速、进尺、转矩、切入量/100 转等。改变可控变量，目标变量就随之相应跟着变化。用微机控制钻进可以采取多种模式，有：定钻压控制，钻压转速实时调整的定钻速控制、定转矩控制、定切入量控制、技术经济指标的最优化控制等等。这样一些控制模式的试验，对于研究钻进理论是极为有意义的。然而这个试验台建成之后，当众表演，验收完毕，就束之高阁，没有再进行任何钻进的实验研究，更没有进行多模式的钻进试验。似乎建成试验台本身就是达到了目的，至于试验台去怎么用，就没有下文了。十几年过去了，原来的钻探实验室拆掉改成高楼，微机控制的钻进试验台不见了踪影，十几个人几年辛苦的成果，几十万元的资金付之东流。这个试验台，和我以前所搞的三个试验台得到了同样的命运。只不过这个试验台经过了验收通过，并获得了科技二等奖，参加研制的有些人获得名，有的人借此提升了职称，排名前几名的获得了较多的奖金，多数的人喝了一点汤，也有的参与了一些工作，结果是无名也无钱，怨声怨气。这项科研本来是可以做得很有意义的，但是却没有做出有意

义的结果。

我一想起试验台就是一个心结，不只是我们一个学校，大多数高等学校的科研结果不都是这样么？就是那么一点的科研经费所获得的科研成果，大多数也转化不成一点经济效益，倒是培养出一些哗众取宠、自吹自擂、弄虚作假的方士出来。

李世忠这项探工系兴师动众的科研—微机控制的钻进试验台，我也曾擦边地参与了一些。至此我的科研活动，总是围着试验台转，这也是我这一生的一个最大的悲哀之一。

我和我的学生

2011年7月我带的几个现在在北京的研究生，和我相聚了一次。为首发起者刘国平自从毕业以后，总是多年在国外承担着工程建设任务，现在完全调回国内，稳定地留京工作，想邀请几个在京的同学和我聚一聚，师生们叙旧一下，联络感情。席间他们议论开来，谈起他们最感谢老师的话题。他们说老师给了他们最宝贵的，不是那些具体的专业知识，而是给了他们方法，培养了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说道，我对他们非常宽松，对他们的思考不给限制，不设框框；在知识上不给他们局限在狭窄的行业的专业里，而是延伸到边缘学科，扩展将来的应用领域。所以他们说，我们大部分人并没有直接从事钻探本身，但是我们学到的东西是有用的。

我开始招研究生是在1984年，83年我提为副教授，第二年开始带研究生。最初使我为难的就是如何给研究生定课题，在他们选课阶段我就仔细琢磨，我第一个研究生就是刘国平，当时戴学恕老师有一个科研项目是井下液压冲击器工作状态的评价，我就和戴商量让刘国平参与信息采集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对所采集到的震动信号做频谱分析，就可以做出对冲击器工作状况的准确评价。这个选题也给了我一个启示，我既没有脱离了我们专业领域，但是又提升了我们专业的研究水平，这使我在以后的研究生的选题上，开拓了新的思路。

我同时招的另一名研究生王玉波，石油学院钻井专业毕业的，我给他选的课题是油田地层的平衡钻井，而重点是落在油层的油气压力预测上，他去到一个新的探区收集已完成的电测井资料，和部分的岩

心物性实验数据（岩石孔隙率、渗透性）计算和预测油层的油气压力，他的论文做得很好，这是一个比较难的选题，我校石油系的油田地质教授给了很高的评价。他也是用了数理统计，和数学物理方程的计算方法做出预测的。刘国平和王玉波他们论文的答辩都获得优秀的成绩。

对下面后来的研究生，我也是分别介绍他们到油田实习、收集资料，他们到了现场受到了极大的支持。陈龙对华北油田做大量的钻井参数和技术经济指标的统计，建立钻井参数的数学模型，做出钻井参数的最优化选择；张志宏对东濮油田钻头损坏与钻进参数、地层因素相关数据的统计，建立它们之间相关的函数关系，找出改进钻井工艺的措施；张宏对南阳油田井斜规律与岩石地层影响因素的函数关系，提出控制的对策。这类的题目都是很大，需要大量的研究才能有真正的成果。而我主要是让他们掌握方法，用数据去分析，去解决生产实际问题。当然数据量过小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是他们的学位论文毕竟不是科研报告，关键在于使他们掌握科学研究的方法，获得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们回忆起来，这才是对他们毕生都是有益的学习成效。这些研究生所有的论文评议，我都是找了石油钻井研究所、部里的石油局，石油大学、我校的石油系、计算机系和数学教研室的专家们评议的，都给出了很好的评语。也使学生们感到自信。论文答辩都是优和良的成绩。

1986 级的研究生陈文轩选的更是一个难度比较大的课题。他在吉林油田实习收集资料，那里钻井井斜比较严重，采取了组合加重钻具防止井斜，但是需要比较准确的去计算钻具的长度，和控制钻压的

多少。但是现场只能按经验估算，怎样准确计算，是比较复杂的力学计算问题。他先是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先使用美国人鲁宾斯基的公式，又使用了中国专家白家祉的公式，都不适合吉林油田的条件，再参考了别家的公式拟定一个新的公式，反复进行了计算比较，找出较为符合实际的计算公式。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他还是解决的比较好，完全可以是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也就是说他的论文基本达到博士论文的水平。整个公式建立过程需要运用弹性力学，梁加柱的计算，而后还要加上动态离心力的边界条件，编成一个微分方程组，再去求解钻压和加重钻具长度。仅是上计算机去计算，都需要运算很长时间。而算出来之后做出表，可以按照各种条件，查出钻具长度和钻压的多少。这是有一定实用意义的。论文也是被评为优秀论文。

以后我又招了几个在职代培的研究生，他们都是探矿工程研究所或石油局的，本身有课题又有研究经费，我带起来就省事多了，研究所里更是有良好的实验条件。而我所要抓的主要是论文的水平，和理论的阐述。与科研报告还不完全一样，科研报告可以写的简明扼要，而要附带全部的试验数据，论文则不需要。探工研究所来的学生贾军、刘广辉、何远信，都是钻探泥浆方面的研究人员，他们的课题有钻探泥浆处理剂、地热钻井耐高温泥浆、矿渣固井水泥的研究，学位论文和科研报告都得到双通过。他们既得到科研成果，也完成了学位论文，

在职的其中一个从生产单位，地质部石油地质普查大队来的研究生董振国，他可以比较容易得到钻井的原始资料（岩心录井、电测录

井、地球物理勘探资料)，我帮他拟定了一个预测勘探区内的，油气富集地区的专题研究。这倒不是科研项目，但可以为探区提供一点布井方向的指示。这是与他们石油普查大队总工商定的一个探索性课题。实际上已是属于油田地质方面的范畴，他也正好是学石油地质勘探的。这是综合运用钻井工程、油田地质、物探测井的资料做出一个三维等高模型，圈出峰顶区域，预测油气的富集区，但是因为新探区探井的数量还是太少，预测的集中性不高，只能做一点参考。石油局的总工对这种研究方法评价还是很高的，论文答辩不错。

我的最后一个统招的研究生汪火旺，对钻井冲洗液的研究很感兴趣，他自己选择了一个课题，用磁化水配制泥浆的研究。我告诉他前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基本是否定的，他说他知道，他想进一步证实一下，究竟为什么不行。我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同意了他课题的选择，我说，这种试验只能完全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做，不可能到现场了。我没有很多的研究经费，不能购置设备。他认为他还是可以完成这个课题的试验研究。他先找到中科院永磁材料的研究单位，了解到无法应用永磁的强磁场磁发生器，即使做出来成本也极高，他继而寻求电磁磁场发生器，终于在钢铁学院材料系找到他们自己设计制造的，交流变直流的磁发生器。他向钢院的老师请求帮助，老师看他很实在，很认真的研究精神，同意把设备借给他使用。他在实验室里日以继夜重复地做着，用普通水的、蒸馏水的磁化水；磁化后新鲜水、陈化水等等，各种不同条件配制泥浆，同时还做了改变磁场强度（高斯值）和直接磁化泥浆的试验。他做出了厚厚的几十页的数据记录。我发觉

这个学生是有着可贵的坚韧的研究精神。他的论文得出了比较准确的结论。概括起来就是：在强磁场条件下可以配制出优质的泥浆，但是不能保持稳定；水的质量是关键，纯净水磁化配制泥浆是好，但是不现实，成本太高，水的矿化度高，不能很好的磁化；在现场条件配置大功率磁发生器是不可能做到的，磁化水不能予先生产好，磁化水很快就会退磁；粘土的成分也极大地影响磁化效果，如果是劣质土无论如何是达不到磁化效果的。尽管这是一个学位论文，做的很好也很认真，用大量数据做出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但是结论是否定论文开题的目的，是选题不当，不能得到优秀论文的评价。我感到遗憾，在选题上过分迁就了学生，反而影响了他论文的成绩。但是他确实是一个好的科学研究人才。答辩会评委们也还是赞许他的严谨的科研态度和认真地科学精神，论文仍然是良好的。

回想起来学生们，况且现在他们个个事业有成，对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我细想了想，我的教学和为人方面，对学生或许是起到了一些有益的影响。可能是以下这样一些方面：

1. 我不只是教给学生们具体的专业知识，而还有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例如，我为研究生开的课程《钻进基础理论》，我把钻进描述成为一受多变量影响的动态过程，再把影响因素分解为可控的和固定的。我们就是着力于可控因素——钻进技术参数的调整。这就是把我们最常遇到的技术问题，提高到理论水平去分析和研究。

2. 我教给学生把影响因素的变量，和我们想要达到的控制的目标——技术和经济指标，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用数学回归的方法，

找出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起多变量多目标的数学模型。再简单化一些，以钻速为目标的函数关系，称之为钻进方程。这样就把复杂的钻进过程，处理成为一个数学表达式——钻进数学模型。

3. 经济性是工程的核心问题之一。质量、经济、安全是工程追求的基本目标。我对学生特别强调经济（包括速度和效率）的概念，因此我在给学生们建立工程的最优化的理念的时候，以单位成本最小为最终目标。单位成本最低是工程最优化的基本目标函数。我培养研究生不是以培养一个工程的实施者，或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操作者为目的，而是培养一个决策者和组织者为目的，必须要有清晰地经济头脑，和全局的观念。

4. 我让学生们关注与我们专业有关的边缘学科和前沿性学科，让他们在外校选修《控制论》、《模糊数学》、《流变学》、《理论化学》等。让他们在外面听课，不一定非要拿到学分。我介绍他们的参考书都不是我们专业的书。专业的书大多是技艺方面的，我希望他们更多地去了解开阔视野的东西，更深一些启迪性的理论知识。

5. 我是我们系里第一个专门为研究生配置计算机的老师，那时候比较好的型号是 8086，我还特地配置了硬盘，学生就可以装置大一些的程序软件，做大一些的运算和数据处理。我买的这台计算机就放在学生的工作室里，不仅我的学生们用，其他一些老师们的学生也用，连续三年发挥了很大作用。我的学生个个电脑使用都是比较好的。后来系里的电脑多了也就不足为奇了。

6. 我从不死抠学生研究经费的使用，学生倒反而很注意节省，

没有人刻意超支的。对于学生要购买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我从来不加无谓地限制，对于他们要去外校旁听课程也多尽力支持。即使是选课题也是尊重学生的选择。我使学生们感到对他们宽松和宽厚，联络了很融洽的师生感情。

这就是我的为师之道，也包含着我的为人之道。我对学生们的生活也是尽可能的关心的，我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家庭。他们有病到宿舍里去看他们，有时候还送到医院，或是到医院去看住院的学生。我安排他们去实习，到现场收集资料，都尽可能照顾到他们能够就近回家。有家属来探亲的，想办法借房安排他们的住处。

然而我对学生的论文要求是严格的，不能有丝毫的原则性的错误。不能有任何没有严谨科学态度的论断，论文中不能有不符合常理、不符合实际的漏洞。他们的论文初稿我都仔细的看过，不能出现一眼就看出来的令人耻笑的错误。我在评阅不是我的研究生的论文的时候，我也是同样的要求严格，对有错误处，我立即指出，令其修改，免得让他的导师在论文答辩会上尴尬。

说老实话，我看到的论文有不少是粗制滥造的拼凑，或是信口开河的论断，或是没有足够数据为依据的结论，或是画蛇添足的论述，甚至有不负责任，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还有存心与导师作对的，论文里落下明显的数理统计方面错误。我给他指出你干吗要这样与导师过不去，我对他说，你这样做太不应该，导师可以承担下疏忽没有细看的失误，而你可能闹上一个降级的甚至是不合格的后果。他把那个修改了，没有闹出笑话。他实际上是欺负他老师在那个问题不懂，搞

了一个小动作。我这样做对谁也没有说，论文还是获得不错的评论。我的研究生的论文是绝对不能出现这些低级的错误。也不能让研究生看不起我。例如，一个研究生采用模糊理论和概率论，去处理一个方案的确定，这是一运用专家系统的方法去确定方案，我不懂我就倾听他的，到我弄明白了，我就支持他。这是为师的教学相长的态度。

这二十多年过去了，学生们还想着我，惦记着我。我一方面感到宽慰，我过去没有稀里糊涂地不负责任的对待他们，让他们感到我给予他们，或者说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他们起到了一点作用；另一方面我也感到骄傲，这些学生个个都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事业成功的佼佼者，立足于当今社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一拨一拨的后来者把我们的社会，把我们的国家推向一个一个新的高峰，使我们的国家真正走向富强。这里面也包含着有许多老师的一份功劳，改革开放，教育获得了丰硕成果。现在来看知识分子能是无用的吗？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殿堂吗？

从我个人来说，大学里一个普通教授，既无显赫的名声，也不学识渊博；既无丰硕科研成果，也无精湛的专业顶级水平，只是搞了几十年教学，带出十几个硕士研究生，搞了几个研究课题，仅此而已。我没有任何可以夸耀的资本，没有可以张扬的事迹。我总是低调为人，心态平和对待一切。但是作为教师我还感到自豪的，毕竟教师这个职业是神圣的。不论一个幼儿园或小学启蒙教师，还是大学的教授，他们都是像韩愈所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对于大学教师来说，传道就是传递信息，传授科学方法，传承前人的积累；授业

就是教授专业的知识，教授从事生产、设计、研究的技能；解惑就是帮助、引导学生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启发学生去解决难题。老师就像过去所称呼的“先生”，先于学生而知，是一个更先获得知识的先知者。老师的作用就是把知识接替地再传承下去。

我有幸地赶上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尊重教师的这样一个好时代，由衷地觉得不后悔做了一名教师，只是自己没有在这个岗位上，脚踏实地地更上一层楼，但是我还是知足的，获得了应有的尊敬和尊重。而我作为一个研究生的导师，我没有白辛苦，我的学生们蕴酿着要为我庆祝八十岁的生日。我很感激，我劝说他们没有这个必要。如果是一般性的聚一聚那倒可以，千万不要兴师动众，我承受不起。我作为一个老师我没有那样大的功绩。我坚信那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只不过起到一个引导和传承的作用。

钻探总工短训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77年又经历了多半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基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种决定和做法，使国家政治生活和经济运行，逐步走向了正常。教育上中央决定1978年恢复高等学校的考试招生制度。后来又决定在1980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至此，高等学校也恢复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只是本科学历改成四年，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学历视情况，是二或三年。北京外迁的高等学校大部分在北京建立起研究生部，恢复招收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因为大部分的老教授都没有随迁到外地，只有他们具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

1979年成立了“武汉地质学院北京研究生部”，我和杨惠民做为李世忠教授的助手调回研究生部，我们能回北京的条件，是因为我们都是单职工，爱人不是地质学院的，不跟随迁校到武汉。

研究生部成立，首届招收的研究生不多，都是文革前毕业的学生，招生的导师也只限于一些老的教授、副教授，学生入学后选修一年半的课程，做为助手我们也都没有什么事可干。杨惠民与部探矿司的人谈及现在工程技术干部，普遍是对新技术的知识了解不多，技术观念陈旧保守，与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的要求不能适应，需要更新知识，更新观念。部里的同志询问我们，学校能不能帮助培训一下各地质队里的主要技术骨干。杨惠民回来后与我商量，我认为没有问题，他马上请示了李教授，李此时正是研究生部的副主任，当即决定接受下这

个任务。杨惠民随后把我们的意见反映到部探矿司，然后通过正式渠道，把办钻探总工程师的任务，下达到研究生部里。这项任务来了之后，我就负责起教学方面的筹划和安排的工作。一切对外联络和校内行政上的管理，全部由杨惠民担当起来。1982 年的秋季，我们开始了第一期钻探培训班开学，学习时间定为三个多月，总共 14 周。我们连续的办了六或是七期。我和杨惠民的合作配合得很好，后来他当起研究生部探工系系主任，我们又是这样配合招收了代培本科生，开创了研究生部招收本科学生的先例。

1978 年我从山西回到武汉之后，参加了和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所的一项合作科研任务，研究设计岩石破碎钻进试验台的工作。后来我调回北京还继续这项工作，设计工作完成，交给了苏州的一家工厂加工制作，我全力投入钻探培训班的筹备工作。1978 年自从重新回到钻探业务以后，我努力学习有关的钻探方面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了解国外钻探技术和工艺的最新发展。我们耽误了这十年以来，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令我吃惊。特别是我们以前沿袭着苏联的一套技术方法和路线，与国际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差别很大，我们已经非常落后。要提高当前的钻探水平，一方面是要引进新装备和新技术，另一方面就是，重新培训从事生产的技术人员，学习新技术、新工艺，转变旧有的那套苏式的技术观念。我们正是这样可以为探矿工程事业，尽一份力所能及的效力。

我和杨惠民以及其他一些老师，确定下需要讲授的课程。重点是钻探的新技术和新工艺，例如，小口径金刚石钻进、绳索取芯钻进、

新型泥浆和冲洗液、定向孔钻进、孔斜理论和孔斜控制；再就是重新补足一些钻探理论知识，有钻探力学、钻进岩石力学和岩石破碎理论、钻进的最优化理论；此外，还学习一点数理统计和分析的基本知识，学习一点工程参数的测量和控制的基本知识。学习的内容是够多的，但是有的只是一般了解，不要求掌握很深。我聘请的授课老师，都是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也包括了一些是武汉的并未调回北京的老师，反正家在北京，只需要两边的教学安排错开就可以了。当时武汉探工系的负责人汤凤林，也给了大力的支持。第一期的短训班效果很好，我们就连续的办了下去。

来学习的大部分是地质队上的总工和副总工，或钻探技术负责人，都有十几年以上的钻探工作经验。对他们讲课可不像对大学生，你怎么讲他怎么听，你讲得有问题或是没有说明白，真是当面质询。好在我们都是老教师，没有出现过技术性的错误，所讲内容又都是各位老师的专长，而理论的讲述都是透彻深入，得到学员们的好评。对一些他们所不知的新内容，都是很认真地听取和理解，他们觉得这种学习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我常到学员当中去听取意见，和了解他们的要求，一致都认为学习内容很多，学习时间太短。我解释我们是把最需要的介绍给大家，尽量地压缩了内容。时间是部里规定下来的，只能这样，我们尽量在教学上改进，保证大家能够学到必需的知识。

在办短训班的过程中，我逐渐了解了我国目前地质工作的状况。现在一年的钻探工作量，不及五十年代鼎盛时期年工作量的十分之一。究其原因：一是地质勘探的经费严重不足，计划下拨的经费大部

分用在养活人的身上。地质队队伍庞大，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而真正从事业务工作的人员并不很多，人员的工资和补贴占去了地勘经费的一半多，再加上物价的上涨，各项开支的扩大，经费却没有增加，致使捉襟见肘，没有办法不减少勘探工作量；二是五、六十年代已经把浅层的矿产资源勘查得差不多，现在勘查的是深部矿体，单位钻探进尺的成本几倍的增加，花同样的钱可以完成的，以钻探进尺表达的工作量却要少得很多；三是八十年代人们勤俭节约的观念比起五、六十年代，也差得很多，开支上大手大脚，铺张浪费。钱就显得特别地不经用，地质队也没有其它生财之道，用在勘探工作上的钱没办法不少。上级部门也明知这些问题，但是也没有办法，只有下达按钱数来完成的工作量任务。

从办短训班也了解到，地质队的领导和工程技术干部，不是不想使用新技术、新工艺，而是没有钱进行技术装备的更新改造，和新工艺的推广应用。原因是技术装备的更新改造资金，新技术推广费用，都是掌握在上级主管部门，需要排队等候这两项经费的下拨，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变的程序。所以眼下还有相当多的地质队，在使用陈旧的苏式钻机设备，还在使用大口径的钻进工艺，钻速既慢还浪费材料，钻进成本高。然而需要等着顺序拿到经费，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我们的地质队不是企业，是花国家勘探事业费的事业单位，不能自筹经费，也不能向银行贷款。

再就是也了解到，技术干部青黄不接，在基层第一线工作的技术干部都没有年轻人。这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的问题，这是中国十年

来，形成的人才的断层，十几年国家没有培养人才，不仅没有大学生毕业，也没有中级专业人才毕业生。那些一心一意地搞阶级斗争的领导者们，他们害怕中国变了颜色，却不怕中国落后经济倒退。他们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却不管国家的生存和人民的苦难。

办这样的总工短训班，也是迫不得已的。业务的培训主要还是要针对基层的工程技术人员，对总工这一级不应该是培训，而应该是召开研讨会，共同研究商讨对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但是由于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耽误，而形势又迫切要求推广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应用，因此就采取先培训总工一级的技术骨干，然后再依靠他们到下面去推广，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当前最迫切的是推广小口径钻进技术，从最上面的领导层，业已制定下详细的规划。几年来小范围的小口径钻进的应用，技术上已经很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刚石钻头已能大规模的生产和供应，小型化的油压钻机也已经系列化的生产。金刚石钻进所需的乳化液也可以有充分的供应。大规模的推行小口径金刚石钻进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而现在主要的是技术人才的培训，快速的办法就是逐级培训。先培训技术骨干，再由他们去培训基层技术人员，然后培训工人。

逐级培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都认识到小口径钻进的优越性。改变了只认为大口径钻进不容易出事故，出了事故也容易处理，小口径钻进技术复杂，不好掌握等等陈旧的观念。其实是小口径钻进不容易出事故，操作上容易掌握；钻速快、钻进平稳；设备轻便，材料消耗小；配合绳索取芯，一次钻程长，劳动强度小，一经应用就受到到工

人的欢迎。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八六、八七年，经历了五、六年的时间，小口径钻进在地质勘探岩芯钻进上，得到普遍的推广和应用。这项由地质部牵头，刘广志总工程师（后来是工程院院士）领导的，联合冶金、有色、煤炭、核工业、化工、建材等地质勘探部门，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小口径金刚石钻进》重大课题，取得巨大成功，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一等奖。这是地质钻探事业，一个革命性的转变，不仅是提高了钻探作业的技术水平，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我们办的钻探总工短训班，真好适应了这个课题的要求，对小口径钻进的推广和应用，也起着一点促进的作用。

通过办钻探技术短训班，现在仔细地回想起来，认识了以下几个问题，这是在重新思考时所想到的。

认识之一：高等学校里设置的探矿工程专业，是完全应该改变的。这个专业是按照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根据计划的需要培养所需的人才，毕业以后对口由国家统一分配。学习内容专而又专，分配到工作单位，立刻可以学而致用。然而现在来看，技术更新发展极快，还不等你毕业，一些学的东西就已经淘汰无用了；再就是许多工艺上的操作问题，许多繁琐规程规范，没有必要在课堂上繁琐地讲述，在亲临实际后就能掌握，也能深刻记住；更主要是大学生毕业不是统一分配，面临着许多选择，许多专业知识在选择定下之后，在工作的岗位上学习。在大学里主要是打好基础，能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那末专业不应该很窄，学好基础和应用技术课程更主要。例如，我们办

的短训班，学的就是全新的技术和工艺，他们过去所学的技术和工艺知识，全都落后淘汰了，然而基础知识却支持了他们学习新的东西。

认识之二：地质勘探队伍必须要走市场化的道路。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养活着一批地质勘探队伍，特别是在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新中国刚刚建立，要走工业化的道路，急需各种矿产资源，大力发展了地质勘探队伍。不仅地质部，还有许多工业部门，都成立了地质工作的司、局，冶金、煤炭、石油、化工、军工、建材等等，都有自己部门的地质队，就全国来说有一个庞大的地质勘探行业，基本上都是使用的国家地质勘探经费。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计划下发的有限的地质事业费，各地质队都是入不敷出，地质队走到困难的境地。和国家的许多其它经济部门一样，只有改变体制走市场化的道路，才能走出困境。地质队以招标（或承包形式）取得国家的经费，地质队还要直接从社会上，承揽可以从事的工程任务，例如承接矿山外围的勘探任务，为农业灌溉和生活用水承担钻井，为城市和旅游地开发地热的钻井，为建设进行基础工程施工和排水工程等等，甚至开拓思路冲出钻探钻井的框框，“抢”其他行业的饭碗。地质队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就能站住脚，取得新天地。现在的结果就是这样，走市场化的道路就有发展，进入不了市场竞争，就被淘汰出局。我们在办短训班的时候，我也没有这样的认识，但是有的总工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趋势，未雨绸缪先走了一步。例如广东地质局，他们把队伍从山上拉到了城市，参与了深圳城市的发展和建设。

认识之三：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团队协作合作的精神。我们办短

训班所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正是体现了这一点。首先，我和杨惠民合作得很好，我们协调一致，他筹谋、策划与各方面联系交涉，我则做好教学安排和聘清教师的工作。我们教师也都非常支持这项工作，我和他们商量参与教学，都是毫无条件的接受聘请。他们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我都是尽力给予解决。我们都是抱着一个目的，为钻探事业的发展，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我们荒废了十年的业务，正是希望能够发挥自己专长，为赶上先进国家的水平，贡献一切力量。我们干这些事情，没有任何额外报酬，只把这当作自己份内的任务，尽力地去做。正是这样的精神，大家才能够团结合作把短训班办好。

认识之四：总工短训班是特殊时期，特定形势下举办的，以后不能再举办。现代企业、现代管理部门，对员工的培训应该是经常化、制度化，才能够保证员工的优秀素质，不断提高员工的水平。而总工（现在通常称为技术总监），应该是主持这样的培训。至于他们的学习和提高，应当通过行业协会举办研讨会、交流会来达到。不应该再举办这种初级形式的，教学班式的培训。至于基层人员的各种培训都应是专题形式，不能设置为综合教学，这等于再重新进行一次学校式的教育，是时间上和教育资源上的浪费。

办短训班对我也有很大的教育，一方面使我重新学到不少新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也使我了解了不少，当前我国勘探事业的现状。在这个办班的过程中也使我在以后的教学里，能够适应技术发展的新要求，寻求新的教学方向。

从这以后，我就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钻进最优化的学习和了解

上，我培养研究生也不少是选择这方面的课题。这也是通过办短训班得到的一些启发。钻进最优化是一个非常理论化的课题，尽管它不能立竿见影地提高钻进效率，但是它提供工程技术人员，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方法，提高他们运用基础知识解决问题的水平。在钻探总工短训班中，我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钻进最优化的基本知识，对他们了解最新技术的边缘学科，给与了一些新概念。钻进最优化理解起来时有比较大的难度，它是把数学物理方程、数理统计、控制论、运筹学等和工程问题结合起来，研究多变量的最优化目标控制，以达到技术经济的最优。对于我们过去直来直去，讲述如何进行工程技术参数的调整和控制，这是完全全新的概念。当然这在实践上做起来很难，但是，这是把纷乱复杂的多因素影响，进行科学化、条理化的整理，再优选出可控的技术参数。尽管我们不去进行直接繁难的运算，而对于我们思考以怎样的方向去解决技术参数的控制，确是给了有益的启迪。这是可以用在所有工程问题，都能适用的通行的目标控制的方法，特别是适用于复杂的系统工程。

我们用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办了六、七期的钻探短训班，除了主要是地质部系统的学员之外，还有冶金、煤炭、建材、化工等行业的一部分学员，这在当时做得还是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也算是我们探矿工程系，对国家地质事业做出的一些贡献。每当我想起这件事，还包括后来开招本科大学生，不能不感谢已故去的杨惠民同志的远见和胆识，他做了不小的贡献。

无意地涉足了经济领域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到过，我会去做生意，但是 1986—1988 年我却做了两年多的经理，涉足了经济工作。也算是阴错阳差的干起了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事。1983 年不少单位办起了第三产业，一是为了解决职工子女的有事可干，因为社会一时还不能安排大批待业青年的就业；二是为单位职工谋一些福利，挣一点计划外的收入。地质学院研究生部，当然也办起第三产业，为解决职工子女的安置的，都一律称做“劳动服务公司”。我曾经受劳动服务公司委托去做创业的可行性调查。当时我的重点是注意石材加工，和宝石经营。石材加工方面不适合学校进行，投资大，需要大的厂房和购置庞大的加工设备，还需要大量的熟练的工人。对宝石经营方面，当时还看不到市场前景，社会上还没有一家宝石经销商，虽然宝石是地质学院的业务长项，但是我的脑子里认为中国人哪里有钱去购买这种昂贵的奢侈品，劳服公司也不适合这项经营，不敢去问津。所以我做的一些调查，基本上都否定了。这是我开始接触到经济领域，但是刚沾了点边也就放下了，没有继续过问。

1984 年，许多大学都办起了科技开发公司，利用学校里的技术力量、设备条件、资金财力和研究成果，把科研成果进一步开发应用，转化为科技产品。对于大多数理工科院校，这是一点也没有问题都能做得到的。例如著名的“北大方正公司”、“清华紫光公司”。但是我们学校虽然也是理工科，可专业都是面向野外的地质勘探，所以我们就办起了一个名为“大地科技咨询公司”的经济实体。申报的主要的

经营业务是：地质矿产勘探的技术服务；非金属、非有机材料（主要是硅酸盐材料）的分析化验；岩石矿物、地层古生物的鉴定；水质分析、抽水试验；地基勘测、岩土力学鉴定；城市地下管道、缆线勘测；机械设计、加工等等。因为我曾经做过经营方面的调查，研究生部的领导们，就把我找去商量，也就顺水推舟让我参与筹备，后来就让我当了副经理。经理是原来做过系总支书记的江祖如，许多具体的业务是我做，江是主管全局的。江的思想很明确，他并没有多想去搞技术开发，他更多的是鼓励下面的老师，去拉横向的研究和试验项目，给与一定的提成。经营的目的就是为职工谋福利，这是毫无风险的坐受利益的营生。我们工作人员并没有高的收入，只不过每月可以得到50元的补贴。地矿部、国家科委、国家科学基金等垂直下达的科研项目，与其他部委合作、协作的大项目，都不能插手，那是由科研处直接管理的。因此我们还是只能挣些计划外的小钱，如果把国家下达的经费，变相的提成那就是经济的违纪，甚至是犯罪。这种利用国家人力物力的小打小闹创收，也只是在那个历史条件下，被暂时的允许了，社会上各个单位都这样做，甚至于包括国家机关和军队都办起了各种名目的这种创收公司。

在公司里我主要办了一件事情，生产小型振动粉碎机，这是专门用于岩矿化验粉碎样品的。它是我们系里机械教研室一个科研成果，我把他接手过来进行了试生产。我重新设计了外观，解决了震动噪音的隔离，配置了控制的电气系统。样机参与了高校技术开发的展览，展览中有人订货，我就与经理商量进行了小规模的生产，也给我校机

工厂，找到生产门路。工厂当然很欢迎，也有很大的积极性。我则跑材料、订电机、购元件，生产了三十台。这个还真是忙了我一阵子，生产出来以后，因为价格不高还是卖出去了不少。基本上把成本赚了回来。最后留下了几台，给学校里的实验室、化验室自己用了。因为实在是累人，就靠我一人组织生产，加上推销起来也很困难，我无心继续搞下去。生产、销售、收益分配都伤透脑筋。干这种实打实的生产经营，真不如走账服务，坐受提成，来的轻松容易。这我才体会到真正地去搞经营、创收是非常不易的事情。要搞科技开发，组建经营性公司，占领市场一席之地，没有坚强的技术实力和齐心的团队，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公司虽不是皮包公司，也不过就是三、四个人的小经营户，只不过依靠学校的后盾，坐收一点小钱而已，搞不出什么名堂。

我不甘心只过手转账从中收取手续费的营生，还是想做一些技术开发的事情，做了一些尝试，探索经营的可行性。一次地质系的一位老师，向我说房山县的一个山村里，有膨润土和高岭土矿，村民在小规模的开采，我们是否可以去看看，给予技术指导，和村子（生产队）联合开发。我们开了一辆吉普车，在这个老师的带领下，顺着山间公路登上了房山一个很高的山岭，名叫云霞岭，到了村子里生产队长的家里。队长领着我们来到了矿点上，查看了情况。的确是有一些可作瓷土的高岭石矿，农民在山坡上开采挖出了一个一个坑洞。地质老师一看便说，这是岩浆岩风化而成的鸡窝状小矿体，形不成矿床，再往下也不可能有了，有的也只是未风化的铝矾石了。鸡窝状的高岭土是

一疙瘩一疙瘩的，露在地表上的，农民用镐锹一点儿一点儿挖出的高岭土，堆放在山坡上，然后用小拖拉机运到山下的收购点上。我们估量了一下，不可能组织规模化的开采，联合开采仅仅勘察的费用我们都是承担不起的。

正是中午时分，生产队长热情好客，一定要留我们在他家里吃饭，他叫家里准备了小米粥、烙饼摊鸡蛋，看到他们家里还是很艰苦的，就是这一顿饭食，需要花费他们多么不容易的积存，我真的非常感动。山村没多少耕地，只有采石开矿还能够还能够挣到一点钱，但是就这一点的忙我们也帮不上。后来我也了解到房山云霞岭是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司令部就曾经在这一地区驻守过，聂荣臻司令员在这儿呆过。云霞岭是太行山脉北端的最高峰，山峦重叠，道路崎岖，又是河北山西通道的咽喉，日本人很难达到，正是抗日打游击的好地方。我真是有愧不能为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改变贫穷处境，尽一点绵薄之力。听说这个地方现在正在开发旅游资源，改变山区的面貌。这可能是当地致富的一个好途径。

还有一次，我们又开车去了昌平南口，查看了一个石材开采场，这个石材厂曾来人请我们的专家去评估一下，如果有开发价值，为他们提供帮助，共同开发。我们到现场看到了，倒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采石场，可惜的石料只是普通的石灰石，品级、色泽、纯度都不高，完整度也不是很好，开采切割下的石料也只能用做低档的墓碑，够不上做建筑装饰材料的级别。仅靠销售墓碑和用作烧石灰、烧水泥的原料，经济价值是不高的。我们对他们建议，也就这样的开采经营还能赚到

一些钱，没有必要再搞大了，搞大了成本提高就要赔钱了。

此外，我还经历几件外商找到门上，寻求购买资源的事情。一件是美国的一个石油公司寻求重晶石矿石，要求年供货量几十万吨，我找到地矿部的一家公司，询问了一下情况，我把对方给出的价格说了，地矿部这个公司的人说，开玩笑，这个价格简直是掠夺资源。又一次一个加拿大外商寻求高纯度的二氧化硅的玻璃球，这是原料的初级产品，可用做进一步制造光学玻璃、光导纤维、高级镜片等，我问了建材部的人告诉我，这是国家控制的出口物资，他们必须通过国家的出口公司购买。还一次一个美商寻求茶多酚一种制药的原料，也是中国产量大，国外非常需求的初级产品，同样外商给出的价格很低，没有愿意供货的单位。过了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些外国人都是通过正规外贸渠道得不到的，想通过民间渠道，挖掘中国的资源。我国大量的稀土矿产的流失，就是这样从民间不经国家控制，搞到外国人的手里。而且是黄金价的东西卖出了白菜价。

我干了两年的副经理，因为研究生、本科生的教学也比较忙，我承担的粉碎机的生产也不再继续，我就辞去副经理的职务，完全回到了系里。专心去做教学了。

1986年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新的部增加了矿产资源管理的职能，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管理法》。各地的地质矿管局急需培养大量的矿管干部，我们系因此接受了地矿部委托，办矿管干部培训班的任务。我当了两年的经理，专门学习了经济法，我就承担起《经济法》课的讲课任务。矿管干部培训主要是学习《矿产管

理法》，矿管法是属于经济法范畴的法律，学矿管法之前必须先学经济法，我就为矿管班开设了经济法的课程。从1987年下半年到1990年，我一共讲了三年多的《经济法》的课，共有四次。两次是给短训班。后来又招了矿管专业的本科生，给本科生讲了两次。1988年开始招收了矿管专业本科生。只招了两届就停了，第二届的学生只学了两年多就改成勘查技术专业了。因为毕业的学生没有单位要，不是下面不需要这种干部，而是矿管工作不是技术性很强的职业，主要是执法和管理，不需要大学的学历，谁都可以做。那个职业是“肥缺”，地方官员都安排给他们的子女和亲朋好友了，国家专门培养的人才他们不要。这时已经没有包分配的制度，用人的县乡矿管部门，可以任意选择和安排用人。矿管专业学生的就业没法解决，无法再办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我讲了三年多的《经济法》，很多原则每年都变，这在技术性课程里是不会遇到的，这也难怪从1987到1990年四年，那是我们国家经济原则变化最大的几年。正是这样的变，我国的经济才真正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1987年我开始讲授《经济法》课的时候，我还按照当时的观点，强调计划就是法律，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当时教材阐述的我国的经济原则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通过市场调节，补充计划经济的不足。这已经是突破了苏联式计划经济模式一大步。虽然这时候领导者，已经认识到市场调节的重要性，但是还是强调社会主义的经济原则，不能离开计划经济，不能离开公有制。市场经济和私营企业，只能是起辅助的调节作用。那时候普遍地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水火不能相容的。

1988年，第二次我讲《经济法》的时候，按照当时的形势的发展，经济界已经在改口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重。我在讲课中也就跟着这么说，国家的经济原则应该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重，这样才能促进市场繁荣，刺激经济发展。但是这个提法并没有官方的正式表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计划管理部门都还存在着，只是计划跟不上变化。这种经济政策运行的结果，一个时期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混乱。当时称为“双轨制”的经济政策，的确是给经济发展带来了刺激，但是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应。特别是生产资料的生产，企业一方面按国家的计划生产，另一方面又可以生产一些计划外的产品，产品的价格也就有了两种，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市场就自然出现了混乱。倒买倒卖，投机倒把盛行，企业为了多生产计划外的产品，千方百计地抢购原材料，多安排计划外的生产，而规定的计划指标却不能很好地去完成。当然我在讲课中也回避了这样的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这个。

1989年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政治上的震荡，导致全国大反自由化的浪潮，很大部分意识形态僵化的人，例如邓力群等，扬言不仅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也要反对经济上的自由化，一些保守思潮顽固的人，质疑起经济改革的正确性。当然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只是叫嚷着中国不能再回头走资本主义的老路。一个时期。国家的经济原则又强调起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运行开起了倒车。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被叫停，国营小企业（主要是小商店、轻工小厂、服务行业）的经营承包制刹车，个别地方推行了经营承包

的企业领导人被逮捕法办。走在改革前面的人，被称为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实际上，敢于顶住逆流的还是大有人在，例如石家庄造纸厂厂长，推行了经济承包制，改变了企业的亏损濒于倒闭，但被指控贪污，化公为私，他坚决不承认，坚持改革。经济学家吴敬琏国务院的经济顾问，主张吸收国外资本参股国有企业，主流舆论指责这是卖国，他照样坚持不退缩。

1989—1990 年我这个时候，还讲了一次《经济法》课，明知道那个时候的气氛有些不对，贬低市场经济的原则，就是对经济改革投下障碍。但是也没有官方的任何明示，对还是不对。我很是为难，不知道怎么个讲法，只能照着 1986 年以前人民大学的教材来说，因为是公开的讲堂上讲课，也不敢信口开河。这以后学校里矿管专业取消，我就再没有讲过《经济法》的课程。

1992 年邓小平第二次南巡，南巡中又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一下子彻底扭转了经济改革倒退的局面，甚嚣尘上倒退的逆流之声，戛然而止，经济改革的浪潮推动着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我虽然不再讲述《经济法》，但是我更加关注经济的变化形势，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关系到国家富强和实力，更关系到人民生活了的富裕和提高，民富和国强是不能分开的。现在国家领导人把关注民生放在了重要地位，认识到要使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使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同时抓好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 年形势的骤变，对于国家经济原则的提法已经不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重，而是完全摒弃了计划经济，提

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原则。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奠定了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此，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段调整和改制，进入了高速平稳的快车道，一直持续地保持到现在。

记不得是 1992 还是 93 年，我曾经在学校的校刊里，发表过一篇文章，我写到，培养大学生还应该给学生一些经济头脑。过去给工科大学生注意灌输了微观的经济观点，要注意产品的成本构成，工程的费用开支，人员的工时费用，原材料的精打细算等等。我认为对于现代大学生，这还仅仅不够，大学生还应该培养有宏观经济的意识。应该懂得投资，懂得金融，懂得股票和期货，懂得国家的经济政策，懂得宏观调控，懂得税收和财政，懂得国民经济的分配。我认为许多大学生，包括一些研究生，对于经济问题是糊里糊涂的，毕业以后需要很长时间的磨打，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生存，否则很难在社会上站住脚。

校友 公仆 负轭 “拍砖”

今年（2012）开始，我已经停笔不再想继续为我的“回忆”和“反思”拾珠添缀，只是着手于修改和补遗。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会后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与中外记者会面，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我从电视上看了现场直播，听到了温总理的肺腑之言，真是激动不已，我抑制不住想写一下我的心灵震撼，记述下我对这位校友的敬佩和理解。

温家宝是我校（北京地质学院）1965年地质矿产普查专业毕业的，以德才优秀遴选继续攻读研究生。刚就读了一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1967年底，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区域地质测量队（简称普查队）。在环境和物质极为艰苦条件下的西北甘肃省，人烟稀少的高山、沙漠、戈壁里，有大面积的地质空白区域。从事着区域地质测量，矿产普查的地质队员们，经常风餐露宿工作在野外。他们在祁连山上，在大戈壁里，在风雪沙尘中，徒步踏勘，测量填图，做着基础的地质普查工作，这是地质工作里最辛苦的作业。温家宝在甘肃野外地质队，摸爬滚打了十年，从普通地质队员，上升到地质队长，走遍了甘肃的许多山山水水，深入到甘肃的不少边边角角。工作的关系，与最底层的人民，与生产队、公社（村、乡）、县的干部紧密联系，与各级政府部门打交道，使他了解边远人民的疾苦，了解穷苦的农牧民生活，了解基层干部工作的艰辛，了解地质工作者和矿工的辛劳。

温家宝常年在野外，在山里，在农牧区，在矿区奔忙，贴近人民

群众，贴近劳苦群体，贴近基层干部，使他了解民情，了解政情；大西北的经济和教育落后，给他心灵的刺痛，让他更懂得了中国的国情；艰苦的工作环境，使他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能力；西部的落后状况，使他坚定了改变“一穷二白”的决心；“文革”的破坏，令经济倒退，使他发愤图强，加紧工作；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宽厚的知识，使他视野宽阔，思路深远。这一切造成了温家宝，具备成为未来国家领导人的坚实基础。

他脚踏实地，在每一项任务的工作中，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再加上他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总有机会被伯乐发现和赏识，从地质队长又到甘肃省地质局长，直到地质部副部长，再后到了中央。他的一步一步的提升，没有背景，没有关系，全凭着坚忍不拔地实干，才能一步一个台阶而上。1992年中国地质大学五十年校庆的时候，他题写了地质大学的校训是：“艰苦 朴素 求真 务实”。纵观他这四十五年的工作和言行，他就是秉承着这个做人和为官的准则，践行了他给母校题词的信念。他是地质学院、地质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最值得骄傲的校友。他为母校增添了光辉，母校也以他为荣。

温家宝自到了中央，当了党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而后是国家最高行政负责人——国务院总理。他的一言一行，他的表里如一，他的辛劳勤恳，他的忍辱负重。都看在了全国人民的眼里，记在全国人民的心间。他确实做到了一个一心为民的真正公仆。今年这最后一次的记者会上他说：“我为能做人民的公仆而为人民办些实事而感到自豪。”他的公仆形象不仅为中国国内老百姓所

称道，也为海外华人所赞许。外国的政治家，外国媒体，对温家宝个人也不能不投以钦佩的眼光。特别是在他身为国务院总理以后，不论是南方长江和东北牡丹江洪水肆掠，新疆狂风雪暴特大灾害，湖南广东广西冰雨造成的交通、电力中断，都有他亲临现场的身影。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第一时间，第一速度，到达地震第一现场，调动军队，调动人力，调动物资，指挥抢险，发出救人第一的命令。他前后去了七次，前几次都在余震不断情况下，待了较长时间。而后是青海玉树地震，云南普洱地震也是很快到达现场。云南四川几十年不遇的干旱，到田间视察布置抗旱，在河南到艾滋病村看望艾滋病人，嘱托关怀病人的子女，在北京到艾滋病病房探视病人，慰问医护人员。温家宝心里总是装着他的人民，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温家宝总理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日理万机，管理者国家机器的运行。在经历了重大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在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下，保证了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以最高水平进行。十年来保持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虽然是党中央的领导团队通力合作，分工负责，指挥正确的结果。但是温家宝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在这个前进的“马车”，通向康庄富强的大道上，胡锦涛驾辕，温家宝拉套。温总理说，他像一匹常年负轭的老马，一刻也不松套。负轭老马的比喻，透露出温家宝的身负重任的艰辛。

就是这样一个为国为民呕心沥血，做出了有目共睹贡献的国家领导人，竟然还有丧心病狂之徒，向他扣屎盆，泼脏水，说他“作秀”，“表演”，是“沽名钓誉”。更有甚者说温的改革是向资本主义倒退，

是向资产阶级投降。这种人“心怀叵测”在网上“拍砖”，自然遭到了众多网民的臭骂和唾弃。温总理说他感到痛苦，痛苦的是他的独立的人格不被人们所理解。总理是委婉地道出自己的内心的酸楚。这哪里是什么独立人格不被理解，这分明是恶语中伤，是卑劣暗箭，是对温总理独立人格的诽谤。不知他们是在为哪个野心家、阴谋家充当马前卒。想为极“左”招魂，想使“改革开放”后退。

3月15日我听了温总理的答记者问，后来我又反复地看了报纸上刊登出来的文字，我仔细地品味着总理讲话的内涵，认真地体会着总理传达出来的心声。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大国总理讲出的话，掷地有声的坚定和自信，看到了一个举世瞩目政治家，迸发出智慧佳句的豪气和风范，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华儿女扬眉昂首，表现刚毅和自豪的一面；同时，我还看到总理对弱势群体关心爱护显示温情，对科学家、老知识分子的关心热情，对国家未来流露着忧虑愁情，为工作中的遗憾抱有愧疚心情，那些充满柔情的另一面。总之，我我看到了一个既伟拔又平凡的人，一个既刚强又温情的形象；一个既忠诚又自谦的斗士。对温家宝个人不论我有多少溢美之词，我觉得还是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敬仰之心。

仅仅从温家宝答记者问的言辞中，所看出来的他的人品、情操和修养，所感觉到的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杰榜样，我归结得到的是：勇敢 坚强 守职 勤奋 睿智 华彩。

勇敢 温家宝总理在2003年就任总理后的第一次记者会上，今年他又在最后的一次记者会上，都说到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表现了为国为民的大无畏气概。因而他能勇敢地承担起重任，能勇敢地冲在危险的第一线，能勇敢地与各种艰难险阻作斗争。这次记者会上，更是大胆地说了自己的心里话，大胆明确地表达了对当前社会的一些忧虑，流露出未能做好的伤感。无私才能无畏。无私是勇敢的后盾。而只有“大公”才能无私。“大公无私”正是一个杰出公仆的基本特征。温家宝能够事事处处勇而为之，是他“大公无私”本质的指使。我想，这应该是他人生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坚强 温家宝总理说，他为国家服务了整整 45 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全部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表现出为国家，为人民全心身拼搏的坚定和坚强，是信念，是决心，是无私给他的支撑。他誓言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他说，他在最后时刻仍然要“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与人民站在一起，坚守岗位，百折不回。他是坚强的勇士，不疲的斗士。他说：“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这里他是面向全国人发出铿锵的誓言。

守职 温总理说的“守职而不废”，就是尽忠尽职。总理的尽忠尽职，全国人民无不仰佩，所有公职人员无不以其为表率。总理尽忠尽职的最高境界就是：“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总理是说到做到，历史将为他作证。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守职尽忠的辅相有：诸葛亮、魏征，近代有周恩来，温家宝以他们为榜样。他的守职尽忠，让他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

勤奋 温家宝总理的勤奋，没有人能有任何异议。对于工作，他

就任总理时说，我一定不辜负人民的期望，履行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不负众望。”历经九年，不仅是像他说的，倾注了他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更是日夜思考，像他引用屈原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又讲过：“居安思危，有备无患”。他无时无刻不是在勤奋地工作，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一年一年的苍老和消瘦的面颊，显示了他勤奋的印记。

睿智 这次记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所有热点、难点问题。对于某些外国记者，所提的刁难和恶意的问題。总理还是很友善地回答和解释，讲得有理有据有节。总理的答问，表现出睿智、理性，能机敏的绕过沟坎，不明说表现出含蓄，话中有话。语言也非常严谨、缜密。他回答问题是高水平的，高质量的。现在的中国总理，比起多年前的国家领导人答记者问，水平不知提高了多少。比如政治性的错误，信口开河，语误、掉词、打尅、发火，都绝无仅有。就是现今的温家宝，比起刚当上总理时记者会上的答记者问，答问的水平和语态都提高了很多。表现出了他知识的渊博，经济管理的高水平，掌握数据的准确，语言逻辑层次的分明。答问中还表达了他拳拳的爱国之心，深深的亲民之情。

华彩 温家宝总理在每年全国人大会议后的记者会上，回答问题中经常引用了许多中国的古典诗词，名言、名句，表现了他有很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和良好的古典文学功底。他的文采的一面反映了他是一个很全面的人。华彩一词是文学艺术上的一个用词，温家宝在记者会上的讲话，对诗词的引用就像在交响乐里的华彩的乐段，听起来

是那么迷人，令人深深的回味。这都是他在即席讲话时说的，没有什么人能像他那样脱口而出。有人说他是哗众取宠，那么请举出例子，还有有谁能这样“哗众取宠”呢？

从温家宝总理在三小时的记者会上的答记者问，我真正感到一个中国总理的不容易，他日理万机处理国家大事，掌管国家的经济运行，过问外交事务，随时还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最后，他还要每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面对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回答各种重大问题，像是被质询，像是被考问。没有充分地思想准备和各种数据的记忆，没有沉着、冷静，反应敏捷的头脑，没有常年细致工作，亲自实干实践的积累，是无法有条不紊地来应对提问。而且对答的非常圆满，这一次，还包括历次的记者会上，都使在场的中外记者，以及世界的各大媒体，感到震惊，感到无比佩服。

温总理说这是他最后一次的会见记者，表现出激动，表示出告别的情感，还表示感谢记者朋友们多年来，对中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支持。我从他的言谈话语中觉察到，这一次与以前历次记者会上讲话，有些不同的语气、神态、表现和情绪。我对这个想了许多，我想说出我的一些看法，但是我又不敢妄加猜想，这里只是略表我的一点感概。略述我的一些纳闷之处。

一、总理看上去有些疲惫，也显得比过去苍老不少，精力不如以前充沛，语速舒而缓慢，遣词用字时，有较长的思索和斟酌，但仍然是思路清晰，表达准确无误。这是在用最大的毅力。支撑着他的讲话。我想他所以这样做，是要对对国家、对人民，做出无愧的表态，也做

出负责的交代。

二、总理透露了一丝不易被觉察到的伤感，他自谦由于能力所限，和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工作还有许多不足，他还还说到：“总觉得许多工作没有做完，许多事情没有办好，有不少遗憾”。他表示“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他负有责任，感到歉疚”。他又说，他没有因为不负责任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那么“遗憾”“歉疚”，是不是也含有不完全是他自身原因的“无奈”。

三、以前温家宝总理多次在多种场合下，讲了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次总理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总理忧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问题，诸如：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总理说：“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国家领导人这样说，似乎是一个从未有过的，很大胆的说法。我想，这大概是温家宝在准备离开总理位置上的，一次彻底地表明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态度的亮牌。我为这句话担心，这完全不同于以往他含混的讲话。

四、新加坡的记者问道，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在什么地方？温总理说，他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所以关注这个问题是出于责任感。“党虽然做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被完全清除。”总理没直接说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但他是在记者提

问之后紧接着这么说的。我理解“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没有被完全清除，那就是说极“左”思想还有存在，封建残余影响也存在，极“左”还有一定的市场，“乌友之乡”小集团不就是一个例证吗？当然总理还是讲了，不论进行什么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一点，总理讲的既全面又突出。

五、当一个美国记者问到温总理，中国的老百姓何时才可以直选自己的领导人时，总理没有驳斥这个美国人的挑衅，而是说：“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他说，首先坚定不移地实行村民自治，群众能管好一个村，就能管好一个乡的事情，能管好一个乡，就能管好一个县的事情。总理说按照这条道路鼓励群众大胆实践。总理不是直截了当地说，中国不会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而是明确地勾画出一条中国的民主进程，一定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六、对于公平正义，温总理说：“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还说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说的简单直白一些，公平正义就是人人平等，享有表达意愿的权利。加上前面说的民主，与民主相连的自由。“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就是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普世法则”。温家宝曾在深圳一次范围较小的会上，讲到过，“普世法则”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社会主义也应该适用。传说他受到批评，没有公诸报端，我认为，这里总理似乎在重申他的观点。只不过

更迂回了一些。的确，“普世法则”何罪之有？

七、在记者会上，温总理所有的讲话，没有一句官话、套话、空话。什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贯彻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等，不去深究这些套子的内涵，到底是不是做任何事都照此办理，只有天知道。总理摒弃这些官话、套话、空话，实事求是，讲实质性的内容，听起来就让人感到信服，也感到舒服。这是不是现在提倡的“改文风”的一个进步。

八、对王立军事件的明确表态，温总理是少有的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出了掩饰不住的愤怒，指出“现任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实践中吸取教训。”在当时人们还一点不知情的情况下，总理的一炮，使人们一惊。我想，他未必能想到，最后一个英国记者的“加塞”，直击了一个麻烦的问题。总理即刻地反应，不回避，不闪烁。立即表明了他，也是党中央的态度。他更是抓住这一机会，通过此事带着情绪化的亮相，在公众面前，表明了他与胡锦涛的团结和并肩战斗。用不着高喊团结的口号，显示了珍贵的团结。

在记者会的一开始我就听到温家宝总理讲：“我真诚希望，我，连同我这一生，给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人民都把它忘记，并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而湮没无闻。”我深深被感动，情意深切，听了不禁让人潸然泪下。总理有情，人民也有情，绝不会忘记他。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从历史里知道**温家宝**这个名字。

这是我个人对温家宝的看法和评价，不代表任何其他人。文责自

负。祝愿温家宝总理健康长寿。

后记

拖拖拉拉三年多，总算把我整理记忆碎片的《拾珠串链》写完了。整理起来的记忆碎片，做成一个一个有着标题的片断，这些片断像是散落的珠子，管它是珍珠，还是玉珠、石珠，甚或是木珠，我都拾缀起来做了“加工”，把所有的珠子穿线连接，大致按时间的顺序连串成了链子。看起来像是回忆录。但是我没有把这个叫做什么回忆录，一方面是我的这些片断，大多是讲的一个一个事件，都是相互独立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另一方面我并不只是记述，也就是说不仅是“录”，还有评说和议论，还有探讨和反思。称谓回忆录就不怎么恰当了。这就是定了这么一个小册子名子的缘故。

开头我也没有想好怎么写，先也是按回忆录的方法，写下了《童年》。接下去我就觉得有了困难，我不是名人，没有令人关注的往事，也没有什么辉煌的事迹，真的，有什么好回忆的？回忆一些烂七八糟的个人琐事，有什么意思，别人看了不是笑掉大牙。我就思考着，对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与我有关的一个一个事情和事件，以我的亲历，我的参与，我的所见，联系着环境，联系着那时的政治态势，联系着当时人群的行为，再加上我现在的认识和反思，来审视那些事情和事件。这样再把我那时的思想、表现和行为链接上。我觉得这样的回忆，写下来才真正是有意义的。能使看了这个《回忆》的人，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全面了解我的过去。

我想想写写，写写停停，有时候写成一段，甚至写成了一个篇章

(片断)，觉得不妥和不好，就推倒重来，或者完全舍弃。我不是不着急赶紧完成我的写作，而是总觉得写出的东西，要把我现在准确的想法和判断表达出来，否则我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了。因此我不是笔耕不辍，埋头苦写，而是思考得多，思考好了再动手写，写出来觉得不满意，我要再思考，再重新开始。

我还想说，我写的内容涉及了许多事情和许多事件，由于时间过久，虽是亲历、亲见、亲闻，可能记忆的不清了；更因为是管窥所见，或是个人偏见；再者条件所限，没有能很好核实，致使时间地点不很准确，事实有出入。但是我说的绝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大体上还是可以在史料上，查证得出来。我也希望看到我写的这个东西的亲朋好友们，权当闲聊瞎侃，不要过分深究。我只是想用一些事件和事情来说明，那时的疯狂和我现在的看法与观点。

我也写了一些拨乱反正之后，我们沿着正确的方向做的一些事情。前面我也写了一些我的成长、上学、受教育的一些过程。这前后的内容，虽不涉及到疯狂的年代，但也不仅仅是回忆的记述，这里有感想，有怀念；也有自我评价，还有自我抚慰。

我完成了在告别人世之前的这最后的一个心愿，我将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剩下的那真是颐养天年了。但愿能活得长久一些，可以目睹国家和社会的更多更大的变化，看到民族的兴旺和统一，看到人民生活的幸福和美好。

也许有人会问，离休以后十几年了，怎么一点也不记述了。难道就没有珠子好拾起来了。是的，我也曾经想写一些我的旅游，我的业

余爱好，什么爬山、摄影、唱歌等等。但是，我想这些诉说有什么意思呢？这真是日记式的叙述，并不是我拾珠的本意。此外，我也打算写一些我的家庭，我个人的一些私事。关于家庭涉及到那个时代特征的环节，我已经说了，没有必要再说什么了。至于家庭和个人生活方面，也没有什么好披露的。没有奇闻趣事，没有惊险的故事，没有可以让人关注的爆料。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就不要自找没趣，闲扯一些无聊的事情。总之，我写的不是自传，不是家史，不是回忆录，只是对我在那一段特殊年代及其前后，经历的陈述和我人生的剖析。这才是我视为珠子一般的片断，把它穿起来。仅此而已。

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感谢朋友们对我的帮助。